

西泠藝叢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Xiling Academic

总第一一〇期
二〇二四年第二期



西泠藝叢 Xili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专题·西泠印社近代史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二期

总第一一〇期



◎“苦铁”印石 吴昌硕

ISSN 2095-9362



9 772095 936243

国际统一刊号 ISSN1033-1774
国内统一刊号 CN33-1393/J

邮发代号：32-42
定价：38.00 元人民币

主管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主办单位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出版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西泠艺丛》学术指导委员会
刘江 韩天衡 朱关田 陈振濂 李刚田
童衍方 龚志南 孙慰祖 金鉴才

《西泠艺丛》编辑委员会
陈振濂 王宏伟 赵熊 许雄志 范正红
沈浩 王丽艳 秦陶 郭超英

主编
陈振濂

常务副主编
王丽艳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吟 郭晓芳 解旬灵 (执行)

责任编辑
解旬灵 陈涛

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大啸 史一然 陈心怡

特邀编辑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竹英 王臻 乔中石
张帆 戴海栋

法律顾问
浙江浙元律师事务所

支持单位
西泠印社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西泠印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版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4.2.29

CN33-1393/J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5-9362 [国际标准刊号]
邮发代号: 32-42

编辑部联系方式
编辑组稿电话: 0571-85812991
编务室电话: 0571-87037360
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西湖文化广场E区32号5楼
邮编: 310014
投稿邮箱: xlyc2015@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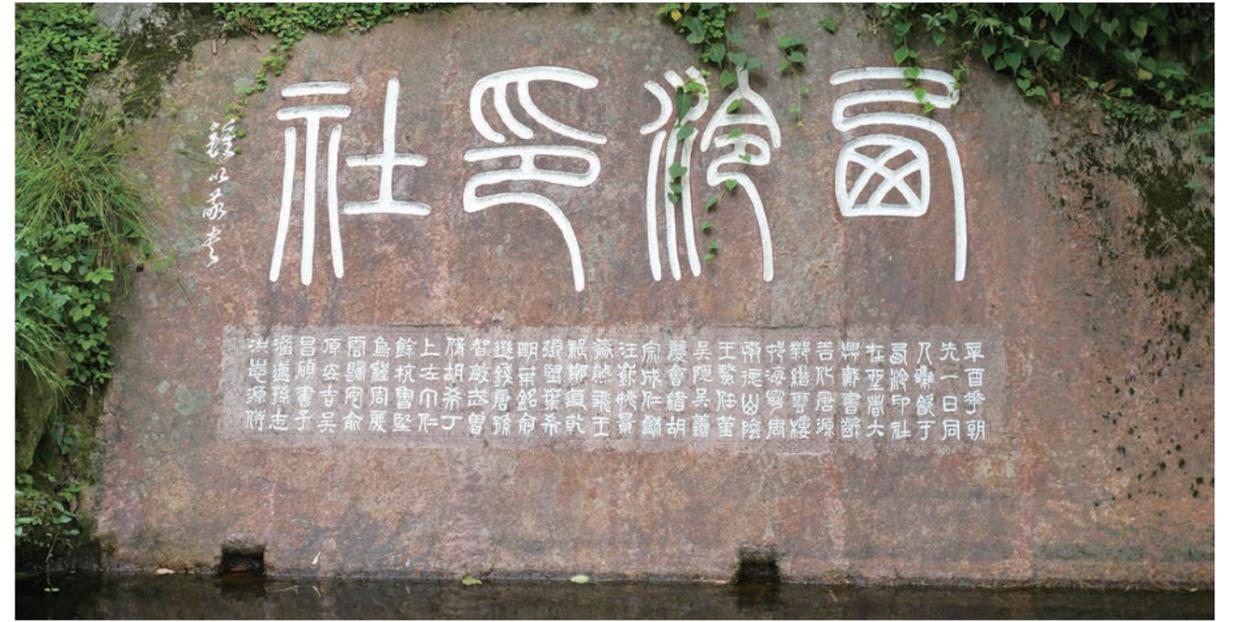
西泠传媒旗下
西泠印社官方网站: 中国西泠网 <http://www.xlys.org.cn/>



西泠印社官方微信



西泠印社官方微博



钟以敬篆“西泠印社”摩崖石刻



潜泉铭

本刊声明

- 本刊不接受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作品，因抄袭和涉密等侵犯他人版权或其他权利者，文责自负。本刊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和立场。本刊有权对其进行适当删改和调整，作者如不愿被改动，请及时告知《西泠艺丛》编辑部。
- 为实现期刊编辑和出版的网络化，扩大本刊与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超星、知网等媒体和信息资源库全文收录，在本刊公开发表的作品，视为作者同意通过本刊将其作品上传至上述平台或数据库，作者如不同意作品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目 录

Contents

专题·西泠印社近代史研究

- 02 学术立社：从观念到实践
——新时期西泠印社与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 文/秦 陶
- 19 学术化构建、大众化普及与边缘化处境
——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历史境遇探赜 文/崔宗旭
- 28 “印学话西泠”：论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 文/吴彦颐
- 40 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及其文化影响述论 文/贺文荣
- 50 《西泠印社社史研究重点文献》

学术研究

- 54 守传统承文脉 为往圣继绝学
——张宗祥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末探微 文/张 群、胡梅珍
- 66 “高氏赵印”简述 文/张书慧

博硕士学术研究论坛

- 74 《语石》早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 文/王江涛
- 81 李流芳《湖山帖》考 文/魏玉豪

社藏撷珍

- 89 吴昌硕自用田黄印

印人近作

- 93 华东师范大学 / 临沂大学
-

学术立社：从观念到实践

——新时期西泠印社与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

文 / 秦 陶

【摘要】

“学术立社”在西泠印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是社团重要特质之一。这一特质在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中一以贯之，不仅成就了其早期的声望，进入新时期后更加发扬光大，通过创新社团机制、搭建研究平台、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期刊等各方面举措，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诗书画印兼能”，进而进一步向“现代金石学”延伸、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世界印章史拓展——提出构建当代“大印学”研究新格局，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与超越。可以说，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史在现代篆刻和印学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高度，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学术立社 当代印坛 印学研究

文人结社的兴起与繁盛，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领域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先秦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和文人群体集聚，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酒雅集，构成了早期社团活动的主体与基本形态，此后历代流传，兰亭雅集、月泉吟社、吴门真率会等，各种形式的诗社、文社、琴社、棋社层出不穷，至明代而臻鼎盛，根据何宗美先生的统计，明时文人结社总数共有三百余家。^[1]入清之初，虽然历经禁社、社禁渐缓，但文人社集之风始终延续，尤其在江南地区，以艺文活

动为主题的结社更见活跃，如《西泠印社志序》所述：“有清二百数十年来，名流雅集，莫盛于武林。文有社，诗词有社，至于若画、若茗，一艺之长，或亦合群而为社。”^[2]

自魏晋至晚清，结社者虽然名目繁多，但以“印社”称名者，在西泠印社之前尚无先例。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印学社团，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结社组织，西泠印社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时起，即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大张学术

立社之帜，不仅成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其社团组织形式、运作理念和具体实践，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篆刻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演进，尤其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印坛，发挥着无与伦比的积极影响。

西泠印社成立至今已一百二十年历史。在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回顾西泠印社创立、发展和壮大的社史脉络，探究其社团定位与组织运作，可以发现，“学术立社”是西泠印社的一个核心特质。这一特质在西泠印社一百二十年的演进历程中一以贯之，不仅成就了其早期的声望，进入新时期以后更加发扬光大，通过创新社团机制、搭建研究平台、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期刊等各方面举措，从观念倡导到积极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引领和示范作用。一百二十年西泠印社学术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谓一部近现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史，西泠印社自身，也因此而成为社会文化史和印学史上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

一、“学术立社”的社史溯源

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位浙籍印人叶铭、吴隐、丁仁、王昶“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社因地名，遂曰西泠”^[3]。早在创社伊始，西泠印社的创立者就表明了学术立社、研求印学的社团定位，赋予了西泠印社振兴和光大印学之使命。这一宗旨和定位，在西泠印社早期社史文献中反复申明，足见创社诸君对“学术立社”的强烈自觉。

（一）早期西泠印社史中“学术立社”的观念表达

印社成立，修启立约。西泠印社《社约》第一



◎ 西泠印社重要历史文献

条记：“本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借资证经考史。”^[4]

自此，“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便成为西泠印社同人认可并遵行的基本理念。胡宗成称之为“汇流穷源，无门户之派见；鉴今索古，开后启之先声”^[5]，可谓归纳得宜。历检早期社史文献，相关表述可举者如：

缘集同志，立斯社，以期保存印学。夫以今日之势论之，甲兵训于野，商业竞于市，清国朝野上下岌岌，以讲求富强为急务，而诸君子独高尚其志，研志美术，不得不为诸君记。诸君又能椎摹精拓，编辑印谱，不肯自秘，以提倡后学，即余身处海外，亦得一苇而至，见所未见，是不特余之幸，亦为后世刻印者之幸。（河井荃庐《西泠印社记》，1906年）

西泠印社者，海内外印人研求印学之地也。……他日五洲同文，东启铁耕之艺，或亦流播欧米，则印林之发轫、美术之扩张，首在吾六桥三竺间矣。（鲁坚《西泠印社记》，1912年）

本社之有同人录，非仅仅详姓氏、征里居、

[1]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2] 《西泠印社志序》，丁仁、叶铭、王昶约1915年所辑《西泠印社志》（浙江图书馆藏稿本）著作“泉唐佑卿汪承启序于小飞鸿堂”；《西泠印社小志》则署为“临桂况周颐撰”，《西泠印社志稿》从之。

[3] 胡宗成：《西泠印社记》，《西泠印社志稿》卷四。

[4] 《西泠印社志稿》卷三。

[5] 胡宗成：《西泠印社记》，《西泠印社志稿》卷四。



◎ 印社早期社员在研讨印学

右起：高络园、高野侯、王禔、丁仁、葛昌楹、俞人莘

明年龄，盖借以保存印学、研究艺术，为传世计，非为炫世计也。……皆取其人以学问著而享盛名于同社者，或以金石，或以书画，或以鉴别，或以收藏，非同志不列席，非大雅不漫登，殆所以存传人而征传迹，为传信后人计也。（张苏龢《西泠印社同人录序》，1913年）

吾同社诸君子，诚能切磋琢磨，精益求精，藉于艺进乎。道以引翼先哲之绪，而昌明虞存之古文。则吾印学家之西泠，谓即文学家之桐城、阳湖，理学家之鹅湖、鹿洞可也，而可以雕虫小技薄之耶？（吴隐《印人像石刻前序》，1914年）

吾浙八家，昌明浙派，海内宗仰，于是印人蔚起，辉映后先，迄今言印学者，类能道之，然不谋所以保存，势必日就湮没。印社之设，乌可缓哉！（张景星《西泠印社记》，1914年）

顾社虽名“西泠”，不以自域。秦玺汉章，与夫吉金乐石之有文字者，兼收并蓄，以资博览考证，多多益善。（吴昌硕《西泠印社记》，1914年）

印社之旨，新于居今稽古，集思广益，沿流溯源，而仰希六书二篆之高矩。《诗》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君子有取焉，非徒流连泉石，啸傲烟霞，一觴一咏，畅叙幽情而已。（汪承启

或况周颐《西泠印社志序》，1915年）

这些西泠印社早期同人对于创社初期社友结集、社团定位的“学术立社”观念表达，载录于社史，可视为当时印社内部的共同认知。概括而言，其意有三。

首先，立社之目的在于保存印学。早期西泠印社同人对于印学的源起与演进、印学之内涵与外延、印人与流派之优劣得失等命题，显然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认知，并对这一学问在整个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历史和现状具有准确把握。这是从事学术活动必备的知识前提，也是切磋琢磨、艺进于道的研究主体。

其次，不自域、不自秘，兼收并蓄，提倡后学。其兼收并蓄，体现在取人以学问为重，不论金石、书画、鉴别、收藏；为学不计地域和材质范围，凡金石文字遗存皆可用资考证。创社初期，渡海来华的日本印人河井荃庐就对西泠印社同人的开阔襟怀深为折服，鲁坚甚至展望了将来“五洲同文”的理想世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知识界所受的启蒙思潮影响，更反映出西泠印社同人自觉的学术架构和对于学术传承的历史责任感。

再次，旨在传世而非炫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印章作为金石之一种，是文人收藏鉴赏和雅玩之物，篆刻又与书画创作密切关联，为艺者众，为学者罕。而西泠印社同人明确提出，印社要沿流溯源、探讨文字，印学不是雕虫小技，集社也不仅仅是为了赏玩娱情，更非为了炫耀称名于世。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知识价值取向，它超越了明清以来“游于艺”的雅玩趣味，而其“传世”之言表明，早期同人有意识地将印社学术活动纳入印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反映出他们在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的坚守，客观上承担了挽救文脉、兴废继绝的历史使命，其中所体现的强大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站在历史长河的这一端，回望早期西泠印社先贤的立社观念，可以看见：一百二十年来西泠印社学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循着先贤们的理想和足迹而来。

（二）西泠印社早期的主要学术活动

西泠印社的创立，自民初以来在社会文化界影响颇大，吸引了众多倾心于金石篆刻艺术的印坛名流、社会名流纷纷加盟，其中有不少是学问修养渊博、艺术造诣精深、卓有名望的学者和艺术大家。从1904年印社创立到1979年的前75年间，其社团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印社草创和社址营建之后，印社同人自发通过聚集文物文献史料、编辑出版和展览交流来普及印学。

从1904年至1913年，创社诸君主要致力于社址营建。当一些主要建筑建造完成、拥有了研究印学的地域“场”之后，西泠印社广泛招揽同人，当时金石书画界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如吴昌硕、胡笏邻、马衡、李叔同、黄宾虹、经亨颐、高时显等，皆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其清风亮节、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奠定了印社的学术品位，成就了印社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担任社长的十余年间，其以盛名与实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倾心仰慕，使早期的西泠印社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西泠印社辑集的第一批文献史料来自丁仁、王禔、叶铭、吴隐四位创始人的捐赠，共39种223册印谱，其中吴隐赠《周秦古玺》等31函145册；丁辅之（丁仁）赠《西泠八家印选》等7函62册；王福庵（王禔）赠《福庵藏印》1函16册；叶铭赠其所辑《广印人传》16卷补1卷。^[6]四位创始人领头，捐赠者接踵而来，蔚然成风，印社相继所得有手工精钤古代铜玉印谱数十种，碑帖类书籍以及金石著录、印学理论丛书、精选历代孤本善本印谱等不计其数，“编著的各种有关金石篆刻的工具书及参考图谱等不下数百种，对篆刻艺术的发展，直接起到了承继



◎ 西泠印社早期编辑出版的部分图书

和传播的作用”^[7]。“收藏范围也从印谱类向与印学相关的书法、文史、金石鉴赏等内容拓展，想方设法去征集海内外的印学书籍，目标是设想建立一个突出金石印学专业特色、内容丰富广博的图书机构，力图多方面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8]除印谱图籍资料的辑集外，1921年浙人募资11270大洋赎回“浙东第一石”《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并筑室于孤山西泠印社社址，永为保护，是近代文化史上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张钧衡、丁仁、吴善庆、吴隐、王震、叶铭等社员均为其中的参与者。

西泠印社的早期学术出版，在近代印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分量。如其创始人之一吴隐，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玺印图谱有《周秦古玺》《遯盒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缶庐印存》《吴让之印存》《钱胡两家印谱》《求是斋印谱》《赵次闲印存》《二金蝶堂印存》《遯盒集古印存》等，汇辑发行金石学、印学著述有《校碑随笔》《金石契》《竹素草堂金石丛书》《金石学录》《海东金石苑》《金石全例》《金石丛书》《篆学丛书》《遯盒印学丛书》等，编辑出版活动长达数十年，形成了以印学为中心的显著专业体系特色。^[9]另如早期社员方节龢主持的

[6] 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56—57页。

[7] 夏惠铭：《西泠印社六十年》，《浙江日报》1963年10月27日第4版。

[8] 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9] 孙慰祖：《西泠印社社员在海上的早期艺术活动》，《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 西泠印社成立 60 周年纪念大会留影

宣和印社，丰子恺、钱君匋创办的艺术教育书店等，以上海为中心，在近代海上地区发达的出版文化圈中，为金石学和印学开辟了知识传播的空间。

同时，西泠印社以春秋雅集、展览等形式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其间较有影响的，如 1913 年在西泠印社与日本同期举办的规模隆重的中日“兰亭纪念会”，当时在华的日本长尾甲、高漱惺轩、小栗秋堂等六人参加了西泠印社在杭举办的纪念会；1913 年西泠印社首次社员大会期间举办的藏品展览，展出各家所藏书画名迹多至三四百种^[10]；1915 年南社部分社友参加西泠印社雅集活动；1923 年西泠印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举办的规模盛大的“金石家书画陈列会”，展出自宋至清五百年间的书画精品 200 余件，并辑集出版了《金石家书画集》2 函 10 册；1933 年西泠印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举办了金石家书画陈列展览，编辑《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等，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西泠印社声势达到了建社后的最高点，吸引了泰戈尔、鲁迅、张大千等各界名人雅士的造访，他们的掇扬大大提高了西泠印社的知名度。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由政府接管，

印社性质由私转公。在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关怀下，举办了建社六十周年社庆，带动并推进了孤山社址的修缮、文物捐赠、展览、学术研讨会、出版和国际交流等多项工作，在坚守学术立社、推进印学研究上又迈进了一步。

1956 年，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文史馆副馆长、省人大代表张宗祥率先向省人大提交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在浙江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支持下，从 1957 年成立西泠印社筹备委员会到 1959 年由浙江省文化局移交杭州市文化局、成立西泠印社办公室，西泠印社组织机构、领导机制和活动方式逐步转变，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渐渐显露生机。

1957 年，得力于吴氏后人吴东迈的捐献，孤山设立“吴昌硕纪念馆”；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日本书道代表团访问西泠印社；1959 年，西泠印社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金石书画展”；1962 年张鲁庵家属捐献张氏珍藏的印谱 400 多部、印章 1500 多方，社友高络园、王个簃、葛书徵等亦纷纷捐助文物。至此，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学研究机构，真正具备了丰厚的藏品基础。

1963 年，西泠印社召开建社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傅抱石、沈尹默、潘天寿、谢稚柳、程十发等一批国家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被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社员大会拟定了重振印社的全面规划；通过新社章，在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基础上增加了“兼及书画”；选举产生了张宗祥为社长的首届理事会。大会期间举办了创社以来规模最大的历代金石书画家篆刻展、捐献品展和现代金石书画展，展出珍品两千余件、明清以来篆刻家的原印四千余方；组织了以“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西泠八家的艺术特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期间，西泠印社还出版了沙孟海《印学史》《沙邨印话》、叶潞渊与钱君匋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和《西泠四家印谱》等，这些当代印学

研究的万苦千辛之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即便在“文革”十年中，西泠印社学术研究也未曾中断，先后组织举办篆刻书画创作和作品展览活动近百次。1977 年以后（1978 年西泠印社被批准为出版单位）亦先后编辑出版了《历代印章简编》《吴昌硕印略》《西泠印社藏印选》《西泠印社铜印选》《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张宗祥藏印集》等大批印谱、法帖和学术论著，行销海内外，为西泠印社学术影响的扩大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泠印社的早期学术成果，是印社建构整体学术形象的坚实根基，也成为当代印学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

二、新时期西泠印社的复兴与学术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艺术春天”的到来，西泠印社于 1983 年召开建社八十周年大会，随即进入了全面恢复、稳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大致可划分为从 1979 年到 2003 年，持续到 2003 年百年社庆之前。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西泠印社学术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员独立研究的基础上，由印社主导、发起、组织，或以社员身份开展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既形成了当代印学史上引人关注的若干学术话题，又建构并拓展了当代印学研究的学科框架。同时，搭建了若干学术平台，完成了一系列机制建构，以一种更加组织化、规范化的形式，走上了稳步运行的轨道。

（一）奠基与开拓：当代印学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进入新时期以后，社会文化环境的回暖使得艺术、学术社团和学术研究事业很快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印学研究领域，古玺印研究、明清篆刻研究实



◎ 西泠印社成立 80 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

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多数研究成果归功于西泠印社中人。

这一时期，因为有传统金石学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古玺印研究成果最为丰厚。先有罗福颐《古玺文字征》《印章概述》（与王人聪合作）等撰述。“文革”结束后，罗福颐“因见研究古玺印的人不多，所以总向古玺印方向发展，如古玺印资料之收集和它的断代”^[11]，1979 年后，其持续撰著有《古玺印打本校雠录》《古玺印纽制图录》《汉印文字征补遗》《八思巴文押字集》《战国秦汉古印式》《隋唐渤海五代官印集》，出版有《汉印文字征》《近百年以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古玺印概论》《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等，以及为故宫博物院编《古玺汇编》《古玺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以罗福颐为代表的古玺印研究，超越了传统的金石文字之学^[12]，诸如：结合新出古玺印材料，根据各代古玺实物遗存与历史记载相印证，对战国古玺、秦汉至南北朝官印和私印、传世隋以来官印功用及断代等专题提出的新见^[13]，其中关于秦汉南北朝官印的汇集、谱录与准确断代，厘清了瞿中溶《集古官印考》等清代学者的含混认

[10] 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 页。

[11] 罗福颐：《倭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2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0 页。

[12] 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紫禁城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3—164 页。

[13] 罗福颐：《近百年以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荣宝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59 页。

知^[14]；以古玺纽制，尤其是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官印纽制作为玺印断代的参考^[15]，更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从而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成果深度上，将古玺印研究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历史性突破是明清篆刻流派研究，其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方去疾，代表性成果是1980年出版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及其中的《明清流派篆刻概述》。这一研究填补了明代中叶至晚清五百年印史的空白，不仅将明清文人篆刻从流派、名家、师承关系、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还从史的角度对篆刻艺术发展作了宏观分期^[16]，“勾勒了文人篆刻研究的学术框架，首次梳理出明清篆刻流派形成发展的基本线索，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是新时期印学学科建设最初而且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7]。

罗福颐、方去疾的研究在当代印学史上具有首创之功，自此开启了古玺印与明清篆刻研究的基本格局。之后，在“文革”结束以后的20余年间，印学研究者沿着这两个方向不断加以拓展和深入，涌现了大量填补空白的印学研究成果，如《印学史》（沙孟海）、《历代印学论文选》（韩天衡）、《中国篆刻年表》（韩天衡）、《中国古代印论史》（黄惇）、《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黄惇）、《篆刻丛谈》（叶一苇）、《西泠八家研究（一）：丁敬》（林乾良）、《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孙慰祖）、《古玺通论》（曹锦炎）、《鸟虫书通考》（曹锦炎）等；在不同研究方向加以拓展和推进的，则如《篆刻艺术》（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刘江）、《书法篆刻》（黄惇）、《历代印谱赏析》（韩天衡）、《商周金文选》（曹锦炎）、《古封泥集成》（孙慰祖）、《两汉官印汇考》（孙慰祖）、《印章历史与文化》（萧高洪）、《近代印人传》（马国权）、《新出土秦代

封泥印集》（傅嘉仪）以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玺印篆刻》（方去疾主编）、《中国印学年鉴（1988—1992）》（金鉴才主编）等；还有作为印学社团发展史重要文献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陈振濂主编）等。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于2002年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兰亭奖·教育奖”和“兰亭奖·编辑出版奖”。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泠印社社员的学术成果，建构并且极大拓展和丰富了当代印学研究的学科框架，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奠基和开拓意义的工作。截至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当代印学研究已经从印史、印论、印人、印派到印风、印谱等各个研究领域，建立了相当扎实的积累。尽管学术的进步往往是后出转精，但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形成了新时期印学研究的新高度，而且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这种短短数十年内集中的、全面的高质量成果涌现，在其他传统文史学科领域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反映了印学的学科基础十分薄弱，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这一学科的蓬勃生命力，这正是当代印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强大动力。

（二）概念辨析与新观念新目标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复苏，为西泠印社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党委和政府也对西泠印社的发展高度重视，从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在秉承和践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旨的基础上，印社主事者与有识之士着力思考社团建设和发展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学术建设观念，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篆刻学”与“金石学”的概念辨析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的提出。

1983年，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社长沙孟海先生在开幕致辞中，对篆刻学与金石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印学、篆刻学的形成，是近六百年的事。搞这门艺术的一向存在“自卑感”，怕别人讥笑它是“雕虫小技”，因为研究古代印章是金石学中间的一个项目，所以篆刻家们往往依托金石学的牌子，自以为金石家，别人也给他金石家的美称，由来已久。实质上，宋以来所称为金石学，主要是指研究商周铜器和历代碑版之学，与篆刻仅有极小部分关系，并不等同。金石学是史学、考古学方面一门学问，篆刻学是美术方面一门学问，两者虽有联系，但不是一物……篆刻学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它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需要再顶金石家的“老招牌”。^[18]

长期以来，“篆刻”一词常与“金石”并举，尽管后者概念范围更大，可以统摄前者，但对于“金石篆刻”这一概称，无论是金石学者还是印人都习以为常。沙孟海先生明确反对“金石”“篆刻”二者相混淆的说法，而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出发，强调金石学侧重史学与考古，篆刻学属于美术门类，力主篆刻学自身的独立性。这在长期以来习惯了“金石篆刻”之说的认知环境中，不啻振聋发聩之言。尽管当时在印社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由此带来的对篆刻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篆刻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思考，对厘清篆刻学的学术边界和学科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印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时隔五年，在1988年西泠印社建社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沙孟海社长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以印聚社”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下，西泠印社唯有紧紧抓住“学术研究”这一中心，并使之在国际上产生主导性影响，才能与西泠印社“天下第一社”的名望相符合。为此，沙孟海社长提出了要把西泠印社建成“国



◎ 沙孟海在西泠印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构想。

此后，西泠印社围绕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学术建设的重要举措。

其一，以逢五、逢十的社庆活动带动学术活动，每五年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会或研讨会；建立健全国际印学研讨会运行机制，吸引社外乃至海外学者参与，壮大学术研究队伍，培养新生力量。

其二，成立印社学术委员会、社史委员会、编辑出版顾问委员会和工作审查委员会，作为社团工作的保障机制。

其三，完善国际书法篆刻比赛，建立“国际篆刻艺术评展”机制，扩大篆刻艺术的社会普及，培养艺术新人。

其四，提出建立印学体系的构想，包括篆刻创作、篆刻史、印论和篆刻美学等一系列专题。

其五，加强全国印学社团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上的合作交流。

其六，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其七，创办社刊，利用这一阵地发表学术论著，介绍印社藏品、金石书画新作以及国内外有关学术的动态。

[14] 罗福颐：《倭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

[15] 罗福颐：《倭翁七十自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6] 方去疾：《明清篆刻流派概述》，《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304页。

[17] 孙慰祖：《方去疾传·评》，余正主编《西泠百年印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18] 沙孟海：《沙孟海论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页。



© 1987年11月13日，由西泠印社举办的“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入选作品展”在杭举行。图为开幕式与颁奖仪式上社员与部分参展作者合影时的情景。

其八，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日本、东南亚各国间的联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传播篆刻书画艺术。

（三）社团活动与“学术立社”的组织化

观念的更新和举措的提出，为社团学术建设奠定了基础。自此，西泠印社在学术建设上逐渐推出并完成了一系列机制建构，搭建了若干学术平台，“学术立社”不仅落实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层面，还以一种更加组织化、规范化的形式，走上了稳步运行的轨道。

1. 学术研讨活动的制度化

从1979年起，每逢五、逢十周年庆典，西泠印社均举办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成为定律。从仅有现场交流到编辑出版论文集，研讨的学术成果得以留存并广泛传播，成为新时期印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记录。

如1979年西泠印社建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上，沙孟海、启功、罗福颐、方去疾分别作了题为《试谈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对书法艺术的两点体会》《对古印章的认识》《明清篆刻流派简述》的学术报告。1983年建社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交

流会，征集学术论文27篇，规模一举扩大近7倍，会后辑成《印学论丛》，这是西泠印社学术研讨论文第一次编印成集。^[19]此后历次学术研讨的参与人数和收稿数量不断增加，从第一届学术报告会4篇论文到2003年“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225篇，质量水平持续提升，规模从社内扩大到海内外，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

相对于传统文史、社科领域研究的系统精深，印学、篆刻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甚至许多基本概念至今仍在不断厘清、辨析的过程中。但正是这样筚路蓝缕的拓荒性的工作，不仅吸引了诸多海内外印学研究者的热情投入，也清晰地留下了研究者们思考与认知的学术轨迹。

2. 篆刻艺术展赛的常规化

从1986年起，西泠印社推出篆刻艺术评展，每四年举办一届，成为印社艺术活动，也是当代印坛创作领域的大事件。

西泠印社首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作品2318件，经初评、复评，共评出优秀奖50名，入选作品200件，在杭州举办了作品展览，并邀请获奖者和入选者参加开幕式和交流座谈，出版了《西泠印社首届篆刻评展作品集》；1990年第二届全国篆刻作品评展，收到稿件2000余件，评出入选作品200件，优秀作品50件，并出版了作品集；1995年第三届篆刻艺术评展收到作品1220余件，印蜕、边款9000余枚，评选出来自全国和日本、韩国等地的优秀作品50件，入选作品作者240名，边款奖7件；1999年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收到来自国内外篆刻爱好者来稿1200余件，印蜕、边款8000余枚，评选出优秀奖作品50件，边款奖7件，入展作品201件，入选作品144件，同时出版作品集。

篆刻艺术评展的举办，显著加强了西泠印社与国内外篆刻界的交流学习，扩大了篆刻艺术的社会普及

和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篆刻人才的加快成长和印学艺术的加速发展。

3. 从联展到巡展：全国印社组织交流的建立

在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社庆纪念大会上，全国部分印社提出由西泠印社主持举办“全国印社作品联展”的建议。1989年，西泠印社召集全国部分印社举行联席会议，发出《关于举办“全国印社篆刻联展”的倡议书》，获得各方广泛响应。1990年2月，“全国印社篆刻联展”在西泠印社湖滨展厅开幕，全国共有122家印社参展，配套出版了《全国印社篆刻联展作品集》，之后又赴南京、武汉、郑州、西安、德州、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全国巡展。这不仅是西泠印社史，也是中国篆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印学社团大联展，可谓盛况空前。自此，西泠印社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00余个篆刻组织和印学社团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交流。

4. 海外印学研究交流更趋密切深入

作为杭州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单位，即便在“文革”十年中，西泠印社与海外书法篆刻界的交往也未曾中断，新时期以后，交流更趋密切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2003年间，有日本《读卖新闻》社“吴昌硕胸像赠呈访中团”致赠缶翁铜像（1980年）；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联合在杭举行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中日双方100余人出席学术交流会，中方钱君匋、刘江、陈振濂与日方梅舒适、杉村邦彦、鱼住和晃分别作学术报告（1987年）；日本天溪会代表团因“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友百年纪念碑”立碑与揭幕（1990年、1991年）等事宜访问西泠印社；日本篆刻家、艺术院院士、西泠印社名誉理事小林斗盦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之际，将自己重金所购吴昌硕晚年精品、西泠印社社员证书钤用的“西泠印社中人”原印赠予西泠印社，更是中日两国篆刻界的一段佳话。

这一时期，对外交流内容由访谈、考察、笔会和展览，进一步扩大到学术研讨层面，如纪念吴昌硕诞辰140周年西泠印社与日方合作的“吴昌硕艺术学术



© 1979年创刊出版的《西泠艺丛》



©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泠印社编辑出版的部分图书

研讨会”（1984年），西泠印社与日本书法史研究会联合在杭举行的首次中外学术交流讨论会等。

5. 创建中国印学博物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就多次提出建立印学博物馆的设想，沙孟海社长生前也对此寄予厚望。在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赵朴初先生的重视和关怀下，在国家、浙江省、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西泠印社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1995年，首批款项到位，筹建工作启动，通过文物征集和社员、国

[19] 《西泠印社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总结》，第4页。



© 1998年召开的西泠印社建社95周年纪念大会

内外热心人士捐赠，又汇聚了一批珍贵的印学实物和文献。

中国印学博物馆于1999年建成开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印学博物馆，主馆设有历代玺印厅和篆刻艺术厅，较完整地展示了我国印章和印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更好地开展历代印章、印学文献的收藏、展示、学术研究和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吸纳社会捐赠、丰富印学活动、推广印学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员大会工作报告曾郑重指出：“印学博物馆建成以后，本社‘保存金石’的宗旨将能得到切实地贯彻，也将为研究印学提供更多的便利，这无疑为西泠印社发展史上的一项壮举，一座丰碑。”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落成，为西泠印社实现“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目标、推动印学事业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6. 打造一报一刊学术平台

197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西泠印社正式拥有出版权，1979年《西泠艺丛》创刊号公开出版，其“编者的话”写道：“《西泠艺丛》是一本研究金石书画，繁荣创作的综合性艺术刊物。它以篆刻为主，兼收书法、绘画作品；古今关蓄、古为今用。”创刊号中除印社介绍和社员作品外，还刊登了社长沙孟海《印学史》（选刊）、副社长刘江《吴昌硕

的印章艺术》、副社长诸乐三《谈吴昌硕先生的画》、伏琛《鲁迅和西泠印社》和黄涌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学术文章。1989年，为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性，提高办刊质量，《西泠艺丛》进行了改版，安排更多学术研究内容和专版、专集。1985年，《西泠艺报》创刊，作为当时学习书、画、印的重要平台，在及时登载社员、书画家交流活动现状，介绍印坛先贤和当代名家、社员艺术成就，汇集文化新闻和印社文史资料，以及联系社外印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有力的纽带作用。2002年，因报刊清理整顿，《西泠艺报》转型为《西泠通讯》。《西泠艺丛》和《西泠艺报》，在当时的印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西泠印社采取的是政府引导下、由名家汇聚相对自主运作的社团管理机制。社团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社团管理和运作机制有效地保证了西泠印社的生存壮大，使西泠印社在维持原有的文人结社形态的同时，延续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立社宗旨，社团组织建设、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文物收藏和保护、编辑出版等方面都获得了蓬勃发展，海内外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成为集学术活动、编辑出版、文物收藏、文化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实践证明，历史悠久、名家荟萃、实力雄厚的西泠印社，是能够担当起团结和引领当代中国印坛的责任的。西泠印社这样的艺术社团生存发展模式，充分显示出西泠印社独特的范例价值。^[20]

在1998年召开的西泠印社建社九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和第十次社员大会上，第五届理事会在社团工作报告《继承传统 顺应时代 加快发展 让西泠印社以崭新的姿态迈入二十一世纪》中指出：“在跨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学术研究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努力提高西泠印社的学术含量和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努力开创坚持印学研究为中心，金石书画综合发展的新格局。”自此，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作为西

泠印社社团事业建设的两翼，进入了更具组织性和规范性的新阶段。

三、西泠印社新百年的学术振兴

跨入新世纪以后，为了顺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推进西泠印社事业健康快速发展，2002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杭州市政府对西泠印社实施机构改革，调整西泠印社管理体制和机构，组建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作为杭州市委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归口市委宣传部管理。隶属关系从文化局到宣传部的转变，使西泠印社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更加适应文化事业发展规律。进入新百年征程的西泠印社，再次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一）新百年，新目标，新举措

2003年11月，西泠印社迎来了创立百年华诞的盛大庆典，其间召开的第十一次社员大会，确定了建设“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新百年发展目标和今后工作的十项举措，旨在全面推进印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设名家之社，就是要将国内外知名的愿意参加西泠印社的印学家、篆刻家、书画家、学者名流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使西泠印社真正成为文化艺术精英的社团。

建设天下之社，就是要以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眼光来办社，巩固西泠印社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印学社团的引领地位，切实担当起印学研究中心的责任，使西泠印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名社”。

建设博雅之社，就是要在坚持“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同时，积极适应新形势，拓展新领域，吸取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素，使西泠印社更富有兼容性与开创性，不断满足社会公众多层次的文化艺术需求，要让西泠印社坐得住象牙之塔，走得进千家万户。

推出的十项举措，一是搭建平台，成立篆刻创作、



© 2003年11月18日西泠印社建社百年华诞系列活动

书法、国画、印学理论与社史、鉴定收藏等专业研究室，举办与西泠印社地位与形象相称的各种学术、创作活动；二是吸纳人才，在吸收新社员方面，进一步规范完善人社标准，对于吸收中青年社员，突出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能力，逐步建设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三是繁荣活动，建立“孤山论印”国际印学峰会、“全国篆刻评展”等高层次、常设性活动机制，恢复春秋雅集，举办艺术展览与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学术与创作活动，既要推动印学进步、占领学术高地、塑造印社学术品格，又要注重普及推广，广泛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传承印学、弘扬民族文化、扩大印社影响；四是扩大交流，加强国内外、省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各省市印学社团、大专院校、书协、美协以及海外社团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西泠印社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五是恢复社刊，创办《西泠印社》，继续办好《西泠通讯》，加强出版社管理，建立健全发表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宣传印社的重要阵地；六是丰富典藏，逐步建立富有西泠印社自身特色的藏品体系，为专家研究创造条件，为普及印学文化提供服务，积极承担起弘扬印学的使命，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印学图书馆、中国印学网、数字西泠印社；七是扶植新人，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通过举办研修班，老社员传、帮、带，加大高层次人才、印学骨干、新秀的培养，筑起人才高地；八是拓展领域，以开放的精

[20] 《团结奋进，开拓创新，为把西泠印社打造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而努力奋斗——在西泠印社第十二次社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西泠印社第七届理事会，2008年10月24日。

神和胸怀,建立起以印学研究为中心,兼及书法、国画、文物、鉴赏、教育等领域,使西泠印社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九是建立网络,创新联络机制,通过组建“国际篆刻联盟”“书友俱乐部”等形式,建立西泠印社与社会各界、国内外社团的广泛联系,不断扩大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十是完善保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社团活动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推动印社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 学术建设的平台拓展

百年社庆以后,西泠印社“学术立社”的观念在新百年新目标指引下,围绕十项新举措的践行,反映在社团建设和社务运作上,更加务实和深入。

首先,建立艺术研究室。从2004年起,先后组建了篆刻创作、印学理论与社史、书法、国画、鉴定与收藏、古诗文、肖形印七大艺术研究室,作为社团学术和艺术活动的专业平台。各研究室先后组织了纪念吴昌硕先生诞辰160周年“吴昌硕·西泠印社”学术研讨会、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等,均为海内外围绕相关主题展开的首次学术交流和研讨,在印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策划了吴昌硕自刻自用田黄印鉴赏会、“诗心造印”学术研讨会、汉三老碑拓片五种并题跋观摩会等一系列形式多样、涵盖面广的活动。在配合社团大型活动的同时,各研究室还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策划组织创作、展示、交流、研讨、鉴赏等多种形式活动,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员作品提名展、观摩展、成果展等专业艺术活动,为社员间开展艺术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社员自身学养和艺术水准得以不断提升,也为印社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进一步打造学术活动品牌。2003年以后,建立起每三年一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每年一场大型学术研讨、结合不定期的专题和纪念活动组织专题学术交流的多轮驱动新机制。经过十余年积累,西泠印社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在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

力的学术活动品牌——“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这是国际印学界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学术活动,从2005年起每三年举办一届,同步出版论文集,至2020年一共举办了六届,汇集了中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美国、加拿大等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的顶尖级专家学者,涵盖了印学史论、印学文献研究、印谱版本及流传考证、古玺研究、明清文人篆刻研究、篆刻审美与创作理论、篆刻流派研究、篆刻学学科建设研究、域外印章研究、金石铭刻研究、印人生平与交游、印章材质与工具、西泠印社史以及书画、鉴藏研究等方向,全面展示了西泠印社乃至国际印学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积累,对促进国际印学界学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交流,推动当代国际印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体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恢复学术期刊。为迎接百年社庆,西泠印社恢复沉寂多年的《西泠艺丛》社刊,2004年改名《西泠印社》,以一年四期的丛书形式出刊,内设学术专论、社史钩沉、人物专访、社藏撷珍、社员成果、海外学术、书画市场、新书推介、各地印社、印人玉屑等栏目,每期确定一个主题,配合社团活动和印学理论研究状况展开报道,挖掘、汇整了一批以往关注较少的文献资料,刊登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成为广大社员和篆刻书画爱好者研究、创作、展示、交流的平台,广受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人士关注。

2014年,在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下,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2015年1月起,社刊恢复《西泠艺丛》刊名并正式出版,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3-1393/J。至此,百年西泠重新拥有了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月刊)。新出版的《西泠艺丛》坚持以沙孟海社长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为学术方向,以打造印学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为目标,坚持三大办刊原则,一要在文化、大社会背景下,站在印学研究领域的制高点;二要全面展示“百年西泠”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新世纪“天下第一名社”应有的形象和风采;三要开门办刊,成

为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开展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平台。同时,作为西泠印社的社刊,《西泠艺丛》也是社员艺术、学术交流的核心理平台。从2015年以来,《西泠艺丛》一方面依托西泠印社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和文博系统的研究专家组建专家库,建立特约组稿人、学术主持人制度,每期确定一个核心的学术研究专题,辅以综合学术研究;从2020年起又增加“博硕士学术研究论坛”栏目,鼓励和凝聚高等院校硕博人才共同参与到印学研究中来,既为《西泠艺丛》编辑部建立起一支兼有印学研究领域顶级专家、中坚力量和青年才俊的专家队伍,又为培养印学研究年轻人才搭建起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建立了年度编辑研讨会机制,作为每年印社秋季雅集活动的重要议程之一,邀请业内著名学者专家共同研讨印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同时为《西泠艺丛》做好选题储备。《西泠艺丛》编辑部还结合印社年度学术主题,组织开展“‘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西泠印社建社以来印学研究流变与未来方向”专题研讨会,构建“展览+学术论坛+专刊”的创新模式,使西泠印社学术活动得以最大限度调动、集结社内社外多方学术资源,形成多元联动的立体的学术建设新格局。

(三) 学术建设的新导向与新格局

在打造学术品牌、拓展学术平台的同时,西泠印社还通过加强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格、提高学术质量。在此基础上,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之后的十年间,更是站在“世界印章史”的视野下,倡导“学科交叉”“文明交融”,提出建构当代“大印学”的新格局。

在提升学术品格和提高学术质量方面,西泠印社首先对学术研讨会征稿主题进行了学术导向性设计,如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2006年)、明清徽州篆刻学术研讨会(2008年)、“吴门印风”明清文人篆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等,其中



◎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

的个案研究,有增进对明清篆刻史认知的,有推动西泠印社史研究的,更有填补印学史空白的;其次是强调印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如2015年《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中明确要求“论题范围包括1949年迄今的篆刻艺术现象、篆刻创作技法、篆刻风格传播与承递、篆刻审美与批评、篆刻教育与出版等。凡涉及人物研究者,仅限于对现当代篆刻创作风格技法有重要影响的已故篆刻家的艺术理念和技法的评析,谢绝一般性的以人物介绍或评述为主题的论文”;再次是在每次学术研讨会的总结环节,在对论文评选过程的基本情况、出现的问题进行点评分析的基础上,对论文选题指向和研究方法提出指导意见。与此同时,规范论文评审规则和评审程序,对稿件的分类及处理、评委会和监审委员会的工作职能、论文评审流程及现场答辩审核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学术研讨活动的组织方面,强调分类意识,以印学、书画、金石考据与版本谱籍、社史研究等为大类,再将印社之核心印学细分为古玺印、篆刻流派与人物、篆刻学与印文化、篆刻技法与审美四大类,合为七大类,同时包括古文字、鉴定收藏、版本典籍研究,以印学、篆刻学为主流,强调“诗书画印兼能”。如2013年西泠印社110年社庆“百年西泠·金石华章”系列活动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拓宽学术研究视野、促进多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交叉和成果共享交流为导向,征稿范围

除印学之外，还涵盖了书学、画学、金石学、文献学以及鉴定收藏、西泠印社及现当代艺术社团研究等诸多领域，研讨专题包括“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与人物研究”“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金石铭刻与谱籍研究”“书法与绘画研究”“印学社团研究”等方向，其中有补前贤所未及的，有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更有填补印学史研究空白的，还有海外学者以印章为载体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展开深入探究的，研讨成果丰硕，组织成效显著。

从新百年新目标的提出，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随着学术品牌的树立、学术平台的拓展、学术质量的提高以及在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西泠印社遵循沙孟海社长“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和饶宗颐社长“东学西渐”的宏伟构想，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诗书画印综合兼能”，对社团学术建设从观念到实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延展，以传统印学、篆刻学为基核，扩大视野，在以篆刻艺术创作、古典印学印史印家印作印派研究作为品牌基础上，向“战国玺印”“封泥”“汉玉印”等的多形式、“全印史”式交融；“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年），接续传统金石学并加以光大；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将文献学与印学相融合；“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跳出传统印学格局，关注世界文明史视野中的印章文化，其中的一百多篇学术论文，构建起对世界印章史的基础认知框架。这些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成果，不仅是相关学科领域具有开创性和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更是贯彻新时代西泠印社“学术立社”创新观念创新实践的最新成果，构建起新时代西泠印社“大印学”研究的新格局。

新百年西泠印社学术格局的拓展和水准的提升，在社团组织建设的同时，也有社员个体的学术贡献和成果依托。这一时期的前后两位社长——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可谓印社的学术标杆，两位社长皆为享有盛誉的学界耆宿，兼具深厚的艺术修养。启功先生具有古典传统的文史之学，诗词、书画、文物鉴赏造诣精深；饶宗颐先生学贯古今、融通中西，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有开创性的研究，享有崇高的国际学术声望，并精通诗、书、琴、画。作为学界泰斗和西泠印社社长，一方面显著提高了西泠印社的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彰显了西泠印社以“学术立社”、倡导传统文化综合素养的社团建设理念。与此相呼应，诸多社员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和深掘，取得累累硕果。如朱关田持续致力于唐人书学研究和吴昌硕研究，其著作《唐代书法家年谱》《颜真卿年谱》《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等，均为填补学界空白之成果，又编著有《吴昌硕年谱长编》《吴昌硕纪年书法绘画篆刻录》等；黄惇持续深耕印学领域，所编《中国印论类编》为目前收录文献最丰富、最具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印学工具书，其《中国古代印论史》代表了当代印论研究的最高峰，为印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孙慰祖在古玺、封泥和篆刻研究领域持之以恒，出版有系列论印文稿及《封泥：发现与研究》《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陈鸿寿篆刻》《邓石如篆刻》等，所著《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是迄今为止向海外系统介绍中国印章的第一部大型学术专著，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封泥全集》为目前出土封泥的集大成之作，获得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理论研究方向）。除了前辈学者的高质量成果产出，一批中青年学者后继有为，其中相当部分持续多年参加西泠印社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并通过西泠印社学术评奖活动加入西泠印社，经过西泠印社多年的学术训练，具备良好的知识积累和活跃的学术敏感度，他们多从个案入手，通过细致的文献发掘和考证，逐个填补篆刻史研究空白，为印学研究的进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西

泠印社及社员近二十年的印学研究成就，代表了当代印学领域的最高水平，不仅在海内外印学界具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也展现了百年西泠在新世纪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道路上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人才吸纳与培养的模式创新

百年社庆之后，西泠印社遵照第十一次社员大会确定的新百年发展规划目标和十项举措要求，将人才吸纳和后续培养相结合，注重艺术人才综合素养的培养和提升，尤其在入社条件中加大了对综合文化素养的考核比重，在吸纳人才方面的模式创新上呈渐进式推进。

根据“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发展要求和“质量第一、宁缺毋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西泠印社2003年后的吸纳新社员，最初采取特邀入社、评展获奖入社和常规发展入社三种方式。对在海内外诗书画印创作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或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有突出建树，并热心西泠印社事业发展的专家学者和领军人物，采取特邀入社；创作评奖入社从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开始，不断完善评选规则，在稿件评审基础上增加综合能力现场测试环节，测试内容包括印学史、印论典籍、论印诗以及综合文史知识等，最高奖级获得者经社长会议审议通过后吸收入社；常规发展入社，严格程序，制订规范化的人社标准，增加透明度，做到规范、公开、科学，并突出对吸收中青年社员的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能力的要求，同时在总体上综合考虑地域、年龄、专业领域等方面的平衡。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出，使西泠印社汇聚了更多有真才实学的年轻艺术人才，在海内外篆刻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以上三种方式中，最具创新意义、印坛影响最大的，当属评奖入社。2007年，西泠印社以无门槛选拔的形式，创新推出“百年西泠”大型篆刻“海选”活动，在海内外设立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多个分赛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工作点，以分赛区选拔、集中评审的方式，最大限

度地调动海内外艺术界同道共同参与，经过分赛区评审层层选拔，遴选出创作实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选手参加杭州总决赛，通过现场艺术创作和文化素质综合测试，再选拔出排名居先的数名佼佼者，经审议通过后直接吸收为社员。其“海选”的运作理念和赛区制的运作方法，均开国内书法篆刻界之先河，在海内外篆刻艺术界再一次引起极大反响，被业界誉为“篆刻界的奥林匹克”。它一方面通过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亲民性的活动程序设计，最大范围、最高程度地动员了海内外篆刻创作的中坚力量，发现和扶植了一大批中青年艺术人才，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公众对印文化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分赛区的形式，最大限度地集聚了篆刻界相关组织资源和专业力量，促进了西泠印社与各地文联、书协、印社等的联系和交流，切实提高了篆刻创作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海选”选拔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西泠印社在评展内容上也推陈出新，从原有的以篆刻、书法为主，扩展到诗、书、画、印等多项艺术门类，将西泠印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中的“兼及书画”创新发展为“诗书画印兼能”，承续并彰显了新世纪西泠印社提倡艺术家博通兼能、注重传统文化综合素养的理念。对评委组成也大胆改革，打破社团身份界限，邀请全国各省级主要印社社长参与评审，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国际篆刻艺术评展的诚信度、公信力和品牌信誉，另一方面更大程度提高了西泠印社的国际威望和学术号召力、社团凝聚力。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西泠印社具有独创性的“海选”机制，现已成为篆刻领域专业选拔和评审的制度范本，引导了一大批篆刻艺术界新秀茁壮成长，并将继续引领海内外篆刻艺术界同人向着印学的广度和深度开拓前行。

从2008年开始，西泠印社在“新社员发展工作实施细则”中增加了学术评奖入社的新举措：“凡印社主办、列入社团年度主题性活动并在征稿启事中明确标注纳入评奖入社条件的大型学术研讨活动，经评审委员会确定，获最高奖级的社外作者列为本年度学术评奖入社提名名单，提交社长会议审议通过后，吸

收入社，并通报理事会。”旨在持续提升西泠印社的学术品格，提高学术质量，不断吸纳和培养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优秀人才。经过十余年的实践，2019年，又出台了“西泠印社学术论文评审工作实施细则”，对学术论文评审机制的建立、评审程序作了详细规定。首先，组建了包含篆刻史论、古玺印研究、古文字研究、当代书法篆刻创作与研究、金石学研究、书画史论、美术考古、古文献研究、文物鉴藏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世界史研究等方向的评审专家库，除社内专家外，还聘请相关学科领域具有较高成就和较大影响的社外专家，以保证评审质量与印社学术研究的相发展相匹配；其次，为确保评审的公平公正，规定了每次评审委员从专家库相应组别中随机抽取产生，原则上每轮评委互不重复，评审前根据评审规则和组织纪律签署“评委承诺书”，评审结果按规定公示，并组建由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负责的监审委员会，对整个评审过程进行监督；再次，规范评审规则，严格实行三轮评审程序，每轮每位评委审阅论文后独立提交本人签名的评审意见，统计结果由全体评委确认签名，入选论文预备名单、获奖论文提名名单均经过机检查重；对于设有学术评奖入社或其他情况确有需要的，在三轮评审基础上还增设现场答辩环节。同时，常规发展入社经过多年的探索，也逐步建立起新社员推荐入社提名标准，其中多项要求与学术研究成果相对应，在形成了规范化、制度化的可操作机制的同时，仍凸显了对学术研究的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西泠印社学术建设不仅与社内外专业资源的整合、学术平台的建构、学术活动的组织相关联，更与印社乃至印学领域人才成长的模式创新紧密结合，新百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正在深刻改变当代篆刻艺术传承发展现状，并将对未来篆刻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结语

回顾西泠印社创立至今的一百二十年学术研究历程，创社之初先贤们提出的“学术立社”的观念，不仅贯彻于西泠印社早期发展的始终，更在新时期以来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不断推陈出新，从“保存金石”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到“诗书画印兼能”，进而进一步向“现代金石学”延伸、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世界印章史拓展——提出构建当代“大印学”研究新格局，实现了从观念到实践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与超越。

我们看到，西泠印社从社员独立研究到印社主导、组织学术建设，不仅为中国印学研究奠定了整体的框架性建构，更由沉潜而发新知，对海内外印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西泠印社的学术发展史在当代篆刻和印学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印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高度，在海内外艺术社团中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相对其他成熟学科而言，印学还处在起步和启蒙阶段，距离建构现代印学学术体系，路途还很遥远。面对历史和现状，西泠印社唯有不断拓展印学研究的方向和边界、深化和提高印学研究的深度和水平，锲而不舍、始终不渝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发展担负起推动、引领和示范作用，才能实现“印林之发轫、美术之扩张，首在吾六桥三竺间”^[21]的愿景。

（秦 陶：原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西泠艺丛》常务副主编）

学术化构建、大众化普及与边缘化处境

——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历史境遇探赜

文 / 崔宗旭

【摘要】

进入民国以后，传统学术面临西方学术体系中分科治学的时代诉求。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金石学人不遗余力地对金石学进行阐释以及学术化构建，但作为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金石学很难在“分而治之”的西方学术体系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一些学人亦尝试将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但囿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时代环境，此举收效甚微。金石学在民国面临的这一尴尬处境一直延续至当代，然而这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开启了另外一个方向：与其不遗余力地追求成为一门学科，不如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一种学问。

【关键词】 金石学 学术化构建 大众化普及 民国时期

金石研究肇始于北宋，不论是皇家还是文人士大夫皆乐于收集金石古器。由宋而至元、明、清四朝，积累了大量的古器物 and 文献资料。至清代考据学大兴之后，金石学于学术研究一途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晚清入民国，金石学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或者更准确地说，面临着西方学术体系在中国学术领域内落地生根之后提出的挑战，比如考古学者对传统金石学研究提出的批评和指责，以及金石学到底能否算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学科门类等。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金石学研究者一方面着力于将金石学进行体系化的学术构建，一方面则尝试着将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

一、“为金石而金石”：

民国时期金石研究的体系化学术构建

（一）金石学研究范围的厘定

20世纪初期，一些新的考古发现震惊了学术界：甲骨文的发现，西北简牍的发掘，敦煌经卷的整理等。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内，并没有与西方所谓的“考古学”相对应的学术门类，如果必须找到一个相关的学术方向，只有“金石之学”与之相关。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一些金石学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将甲骨文、简牍等新发现材料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颇有些“与时俱进”的意思，但此阶段最大的“时”不仅仅

[21] 鲁坚：《西泠印社记》，《西泠印社志稿》卷四。



© 朱建新著《金石学》1940年出版

是新材料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如何使得金石学获得西方学术体系的认可。

如上所述，对于研究范围的界定，是此一时期金石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前提。对于新发现的材料是否应当归到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金石学研究者的意见并不统一。金石学者朱建新在其著作《金石学》一书中阐述了他对金石学的理解：“‘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虽然朱建新在这里把研究对象定位为金石，但是接着又说：“近世地层发掘，愈见进步，古物出土之种类亦愈多，殷墟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皆有专载；虽不尽属金石之范围，而皆得以金石之名赅之也。”^[2]所以在朱建新看来，应当将甲骨等新材料纳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马衡同样在其《中国金石学概论》一书中将甲骨文等新材料纳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物质名称虽不足以赅之，而确为此学范围以内所当研究者，

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而已”^[3]。在马衡看来，“金石学”应以学科名称看待，不能以物质材料为限。历史学家刘节则在《中国金石学绪言》一文中持同样的观点，“然为斯学者，率皆附庸金石，卒未尝有人正定其名”^[4]，亦将甲骨、陶器等置于金石学的学术框架之内。

然而，将甲骨文等新材料纳入金石学范围之内，引来了很多人对“金石学”名称的怀疑。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研究议》中直言金石学之名与金石学研究之实并不匹配，“卒未尝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学。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5]在罗振玉看来，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比金石学更加广泛，包括礼器、乐器等十五个种类，其划分种类的依据并不以古物的制作材料为标准，而是以其功能划分。其子罗福颐在《古器物学概说》中对“古器物学”的使用缘由做了陈述：“颐以为金石学失之于隘；考古学失之于泛，又易于与欧洲考古学混杂；不如古器物学，尔雅得当，可为东方考古学特有之名辞。且于古代遗物，金石陶瓷，甲骨玉料，竹木缣素，莫不毕收，故此篇舍金石、考古二名，而用古器物学为篇题。”^[6]虽然不知罗福颐之说法是否出自其父罗振玉，但其文章中所列出的古器物学研究范围比其父罗振玉划定的范围更加宽泛，含金、石、甲骨、简牍、经卷、印章、陶器、造像、书画、刺绣、陶瓷、沙器、颜料、文房等二十八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罗福颐的“古器物学”过于泛化，在面对西方学术“分科”的学术规范时，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古器物学”之名在当时响应者寥寥，虽然沈维钧在《中国金石学之过去及其材料》中提到了罗振玉因古物大量出土而认为金石

之名难以概括故而将其正名为古器物学之事，但是其文章标题及行文中依然用“金石学”之名，由此可见“金石学”名称的学术惯性之强大。

当然，也有人直接反对将甲骨文等材料置于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内，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讲义》序言中指出：“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惟既名曰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而所谓甲骨陶玉木竹各类之有文字者，自不能混合于金石之中。”^[7]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虽然陆和九并不赞同将甲骨文等材料纳入金石学范围，但是在其《中国金石学讲义》这本书中却仍然将甲骨文等内容置于“前编”中，也许这是陆和九想要坚守“金石学”之名又不知道如何处置甲骨等新材料的权宜之计。

此阶段金石学研究范围的拓展，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金石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和文字学研究关系紧密，而新出来的甲骨文、经卷、简牍等都和文字学研究有关，故而金石学不能对这些材料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艺术视角亦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而新出的甲骨文、经卷、简牍等材料亦是书法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故而金石学研究将之纳入研究范围亦无可厚非。

（二）金石学研究方法的重视

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虽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看，主流观点是将新出土之材料纳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研究范围既定，研究方法就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重心。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研究议》中提到了四种研究方法：鉴定、传拓、模造与撰述。此四种方法中，鉴定、传拓与撰述皆古人传统治金石之法，唯有模造一法为罗氏首提。沈维钧认为此法甚为重要，可以将海外流传之物依照此法模造，补国内之缺憾。^[8]然而此四种方法主要着眼于古器物的流传，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方法。

真正从学术意义上提出研究方法的是马衡，他在其《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中显示出了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并专门列出“今后研究之方法”“材料处置之方法”，然而遗憾的是，这两章内容并没有留存下来。此书为马衡20世纪20年代于北京大学执教时的金石学讲义，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两章的内容，但是从其作为教学讲义的形式来看，这种方法论的视角肯定是基于一种学术和学科的构建。晚于马衡的沈维钧在其《中国金石学之过去及其材料》中同样对金石学的研究方法给予关注，并且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旧方法之改良：前人利用器物上花纹文字，以断定其年代，虽称精确，然遇素器，无法目验，今后宜利用科学，分析其质料，别辨其色泽，考察其作风，如此则虽无文字花纹亦可推定其年代及真伪矣。

（二）新方法之引用：例如有地质学知识，用崖层状况，判定地下古物之年代，有人类学知识者，可考出头颅骨骼之派别。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获益甚大。^[9]

可见沈维钧已经注意到了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同时也关注到了此一时期对于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的价值和意义。此外，沈维钧建议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应用到金石学研究之中，如地质学和人类学知识，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前卫的。对于这一点，刘节在《中国金石学绪言》中也建议参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今后之治斯学者，则当随近世之考古学之新趋势以求其方法之进步焉”^[10]。

同样关注金石学研究方法的还有朱建新。也许是想弥补作为金石学专著的《金石学》一书中并无方法论内容的遗憾，朱建新在出版《金石学》之后，又专

[1] [2] 朱剑心：《金石学》，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3]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4] 刘节：《中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期，第64页。

[5] 罗振玉：《古器物学研究议》，《湖社月刊》1931年第40期，第114—115页。

[6] 罗福颐：《古器物学概说》，《历史与考古》1946年第1期，第5页。

[7] 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 沈维钧：《中国金石学之过去及其材料》，《艺浪》1936年第2卷第2—3期，第10—11页。

[9] 沈维钧：《中国金石学之过去及其材料》，《艺浪》1936年第2卷第2—3期，第12页。

[10] 刘节：《中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期，第73页。

门刊文《论研究金石应具之辅导学识》谈论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余前撰《金石学》一书，既略述金石学之名义，价值，及其历史……今当更进而言其研究之法。”^[11]朱建新在总结归纳前人的研究方法之后，得出了六种研究方法：“一曰访求，二曰发掘，三曰整理，四曰鉴定，五曰考释，六曰著录。”^[12]该六种方法基本涵盖了金石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文末朱建新总结道：“故研究之法，综合言之，须兼梁氏所谓骨董家与史学家二者之方法，始能尽之，始有所得。当其穷一器也，必须深入乎其中，而始有所得；当其察一物也，必须恒通乎其外，而始能尽之。”^[13]此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这种具有内外结合特征的研究方法可算是金石学研究的纲领性原则。据朱建新自述，他曾撰写了《金石学研究方法》一书，该书在其生前未曾出版，但是其中多篇文章发表于《世界文化》和《真知学报》等。原书分为《绪论》《访求》《发掘》《整理》《鉴定》《考释》《著录》《欣赏》《保存》九章。此书乃民国时期唯一专注于金石学研究方法之专著，书中关于金石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和论述是否科学暂且不论，其于金石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重视表明此一时期金石学界已然注意到了方法论对于金石学学术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三）金石学与考古学的论辩

不论是厘定研究范围，还是重视研究方法，金石学人都志在将金石学构建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对于这一点，陆和九在其《重订中国金石学序》中说：“既不为小学所属而守旧，又不为考古学所范围而矜新，俾金石学成为中国一种独立之科学，借以证实古代民族之思想、宗教之派别、社会经济之状况，不致奉东西各国学人为师、拾彼牙慧以自雄也。”^[14]从

陆和九的话语中似乎能够读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色彩，然而其意欲使得金石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想法是明确的。金石学与小学之关系，古人多有论述，自不待言。然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确是此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历史学家刘节在《中国金石学绪言》中提及金石学与考古学之关系时说：“迨最近数十年，考古之业益精，而金石学之名不足以范围之矣。”^[15]在刘节这里，金石学与考古学是研究范围大小的问题，考古学研究范围广，金石学研究范围窄。张永康在《中国考古学概述》中专门提及治考古学之人要注意金石学和考古学之区别：“然于中国今日而倡此学，有一蔽焉，盖以斯学之于金石学，可一而不可二也。夫金石学之于考古学，其关系本至为密切，而于其方法及材料，则分类甚为明显……读者其注意焉。”^[16]与众多学人在文章或者专著中只言片语提及考古学不同，考古学家黄文弼专门撰文《考古学与金石学》来厘定考古学和金石学之关系。他在文章开头就直接指出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区别：

中国为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丰富之国家，先民遗物遗迹，留存于地上与地下者，位数甚多。但作考古学之工作，从事实际调查发掘者，则自近代始。在此之前，虽有一般学者注意及古器物之研究，并从事于著述搜集，但所注意者，以金石上之文字为主。形式花纹及其他无文字之遗物皆从摒弃，且其古物之来源，大概得之于古董商之手，地域不明，真伪混杂，故以前之考古学，只可成为金石学或古文字学。^[17]

在黄文弼看来，传统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多限于文字学，而考古学则不局限于此，此为二者区别之一；考古学对研究对象的来源、地域、真伪等情况要求非

常严格，而传统金石学则不然，此为二者区别之二。作为一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梳理古代金石学著作之后总结出了考古学相较于金石学的学术优势：“一、范围大；二、年代精确；三、地域分明。”^[18]最后得出结论：“总之，今之考古学为科学的、现代的、世界所共有的，与旧时专以研究金石文字为对象者不同也。”^[19]虽然言明二者不同，但是黄氏本人作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的优越性不言自明。此处也表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金石学与西方学术体系中的考古学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其实在民国时期，考古学界不仅不愿与金石学画等号，还对金石学多有批评，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既然金石学无法与考古学画上等号，自然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学术体系。不过对于这一点，金石学家朱建新不仅不担忧，反而踌躇满志：“唯窃意抑有进者，金石之学非必须凭借他学而始能成立，亦并非有裨于他学而始有价值。金石学者，自成专门独立之学，其本身自具研究之价值。我人研究斯学，其态度当为‘为金石而金石’，非徒以此为工、为津梁，目的既达，既无需乎此也。”^[20]从金石学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此时的朱建新似乎有些盲目乐观了，其实这一点早有征兆，因为朱建新所谓的“为金石而金石”理论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之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广播于有众”： 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大众化普及

在对金石学进行学术构建的同时，金石学人亦找到了金石学研究的另外一个进路：大众化普及。在民主、救国、抗战等语境之下，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

不断拉近文化艺术与民众的距离来提高大众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以及自信度，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抗敌卫国发挥其自身的价值。

（一）大众化普及的社会条件：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印刷技术的进步

进入民国以后，大众传播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这与出版印刷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清政府颁布《大清著作权律》，这使得我国版权保护走上了法治化道路，为民国时期出版事业的繁荣奠定了法治化基础。“从出版的角度而言，近代版权制度肯定了书稿的商品属性，正式拉开了书稿商品市场的序幕。它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在组织生产、编辑思想、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中国出版业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21]而到了民国时期，出版行业则进入了迅速发展的繁荣期。“民国出版史年代跨度虽然不长，但在出版史上却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承接晚清时期萌蘖而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一路发展下来。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手段更加成熟，规模化经营的产业特征更加明显。”^[22]从出版机构数量上来看，据吴永贵的研究统计表明，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和个人出版实体有一万多家。^[23]从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数量来看，《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数量研究综述》做了较为详细的统计，“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数量已超过20万种，其中丛书近6000种，而期刊出版量也在2.5万种左右”^[24]。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出版业是相当繁荣的，这为金石学研究者进行大众化普及提供了非常好的普及渠道。

除了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外，印刷技术的发展同

[11] [12] 朱建新：《论研究金石应具之辅导学识》，《真知学报》1943年第2卷第6期，第20页。

[13] 朱建新：《论研究金石应具之辅导学识》，《真知学报》1943年第2卷第6期，第24页。

[14] 沈维钧：《中国金石学之过去及其材料》，《艺浪》1936年第2卷第2—3期，第73页。

[15] 刘节：《中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期，第59页。

[16] 张永康：《中国考古学概述》，《湖南大学季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17] 黄文弼：《读书通讯》，《湖南大学季刊》1942年第47期，第2页。

[18] [19] 黄文弼：《读书通讯》，《湖南大学季刊》1942年第47期，第3页。

[20] 朱建新：《论研究金石应具之辅导学识》，《真知学报》1943年第2卷第6期，第24页。

[21]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2]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23] 吴永贵：《中国出版史·近现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53页。

[24] 卜军钰、何雨谣、吕思毅：《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数量研究综述》，《文献与数据学报》2022年第4卷第2期，第100页。

样对于金石学的普及至关重要。对于金石学人来讲，普及金石相关的内容，除了文字内容之外，图像呈现非常关键。如何呈现出高还原度的金石图像，是普及金石学时需要解决的印刷技术问题。幸运的是，民国时期的印刷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民国时人对印刷术非常重视，“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相抗衡”^[25]。因此，在民国时期，印刷技术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此一时期通行的印刷术有凸版铅印、平版胶印、珂罗版印刷、雕刻铜印、照相锌版、石印等。其中，珂罗版印刷技术对于此一时期文化艺术出版至关重要，特别是其具有图像印刷精确度高的优势。《神州国光集》在其刊发的广告中将珂罗版印刷术作为其卖点之一，并指明了珂罗版印刷的优势：“用至新发明之法，苦心研究，务臻于精良优美之极点，故能丝毫逼真，光彩夺目。”^[26]而台湾学者王正华则敏锐地发现了珂罗版印刷与古器物传播的关系，他认为珂罗版印刷术能让普通读者观赏属于“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文物世界，而且珂罗版画册的可见性与物质性为古物带来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影响力。^[27]金石学的传播普及必然要面临如何最大化还原金石古器物图像的问题，而珂罗版等技术的应用无疑为之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手段。

（二）大众化普及的理论倡导：金石学普及与国家建设

1935年聘陆在《唯美》杂志上发表了《金石学大众化》等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要将金石学普及大众的倡导和建议。聘陆提倡将金石学大

众化，源于身边有人批评研究金石是“玩物丧志……金石学是亡国的东西”^[28]，但是在聘陆看来，“金石学不仅不是亡国的孽西，正是救国的东西”^[29]。对金石学研究的这种“爱国”定位，是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当然，这种从“金石学”到“爱国主义”的递进，颇有些曲折，聘陆解释道：“研究了金石学，便可以知道我国古代文化的发达，学问的高深，艺术的精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30]祝嘉同样认为应当将金石纳入社会教育之中，但是他是从西方博物馆的视角来阐释自己的主张，“至十九世纪，新式之博物馆乃一变而为研究学术之场所，教育之中心，而古物乃由珍玩时代进而为科学之研究，由秘藏改为公开展览，为教育之工具”^[31]。在这里，祝嘉看到了古代器物对于大众的教化作用，“况在建国、抗战二者并重之今日，而建国尤为国家百年之大计，应发扬固有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力，则使国民明了我国数千年之历史，认识我国固有之文化，乃为其原动力”^[32]。因此，祝嘉认为，不仅学校教育需要引入金石学，即使针对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同样要引入金石学，也就是将金石学普及人民群众。持有同样论点的还有余绍宋。余绍宋关于金石及书画对国家建设的价值表述得更加直接：“吾国苟欲跻于真正文明之域，自非阐扬固有之文艺不为功。而欲事阐扬，则必以所固有者广博与有众。”^[33]余绍宋同样认为，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必须将本国的文艺传播于大众之中。要而言之，聘陆、祝嘉及余绍宋他们都认可金石书画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而这种历史文化价值只有根植于民众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促进民族进步和国家强盛。

（三）大众化普及的实践案例：从《故宫周刊》到《金石书画》

聘陆在《金石学大众化之一》一文中对普及金石学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点是要注意大众化群体的特征，“大众大概都是忙于找饭吃，是少闲的”^[34]，因此普及金石内容需要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他自己也在后续的一系列文章中用较为直白朴素的语言对金石学的含义、分类、功用、原委、研究对象、著作等做了简要的介绍。祝嘉同样提到了如何进行大众化普及的问题，但是在祝嘉这里，他更强调利用图像进行传播，“应将现代公私所藏金石、图像与文字并拓，或以照片影印之，大小与原物相同，附以简要之说明，以广流传”^[35]。祝嘉虽然注意到了拓本和图像相比较文字更易于传播，但是“大小与原物相同”的这种拓片或者照片模式，其实并不利于传播。对于这一点，余绍宋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他认为这种拓片或者照片价格高，流传数量少，“其于广播之道，去之尚甚远矣。广播之法，莫捷于报纸，而在有声誉之报纸，其奏效也尤捷”^[36]。因此，在余绍宋看来，想要将金石书画传播于民众之中，必然要借助于报纸杂志。

此一时期刊登金石内容的报纸杂志主要有《故宫周刊》《金石画报》《鼎齋》《金石书画》等。《故宫周刊》主要以介绍故宫所藏之古董藏品为主，其中必然包含一些金石藏品，然金石藏品在其中所占比重不大，而且该刊物绝非以普通群众为自己的受众群，其鲜明的学术性似乎将普通受众拒之门外。《金石画报》编辑者在发刊词中一方面强调研究金石书画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一方面同样认为“提倡而保存之，亦吾侪应有之责也”。然而虽然《金石画报》名称中有“金石”，也刊登了一些介绍金石内容的文章，但是其主要内容并不在金石，而且其内容一方面侧重于



◎ 《故宫周刊》



◎ 《金石书画》

当代书家的推介，一方面侧重于书画学术内容的介绍，对于普及金石学而言，功用不大。《鼎齋》上同样刊登了一定数量关于金石的内容，包括图片和文章。但是这本期刊一方面以刊登文章为主，图片主要是书法和绘画，此外，其内容较为学术化，并非致力于普及金石的大众化刊物。

相较而言，余绍宋负责编辑的《东南日报》的副刊《金石书画》则显得更像是一个为了普及金石书画的大众化刊物。如前所述，余绍宋深明传播金

[25]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26] 《国粹学报》1909年第3期。

[27] 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ies in Modern China, circa 1908-1917, in Joshua A. Fogel,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 274.

[28] [29] [30] 聘陆：《金石学大众化》，《唯美》1935年第1期，第19页。

[31] [32] 祝嘉：《金石学与现代教育》，《教育与社会》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52页。

[33] 余绍宋著，王翼飞、余平编校：《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

[34] 刘节：《中国金石学绪言》，《图书季刊》1934年第1卷第2期，第64页。

[35] 祝嘉：《金石学与现代教育》，《教育与社会》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52页。

[36] 余绍宋著，王翼飞、余平编校：《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61页。

石书画于大众中去的价值的意义，而且他也知道报纸杂志是最有利于传播的渠道和方式。《金石书画》在编辑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即只发布金石书画的图像，会有一些简单的文字介绍，但并不对图像进行过多的阐释。这一点是余绍宋在决定开始主编《金石书画》时就强调的原则，他甚至因为副主编王季观在编辑时加入过多的个人论述而与之争论。因为在余绍宋看来，古代的金石书画本身的内容已经足够丰富，需要观者自己去体会感受，如果编辑过多地发表个人见解，则会影响观者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余绍宋从一开始决定担任《金石书画》主编时就确定了此刊物将金石书画内容广播于大众中的定位。而且余绍宋主编的《金石书画》初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前后共持续长达三年，可以想见其收录的金石书画数量之多。此外，为了更好地呈现金石书画原作实物的原貌，余绍宋坚持摄影制版然后印刷，“藏家愿以所藏刊布，而不欲原物出门，请函知本刊，当就尊斋摄影；异地藏家以各稿见寄，经采用而不愿受酬者，摄影费用由本刊偿还”^[37]。要而言之，意欲通过报刊将金石广播于大众，图像的真实程度、作品的数量广度、编辑者的大众化立场都是非常关键的要素，从这三个方面来说，《金石书画》在金石大众化普及方面的成绩应是首屈一指的。

三、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学术困境及社会境遇

学术化构建和大众化普及是民国时期金石学研究的两种进路，不可否认，金石学人在这两个进路中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从学术化构建方面，还是从大众化普及方面，金石学并未像那些致力于金石学研究的学人希望的那样，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在大众之中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似乎这两条路都没有走通。

于学术化构建一端，金石学在民国时期学术体系中的身份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金石学研究者不够努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金石学自身的学术特征来看，正如陈振濂所指出的那样，金石学本身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古文字之学与目录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玺石学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连接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的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的存在”^[38]。但是在面对注重学科分类的西方学术框架时，金石学这种具有“交叉学科”特征的属性不仅不是一个优势，反而使得其在学术体系和学科坐标中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论及历史，有历史学一科，谈及考古，有考古学一科，因此，当国人初步按照西方学术体系改造传统学术时，似乎并不需要一个“多面孔”的学科。从这个学术环境来看，“从我国学科制度化的历史来看，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自1895年甲午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暴力征服中，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除旧布新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立场，西方的思想文化及其学科分类体系开始全面被知识界接受”^[39]。民国时期的学人在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希望拿古代传统的学术门类与西方学科进行对应，然而在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并没有一门学科能和金石学对应起来，而且唯一和金石学联系紧密的考古学似乎不愿“与之伍”。考古界的学人对于金石学批评甚多，考古学家李济在其文章《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对金石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批评金石学与艺术距离太近从而“‘古器物’化为了‘古玩；‘题

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盖了‘了解’”^[40]，随后又批评金石学研究中的器物出土地不明、出土记录空缺、器物标本范围狭窄等。这就使得金石学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显得更加尴尬。而从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关于金石学研究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领域，金石学的地位在不断地被边缘化。

于大众化普及一段，金石学同样面临着尴尬的境遇。如前文所述，金石学人希望通过普及金石知识和器物，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甚至激发爱国热情。这种视角，从理论阐释角度，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忽略了——民众的需求。从艺术生产理论来看，既要有生产，同时还要有消费需求，只有当民众具有金石内容消费需求的时候他们才会去消费这些金石相关的报纸杂志及其内容。但是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的民众文化消费情况时发现，相较于通俗文学、电影、戏曲等大众通俗文化商品，金石学相关的内容似乎很难引起民众的兴趣，另外在面对内战或者抵御外侮的时代环境中，当生活并未富裕安稳甚至面临着战争威胁的时候，能够有多少普通民众有心情和兴致去欣赏金石器物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蕴。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金石学这种综合性的学术门类，对于文化知识积累有限的普通大众来说，其门槛显得高不可攀，像是一个“高冷”的美人，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关于金石学进行大众化普及的困境问题，金石学内部研究人群应该是有共识的，因为反观整个民国时期，提倡金石学大众化的人屈指可数，刊发金石学内容的刊物和研究金石学内容的文章同样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骋陆、祝嘉及余绍宋等提倡推广金石的倡议，似乎具有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希望以金石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甚至

激发爱国热情的良苦用心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更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四、结语

金石学是传统学术中非常重要的一支，不论是证经补史，还是考订文字，抑或考察艺术发展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入民国以后，金石学人在对金石学的学术构建、阐释及大众化普及等方面不遗余力，然而此时的学术环境及社会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金石学在现代西方分科学术框架之下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而其“高冷”的社会形象以及较高的知识门槛又使得普通人望而却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入近现代以来的金石学逐渐走向被边缘化的处境似乎是一种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当书法、篆刻逐渐被学术体系所接纳的时候，金石学仍然没有摆脱其模糊的学术定位。因此，在梳理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学术构建、大众化普及和历史境遇之后，也许这才是金石学可能的发展方向：在当前主张分科治学的学术体系之下，与其追求成为一门学科，不如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一种学问。

（崔宗旭：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37] 余绍宋著，王翼飞、余平编校：《余绍宋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261页。

[38] 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艺术百家》2008年第3期，第12页。

[39] 程从柱：《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性审视——学科史的视角》，《皖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第101—102页。

[40] 李济：《安阳》，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7页。

“印学话西泠”： 论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

文 / 吴彦颐

【摘要】

研究印学，必然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西泠印社的印学构成所涉及的领域绝非单一，而是通过多元或多样性的方式积极开拓学术新领域。2020年11月，陈振濂先生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上提出新的概念——“大印学”，此后就“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抒发己见，顺应时代潮流对当代印学研究的引领和拓展。本文以西泠印社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观照“大印学”，试图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其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两大块进行不同维度和层面的探讨。前者包括对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的研究、对印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西泠印社史的研究三个部分；后者体现在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学科意识四个方面；旨在管窥百年名社在印学发展中的转型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泠印社 大印学 研究范围 学术意识

所谓印学，就是研究“印”的发生、发展、转变以及技法、风格、形式诸原理和规律的学问。研究印学，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作为西泠印社的宗旨之一，“研究印学”并不只是专门探讨篆刻艺术之技法、发展历史及各篆刻流派艺术理论，而是涵盖了从古玺、汉印到明清流派篆刻直至近现代篆刻的所有内容。与篆刻艺术创作相比，“印学”着重于研究印学史、印学理论、印学批评，具有明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著的方

式展开。谈印学必然关涉篆刻艺术创作，但唯其如此，也不能等同于印学的建立。说到底，理论与创作相伴而生，缺一不可。西泠印社作为印学重镇和殿堂，它不仅关系着印学学科的发展，也关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2020年11月，陈振濂先生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上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大印学。”^[1]“大印学”是对传统印学的继承和拓展，也是西泠印社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坚持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一种学术态

度，更有着意于“学术立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文化意义上的考量。因此，本文撰述的宗旨，既以西泠印社为研究对象，又从宏观视角观照“大印学”，试图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其研究范围和学术意识进行不同维度和层面的探讨，以管窥百年名社在印学发展中的转型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

一、对“印学”相关概念的阐释

“印学”的内涵广阔复杂，包含不同方面和层面，其与“篆刻学”“金石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之间既有交叉，又有重叠，相互影响。然而，长期困扰我们的是，人们对于上述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含混而不确定。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研究者和后学对这些概念不探讨清楚，印学的研究工作就无法展开。基于此，有必要对印学的相关概念作一阐释。

（一）“印学”与“篆刻学”的概念纠葛

关于“印学”与“篆刻学”的概念，陈振濂先生于1997年在天津组织召开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时做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他认为，“对古玺汉印，我们只提‘印学’，而对明清篆刻，才提‘篆刻学’；过去沙孟海先生著书，曰‘印学史’而不曰‘篆刻史’”^[2]。基于这样的划分，笔者尝试从沙孟海的印学著作中寻找答案。1927年，沙孟海撰有《印学概论》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0年第27卷第2号。该文虽以“概论”为名，但却有“记史”的味道。他以宋元为界，将印学史分为前后两大时期：上篇是创制时期，下篇是游艺时期。前者论述以制度为主，后者论述以作家为序次。^[3]此后，沙孟海于1963年起草《印学史》，1984年7月定稿。将二者

相比较，可以发现，《印学史》的上编和下编分别以印章旧制和印学体系相称。经细微观察，该划分仍然沿袭的是《印学概论》中的两大时期，划分的依据和出发点也相一致，只是表述略有不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学史》的第十七章是“印学的形成”。在该章开篇，沙氏指出：“印章的发明与使用，历史悠久，上面已说过。由实用的印章逐步变成美术作品，那是唐以后的事。再进一步而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即印学，亦称篆刻学，更是近七八百年的事。”^[4]这段话为我们理解印学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细加分析，可得知以下信息：第一，一部印学史，前半期是印章史，后半期才是篆刻艺术史。第二，“印学”等同于“篆刻学”是有时间限制的。以沙氏起草《印学史》的时间向前推七八百年是宋代。也就是说，宋以后的“印学”也称“篆刻学”在逻辑上能成立。究其因，在于篆刻真正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雅玩，进而转向艺术审美形态，其转折期就是在元明时代。由是观之，沙孟海先生的见解，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笔者查阅了不同版本的《中国篆刻史》，著者在“前言”或是“绪论”部分都会对“印学史”“印章史”“篆刻史”作一辨析。比如，叶一苇认为：“印学史：囊括古代玺印与文人篆刻艺术；印章史：专述历代印章的发展与演变；篆刻史：着重叙述古玺印的艺术性与篆刻艺术的产生、发展。”^[5]还有版本认为：“印章史，主要包括印章的用途、名称、文字、材料、形式以及制度的演变；篆刻艺术史，主要指印章的艺术化过程，包括制印过程中篆法、章法、刀法的发展变化，也包括印章艺术内容的不断扩展升

[2] 对于“印学”还是“篆刻学”的问题，陈振濂先生请教过其恩师沙孟海，沙说：“‘印学’的范围大，可以包括篆刻；而一定名篆刻，则古玺汉印无处着落，在学术上也不太严格。”陈说：“我想想也对，总不见得写历史从明清时代开始吧？倘若此，则大量古玺汉印直到唐宋元明清官印怎么办？故尔用‘印学’名称，应该是更妥当一些的。”参见陈振濂：《关于篆刻学科建设诸问题——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学术总结》，见李立中编《思想的轨迹：陈振濂教授学术演讲录》（下），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3] 徐清：《沙孟海学术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336页。

[4]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89页。

[5] 叶一苇：《中国篆刻史》前言，西泠印社2000年版。

[1] 西泠印社编：《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总序，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该序由陈振濂先生撰写，时间是2020年8月，但会议的召开时间是2020年11月，故作一说明。

华；印学史，主要包括历代对印章、印制、篆刻艺术进行理论探索的历程和理论研究的成就。”^[6]概言之，“印学”的范围包括历代印章和篆刻艺术。陈振濂先生的观点和阐释很有说服力，在他看来：“与集中于元、明、清的文人篆刻流派相比，‘印学’要广涉上古至中古的众多文物，比如古玺汉印等。……提‘研究印学’，涵盖了篆刻艺术从古玺汉印（古印章）到明清流派篆刻（近代篆刻创作）的所有内容，而不仅仅是限于篆刻创作而已。”^[7]由此推论，“印学”和“篆刻学”的关系是前者包容后者，后者从属于前者。

（二）“印学”与“金石学”的深厚渊源

西泠印社的宗旨不只是“研究印学”，还有“保存金石”。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侧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用以考订经史、阐发义例。金石学形成于北宋，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始于清末民初。北宋从帝王到文人士大夫收藏和研究金石的风气十分浓厚，诸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和李清照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著作标志着金石学的成形。清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学复兴。彼时，古玺印大量出土，又以金属印居多，铜印占了绝大多数。正因为金石学崇尚古代铜器、石刻的趣味，又专门研究考证铭刻在钟鼎彝器、碑版、玺印、封泥、砖瓦上的铭文，从中获取历史信息，同时极大地扩展了收藏文化。所以，“印学”与“金石学”气息相通。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印学”与“金石学”的关系，而必须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复杂性。有学者认为：“以学术源流论之，篆刻研究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确从属于金石学。”^[8]究其因由，主要是

清代乾嘉以后，诸多学者非常重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以致搜访拓集石刻碑版的风气极为兴盛。此一时期，关于古代印章、古代封泥的收集和研究也不断深入，推动了金石学、古文字学的勃兴。这一风气迅速发展，直接影响到篆刻界，于是印坛别开生面，印人锐意变法，篆刻艺术成果不断问世。查阅 20 世纪上半叶的金石学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与金石篆刻、钟鼎彝器相关的古文字研究和金石考据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把古玺印作为考察的对象，可见其从最初就与金石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金石学视角下的印学研究过于强调史学因素，而忽视了其对于艺术和审美观念的探索。遗憾的是，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加之学科分类转型，“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9]。

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立足于学科构建，其著作《中国金石学概论》不仅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范围与历史，同时还指出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的搜集、保存、流传等处置方法，对后世金石学研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在“篆刻”与“金石学”的区分上，他如是说：“余尝闻之人曰，‘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指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之乎视金石学矣……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10]巧合的是，李健在《金石篆刻研究》一书中也指出：“金石家不必尽能治印，而以治印名家者，莫不从事金石之探讨。”^[11]由此可知，“刻印”与“研究金石”根本不是一回事，把“印家”等同于“金石家”，

这样的见解显然是片面的。

据史料记载，“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引发了一些辩论”^[12]。可以想见，沙孟海在印学学科的独立上恪守严谨的学术立场，保持锐利的批评锋芒，坚持己见，体现出一位学者大师应有的风骨和气度。为了阐明“金石学”与“印学”的关系，陈振濂先生予以双重诠释，他说：“‘金石学’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学问，而‘印学’只是‘金石学’中一个很小的支脉。提倡‘金石’，其实是在为‘印学’提供一个厚实而宽广的学术支撑点。”^[13]这一观点为后面的论述起到一种清晰的引领作用。

（三）“大印学”概念的提出

如前所述，“大印学”一词是陈振濂先生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在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闭幕式上首次提出来的概念。2021 年 4 月 23 日，在西泠印社辛丑春季雅集“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陈振濂先生发表总结讲话，并对“大印学”概念的产生阐述其理念。^[14]2021 年 11 月 11 日，西泠印社举行“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 年 11 月 9 日，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大印学”立身的两个基点，以及西泠印社的多元化学术拓展潜能。2023 年 3 月 28 日，陈振濂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上作“在‘大印学’中寻找世界印章史视野下的中国”主旨发言。这些为我们深入研究“大印学”指明了方向，深化和拓展了传统印学的新领域。

笔者认为，“大印学”之“大”，在于其文化



◎ “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



◎ “大印学（1）大印学（2）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范畴之广。相较于传统印学注重介绍印人、印作、印谱以及印史考证之外，它更强调扎根于传统印学基础上的超越，也就是对传统印学进行“活化”，不断激发传统印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活态基因，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助推力，以此推进整个印学界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传统印学中材料和技能的研究。诚如陈振濂先生所言，“‘大印学’中的印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

[6] 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7] 陈振濂：《篆刻·印学·金石学》，《中国书画》2011 年第 5 期，第 120 页。

[8] 祝帅：《从西学东渐到书法转型》，故宫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6 页。

[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6 页。

[10] 马衡：《谈刻印》，原载于《说文月刊》1944 年四卷合刊本，后收录于《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90 页。

[11] 李健：《金石篆刻研究》，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1943 年版，第 1 页。

[12]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3 页。

[13] 陈振濂：《篆刻·印学·金石学》，《中国书画》2011 年第 5 期，第 121 页。

[14]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 年第 6 期，第 2—10 页。

能”^[15]。因为，“印章形式构成的另外一些条件如印泥、印钮、刻刀、款识等，虽不是印面形式本身的课题，但它们对印章艺术的发展仍然是重要的因素”^[16]。此外，“关于印学中篆刻的技法和过去制印用的技法方面的研究在今天几乎是空缺的”^[17]，必须引起重视。笔者查阅历年印学峰会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不难发现，2012年西泠印社“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有对“篆刻创作技法”和“工具材料”的探讨；第五届和第六届“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亦有“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专题。其次，在传统印学基础上对金石学、碑帖学、传拓学、古文字学等的研究。西泠印社以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复兴当代金石学，于2009年举办“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在第四届印学峰会中有“金石文字与谱籍”专题；第五届和第六届峰会均有“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专题；并于2021年举办“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最后，是对世界印章的研究。从2016年始，西泠印社相继启动“世界图纹与印记”“域外印章”等研究专题，以此推动印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振濂先生对“大印学”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个发展思路，且设定了相应的发展目标：第一，推进“砚铭文化”；第二，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第三，倡导“拓片题跋”；第四，“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18]可见，“大印学”体格丰满，血脉贯通，是一种以内化外、溯源开新的自力更生。

总而言之，“大印学”的内围是印章本体，外围则是在其基础上探索新的艺术现象，并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主导下加以创新。也就是说，大印学“既

表 1：2005 年至今西泠印社主办大型学术会议统计表

时间	会议名称	研究专题
2005 年	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篆刻学学科研究 2. 印学史研究 3. 吴昌硕与赵之谦研究 4. 西泠印社史研究 5. 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 6. 浙派研究论辩 7. 近二十年西泠印社印学研究成果选
2006 年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	1. 早期社史研究 2. 早期社员研究 3. 史料介绍与人物回忆
2008 年	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印文化综论 2. 古玺印研究 3. 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 4. 印人专论 5. 印谱与文献研究 6. 域外印学专论 7. 西泠印社史研究 8. 相关研究
2009 年	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 金石学综论 2. 玺印研究 3. 铭文碑帖研究 4. 金石著录研究 5. 金石家研究 6. 其他
2011 年	第三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传播与传承 2. 人物与交际 3. 技法与审美 4. 金石与名物 5. 谱集与文字
2012 年	西泠印社“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内容涵盖明清时期篆刻艺术流派、篆刻家、印学理论以及篆刻创作技法、收藏鉴赏、工具材料等
2014 年	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玺印微探 2. 印人与流派研究 3. 藏印考鉴 4. 金石文字与谱籍 5. 篆刻创作与审美 6. 印章典制与印文化传播 7. 书画论札

续表：

时间	会议名称	研究专题
2016 年	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	1. 域外印章研究 2. 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一：器物与纹饰解读 3. 传统图形印研究之二：创作与审美流变 4. 非汉字印章研究 5. 相关研究
2017 年	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古玺印研究 2. 篆刻流派与地域研究 3. 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 4. 印学文献研究 5. 印人研究 6. 域外印章研究 7. 西泠印社史研究 8. 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
2018 年	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主要从美术考古、印章史及艺术学的角度，对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图形纹饰、文字铭刻、汉字及非汉字印章进行考察和研究
2019 年	中国印谱史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 印谱史研究 2. 印谱著录与出版 3. 印学史研究 4. 古玺印研究
2020 年	第六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	1. 印人与篆刻流派研究 2. 印学文献研究 3. 印学观念史研究 4. 篆刻技法与审美研究 5. 金石书画与鉴藏研究 6. 玺印文字研究 7. 域外印章研究 8. 金石全形拓研究 9. 其他
2021 年	大印学（1）——“两宋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研讨范围包括： 1. 宋代金石学、金石学家研究 2. 宋代金石收藏研究 3. 宋代文字学研究 4. 宋代碑帖研究 5. 宋代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6. 传统印学研究等
2022 年	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分专题，通览目录，研讨范围包括： 1.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收藏研究 2. 古印收藏史研究 3. 文人篆刻收藏、印学文献与印具印材收藏史研究

要具有‘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印学概念，也需要有‘保存印学’基础之上推动‘传统印学’再往前跨越一步的东西”^[19]。毋庸置疑，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不失为一种具有远见的高层次思考。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式的学科定位，这一定位要求印学研究者对传统印学做进一步探索，并对其作反思性、前瞻性的谋划，以此拓展印学的研究空间，扩大了印学研究的范围。

二、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

前述所言，印学是研究“印”的一门学问。西泠印社作为印学高地，其打造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当属高端的引领性会议，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六届。除此之外，西泠印社还策划了数场专题性极强的学术研讨会。笔者对近20年来西泠印社主办的大型学术会议的研究专题大致做一整理与归纳，以清眉目，详见下表：

由上述14次印学会议的研究专题可以看出，传统印学研究领域分工更加细化，主要是对印人、印技、印史、印谱等方面的研究，笔者将其视为印学的本体研究。从2008年开始，印学的研究领域逐渐向外扩张，出现了“域外印学专论”。2016年以后，“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关涉“域外印章研究”，彰显出一种全新的印学发展观念，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至2020年，“金石书画与鉴藏”“金石全形拓”被纳入印学研究的视野，可谓是在新领域的开拓与探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和2022年均以“大印学”为主题，分别举行“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印学收藏史”两场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拓展印学研究的疆域。可以说，上表不仅对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提供了基础和视野，同时

[15]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5页。

[16] 陈振濂：《篆刻艺术学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17]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4页。

[18]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7—8页。

[19] 《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西泠艺丛》2022年第12期，第72页。



© 西泠印社历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西泠印社历届“孤山印证”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

也为印学学科建设凝练了方向，下面作具体探讨。

（一）学科定位与边界

“大印学”有整体的宏构，包含着多个维度和层面。因此，必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之。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研究时，既要考察印学与它的上位系统（诸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之间的联系，也要考察印学自身系统内部的结构，即印人、印技、印作、印论、印谱等下位系统。这是从第一个层面理解“大印学”。当然，仅仅按照上位系统和下位系统来设计“大印学”的学科体系还不够，需十分重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印学社团，这是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以西泠印社为中心，勾画其发展脉络。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放眼世界、走向世界，作跨文化圈、跨地域、跨国界的考察，寻找世界印章史视野下的中国，由此引出第三个层面“域外印章研究”。这三个层面清楚地阐明了印学的学科性质，为我们理解“大印学”的学科定位做了铺垫。这一定位就是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此处所言的“其他学科”有两层意思：一是与印学相关联的学科，如金石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二是印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

经济学、传播学等。前者是从印学内部关系出发探讨其学科定位，后者则是从外部关系出发考虑之。厘清这一定位，其他问题就豁然开朗。

从学科角度论，任何学科边界都是以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核心。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必须在该学科范围内，但研究对象的确与学科边界的确定不能混为一谈，我们最终要看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比如，美学、考古学、图像学、符号学都要研究艺术作品，但不能说它们都是艺术学。以古玺印为例，可以从艺术学角度来探讨，也可以从美学、古文字学、金石考古学等不同侧面来分析，不同角度、不同研究目的会产生不同的学科结果。譬如，艺术家从印文的结体、印面的构成和笔画的形态等发现其艺术特色和价值；美学家用美学的方法探讨其形式美及其法则，重在审美研究；古文字学家从印文内容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或者是字形所反映的本义考释古文字；金石考古学家则是考证、判断、鉴别印章的出土年代和分类。故而，厘清学科边界，明晰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深入透彻地探讨研究范围。

（二）研究范围

一般来说，“印学”和“印”就像“艺术学”和“艺术”的关系，二者是不同的学科路径。前者通常指学术理论，后者通常指艺术创作。然而，研究印学必须围绕“印”展开，没有印就不可能产生印学理论。当然，印学除了理论研究，其发展与篆刻艺术创作也密切相关。原因在于，创作的主体是篆刻家，因此，印人（印家）、印作（篆刻艺术作品）亦是印学关注、探讨、分析与研究的范围。

我们还可以从陈振濂先生提出的“大印学”立身的两个基点来拓宽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这两个点分别是“学科交叉”和“文明交融”，“前者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产生、开发的新兴学科领域。后者不限于中国，是站在‘世界印章史’的立场上对不同文明形态的印章、不同国家文字入印以及各领域之间的学术研究交流”^[20]。此二者相互融合，恰恰与沙孟海先生曾经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高度契合，由此体现了百年名社的重要分量。

基于上述探讨，笔者尝试把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分成三大类，其基本系统与框架如何搭建，详述如下。

1. 对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的研究

（1）印学史——中外印章史研究；世界印章史研究；也可按照“文化圈”分区域研究，如东方和西方，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也可对此进行分类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

（2）印学理论——探讨印章的起源与发展，印章的分类，印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印章的形式与内容、艺术语言和风格流派；篆刻创作的过程、继承和创新。

（3）印学批评——篆刻艺术鉴赏与批评，篆刻家与艺术作品的分析；篆刻批评的标准、流行和

导向；对当代篆刻家的批评。

（4）篆刻美学——根据艺术美的共性来认识与研究篆刻美的形成、发展和表现形态，从中揭示篆刻美的本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创作与欣赏等基本原理和规律。

（5）篆刻文献学——历史上的印论、印话、序跋、讲义、琐谈中的篆刻资料及文献；对古印谱的研究。

（6）篆刻教育学——中小学篆刻艺术教育、高等院校篆刻艺术教育、社会篆刻艺术教育。

（7）篆刻技法研究——对篆法、刀法、字法，以及对边款的研究。

以上七个方面，特别着重于印学的历史、理论、批评、审美、教育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又与其他学科交叉出许多新学科。

2. 对印学交叉学科的研究

（1）印学文化学——篆刻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印学社团与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关系；西泠印社的组织架构和印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不同地域背景形成的篆刻“文化圈”。

（2）印学社会学——印章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印章（或篆刻艺术）样式和风格生成变化的社会根源；把篆刻艺术当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其繁荣与社会的关系；篆刻家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状态。

（3）印学经济学——亦称印学市场学，研究篆刻艺术与市场现状；篆刻市场培育与发展；篆刻作品价格与艺术价值；古代玺印的收藏与拍卖。

（3）印学传播学——印谱对篆刻艺术的推动；收藏家所辑印谱与篆刻家所辑印谱的区别；篆刻艺术在国内外的传承与传播。

（4）比较印章学——比较与鉴别，共性与个性；中外印章比较研究，印材之间的比较，文字之间的比较。

（5）金石传拓学——印学与金石传拓的关系；传拓术的流程；金石全形拓研究。

[20] 《陈振濂先生在“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西泠艺丛》2022年第12期，第73页。

(6)金石考古学——印学与金石考古学的关系；对玺印的考证、对封泥的考证；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通过田野考察、挖掘，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为印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7)古文字学——印学与古文字学的关系；对古玺文字的考证。

(8)鉴藏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印章鉴藏的发生、发展、延宕迁变之历史脉络作一勾勒；书画用印与鉴藏用印研究。

以上八个交叉学科皆略举其要，不够完备，有些条目看似相对独立，实则有相互结合与穿插的关系。所有这些交叉学科与分支学科，都极大地丰富了印学的学科体系，从而将其向纵深推进。

3. 对西泠印社社史的研究

百余年西泠印社史，不仅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同样又是一部宏伟的社会文化史。可以肯定地说，一部西泠印社史，在特定意义上就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篆刻的缩影。若无西泠印社史，那就不能构成“大印学”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大印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正因为此，对西泠印社史进行回顾与追溯，是近年来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以及专题研讨会一直关注的重点。^[21]

令人欣喜的是，陈振濂先生独具慧眼，在 20 年前就将西泠印社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学术角度去研究它的百年史，并著有《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书中对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西泠印社与国际印学交流、关于西泠印社史研究——“西泠学”^[22]做了深入探

索与阐明，还勾画出“西泠学”体系的大致轮廓：

- (1) 西泠印社与篆刻理论史或印学史
- (2) 西泠印社与金石学史
- (3) 西泠印社与近代学术史
- (4) 西泠印社与近代书画史
- (5) 西泠印社与近代社会史
- (6) 西泠印社与民国政治史
- (7) 西泠印社与清末民初思想史
- (8) 西泠印社与沪、浙地域文化史
- (9) 西泠印社与近代社团组织史
- (10) 西泠印社与艺术经济市场史
- (11) 西泠印社与近代艺术展览史
- (12) 西泠印社与文人士大夫聚会形式演变史
- (13) 西泠印社与出版印刷史
- (14) 西泠印社与印泥制作史
- (15) 西泠印社与收藏史
- (16) 西泠印社与篆刻专题创作史
- (17) 西泠印社与园林景观建造史
- (18) 西泠印社与西湖博览会史
- (19) 西泠印社与浙江图书馆、博物馆建设史
- (20) 西泠印社与国际交流史^[23]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会与其他事物产生联系，西泠印社也不例外。从上述选题可以窥见，西泠印社与不同方向、不同学科跨门共生、融合发展，催生出一个个新兴且富于生命力的新学科，这是学术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若对上述选题做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研究，足以扩大西泠印社史的研究界域，在学术上更有朝气。同样，上述选题所研究的内容得到新的发展，

还会延伸出新的方向。那么，“西泠学”就会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学科群。当然，这是一个重大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需要学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三、西泠印社的印学学术意识

学术意识是指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者个人有意识的行为活动责任，即对学术研究有广阔的视野、有明晰的方向、有理性的思考、有科学的方法、有探索的精神。西泠印社具有 120 年历史，其印学研究蕴含着自觉的学术意识，主要包括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学科意识四个方面，下面逐一述之。

(一) 问题意识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问题意识，善于寻找和挖掘事物发展的真相，在质疑和批判中做有深度的追问，从中获取研究的真谛。

西泠印社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经历过转型，它促使当代印学必须从变革着的传统旧方式出发，也就是在传统印学的基础上超越，从而紧跟时代步伐，而不是做陈旧的、老套的研究。陈振濂先生在西泠印社 115 周年社庆之际，就明确指出“学术研究讲究问题意识”，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有没有‘问题’的存在？如果没有，那就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而如果根据一个事例能带出一个‘问题’背景，那就有了生发的价值”。^[24]这为我们在学术探索之路上继续前行树立了典范。在西泠印社百余年发展历程中，他对西泠印社史的认识越发清晰，对几个关键阶段进行发问：(1) 西泠印社四君子之间的关系问题；(2) 吴昌硕出任社长的的问题；(3) 马衡出任社长的的问题；(4) 关于春秋雅集及题名问题；(5) 西泠印社与其他印社的关系问题；(6)

新中国成立初的西泠印社恢复问题；(7) 张鲁庵捐献印谱问题；(8) 关于《西泠印社志稿》编撰问题；(9) 西泠印社六十社庆筹办问题；(10) 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问题。^[25]对于上述议题，我们要回到历史场域，探究其真相，发掘其内涵。同时，在问题意识的聚集中形成新的问题域，以此推动西泠印社史的研究。

当然，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不仅考虑到“印学内部”问题，而且考虑到“印学外部”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层面：(1) 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和研究范围问题；(2) 印学脉络的溯源与勾勒问题；(3) 文献资料的爬梳、解读与分析问题；(4) 学科交叉问题，尤其是与金石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关系问题；(5) 研究立场以及理论体系建构问题；(6) 拓展印学研究的文化维度问题等。上述问题的提出，都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文献与实物的良性互动，使得“大印学”的学科属性得以彰显。

(二) 历史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就是把当下发生的现象放在时间长河中去考察它的源流和变迁。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26]，把“历史的”置于首位，强调文艺批评和创作要树立大历史观，正确认识、理解和阐释文艺作品的历史镜像，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揭示文艺作品中“历史的”理论价值和思想活力。

西泠印社作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其建立与历史的联系和进入历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编写《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召开国际印学峰会和专题学术研讨会，以及举办系列展览活动进行的，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感。综观近 20

[21] 2005 年，首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有“西泠印社史研究”“西泠印社早期日籍社员长尾雨山研究”专题。2006 年，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2008 年和 2017 年的第二届、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亦有“西泠印社史研究”专题。

[22] 陈振濂先生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中，以“导论”代“前言”的方式，对百年西泠的体系、结构、框架做了严密的思考，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参见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 2003 年版，第 1—47 页。亦可参见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目录，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版。

[23]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7—138 页。

[24] 陈振濂：《西泠印社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写在西泠印社 115 年社庆之际》，《西泠艺丛》2018 年第 9 期，第 4 页。

[25]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8—148 页。

[26]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 页。

年学术会议，可以发现，西泠印社以“史”命名的学术专题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印学史研究、印谱史研究和西泠印社史研究。概括地说，这三个方面还包括一些内容，比如印学史研究包括印学文献研究、印学观念史研究、印人研究等；印谱史研究包括印谱著录与出版、印谱与文献研究等；西泠印社史研究包括社史研究、社员研究、史料介绍与人物回忆等。2022年11月，西泠印社举办“大印学（2）——印学收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选题包括古印收藏史研究，以及文人篆刻收藏、印学文献与印具印材收藏史研究等。可以说，西泠印社在印学研究中能够感知历史，在大历史观中构建“大印学”。

以陈振濂先生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为例，他以“导论”代“前言”的方式，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中，勾画了百年西泠的发展脉络，甚至还探讨了建构“西泠学”的宏伟蓝图，并催生出“西泠印社与篆刻理论史或印学史”“西泠印社与金石学史”“西泠印社与近代学术史”等20个学术课题。这些学术课题以西泠印社为中心，将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体现出历史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西泠印社还与诸多文化领域相交叉，体现出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可以想见，历史感是历史意识的基础和前提，西泠印社在贯穿古今的历史中考察、探究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绝不仅仅是掌握史料这么简单，而是在于运用历史思维视角与方法审视之，凸显历史意识的力量。

（三）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通常指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发展状况的认识和觉解。时代意识既源于时代现实，又影响和引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理性自觉。陈振濂先生言：“要拓展印学领域，走向‘大印学’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27]

从历年诸多研究专题来看，西泠印社并没有拘囿于传统印学的研究，而是聚焦时代、关注现实，把印学研究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在大胆探索中继承发展，体现出前瞻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

首先，立足于传统印学之基。中华民族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西泠印社从百年社庆开始，着重于打造高端的国际印学峰会和专题性学术研讨会，在选题方面重视传统印学研究，比如印学史研究、古玺印研究、篆刻流派与创作研究、印人专论等。其次，注重传统印学的创造性转化。西泠印社善于发掘内在的且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对印章和篆刻创作里面局部的、细小的技术环节进行提升，把它们和碑帖学、金石学、传拓学等相联系。比如，印谱史、金石书画与鉴藏、金石全形拓等方面的研究，在实现传统印学延续的同时使其具有现代性的内涵。最后，关注世界印章，促进印章式“文明交流互鉴”。比如，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举行，西泠印社紧抓机遇，并结合“城市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倡导“域外印章研究”。2018年，举办“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见，西泠印社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新坐标，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进行双视角的文化观察，既有内向思考，又有外向拓展；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战略眼光。此外，陈振濂先生就“大印学”锚定三大发展定位：“第一，印学学科建设的需要；第二，和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有关联；第三，和国家文化政策的发展相一致。”由是观之，他把“大印学”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和文化前沿。

（四）学科意识

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学科意识关乎学科理念，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有意行为。为了增强学科

意识，就必须正确认识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程，对该学科的性质、培养目标、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以及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要认识到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以此构筑系统性、完整性的知识网络，培养学科综合能力。

沙孟海先生有着很强的学科意识，1963年他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印学的发展》的发言。^[28]同时期，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沙孟海先生受邀负责“印学史论”课程。^[29]无论是作印学发言还是教授印学史论课程，他的学术范围都是聚焦于“印学”展开，此与西泠印社“研究印学”的宗旨一脉相承。如前所述，西泠印社八十周年社庆，沙孟海先生在贺词中提到应区别“金石学”与“印学”，不宜混用“金石学”，当时遇到社中长老如朱复戡等的疑义，有相当的社员也表示不理解与不习惯。^[30]在今天看来，沙孟海先生在推动印学学科独立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体现出其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风范和作为。可以说，在百年社史中，沙孟海先生为印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97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的重点是关于篆刻学科建设，确定了以篆刻艺术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一个大的“篆刻”的学术概念来作为会议的学术定位的话，那么时隔20多年，陈振濂先生又提出“大印学”概念，这是关于印学学科体系的构想，显示出其对于印学历史文脉和知识谱系的清晰认识，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性上升。

倘若西泠印社的印学学术意识源于一种“力”，那么“问题意识”是活力，“历史意识”是动力，“时代意识”是张力，“学科意识”是合力。有充沛的活

力，才能增强动力，扩充张力，凝聚合力。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织出了百年西泠美丽的锦缎布匹，织就了“大印学”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体系，从而激发了印学研究的内驱力。

四、结语

一个学科的诞生、演化与发展，是基于人们对该学科的认识、探索的结果。从篆刻到印学再到金石学再延伸到“大印学”，必然伴随着在学术研究上的特殊需要，这不仅是西泠印社在推进印学研究工作中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学科建设的时代精神表达。综上所述，西泠印社的印学研究范围由印学基础理论与篆刻技法研究、印学交叉学科研究以及西泠印社史研究三大板块组成，以此为支点，在宏大的视野中确立了自身研究对象，不仅具有学术标本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标本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西泠印社立足传统印学，同时不断拓宽视野，敏锐地把握现实性与学理性、前沿性与基础性的关系，诸如“保存金石”与呼吁“重振金石学”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研究印学”与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兼及书画”与提倡“诗书画印综合（兼能）”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31]这是一种蕴古含今的探寻，也是契合时代发展所需。不止于此，西泠印社还因为具有自觉的、鲜明的、深刻的学术意识，把问题意识、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学科意识处在动态的关联中，从而让印学研究超越时代的局限，最终成为有温度的探究、有态度的学术、有深度的理论和有高度的思想。

（吴彦颐：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7] 陈振濂：《“大印学”观念的思想构造：在西泠印社春季雅集“大印学”概念的产生——当代印学研究新时代·新路径·新视野的探索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西泠艺丛》2021年第6期，第3页。

[28]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4页。

[29]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8页。

[30] 陈振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2003年版，第44页，注释3。

[31]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新刊前言，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及其文化影响述论

文 / 贺文荣

【摘要】

百年西泠印社撰志修史本身就构成一部别样的历史，持续长久、积累丰厚、文献多样，其中以八篇《西泠印社记》和《西泠印社小志》《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以及一些专题史构成里程碑式的成果。从史学史的维度看，这些史志文献在内容类型、体例、笔法、史学观上各不相同，史学价值各异。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表现出的“自觉”修史意识有利于道统、文脉和印学宗风的赓续；西泠人的撰志修史使印学史进入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并与其同频共振。时代呼唤西泠人在深掘古典史学资源基础上从古典走向现代，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史”。

【关键词】 西泠印社 修史 史学 影响

一、百年社史修撰史

西泠印社自1904年创立，至今已走过一百二十年的历程。在这一百二十年的历程中，“西泠印社中人”很重视撰志修史和社史的研究工作，这应该也是西泠印社祖脉不绝并能成为“天下第一印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印社社史的编撰出版情况，陈振濂教授主编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一书和撰写的论文《当代西泠印社研究十论》中已有相关论述。为了专题性地、更翔实地梳理西泠印社的社史修撰史，笔者不避赘冗，兹按时间顺序列述，并补充一些具体资料。西泠印社社史修撰，基本以八篇《西泠印社记》和《西泠印社小志》《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为标志性里程碑，

也可以说这是西泠印社的几部“正史”。然而在一百余年中，还有各种类型、编例、体量的文献结撰，虽未必以“志”“史”为名，却实在是西泠印社史料中举足轻重者，也是史料历史积淀中不可或缺的链条。中国史学向来有按“史体”“史料”“国别”等将史著分门别类的传统，梁启超有按不同标准分为十类或两类两种主张，柳诒徵则分为四种，朱希祖分为六种。故下文按史料价值将多种不同内容和体裁的史著囊括进来，以全面展示百年印社的史料整理、史籍撰述历程和特点。

先介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系列的八篇《西泠印社记》。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人河井仙郎于1906年所作，一个日本印人带着“景仰”、“服膺”、三生有幸的情感记下自己访学西泠印社的经历和感

受，我们可以想象此后这样的记文会对读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印社草创之初，一切事项还处于筌路蓝缕状态，创社诸君还无暇将精力放在文献整理上时，这几篇《西泠印社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创社初期另外四篇由鲁坚、胡宗成、张景星和首任社长吴昌硕所作（撰写时间分别为1912年、1913年、1914年、1914年）的《西泠印社记》一般都重在梳理印学、印派之源绪，阐述立社的重要意义，可视而后出史志之“总论”“导言”之属。1958年徐映璞所撰《西泠印社记》不但记录了西泠印社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印社胜景、亭台馆阁的记载也更为详细。1983年林乾良所撰《西泠印社记》与徐映璞所撰内容相近，除简述印社发展历程外，大部分篇幅在志地记景。1988年沙孟海撰《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纪念碑记》，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介绍了印社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编辑出版、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等方面的成就，并倡导印社同人继往开新。如将这八篇社记看成一个系列和整体，就会发现颇有史志意味。

1906年陈豪绘《西泠印社图》，此图共有三段，第一段为陈豪所作，第二段为汪络年所作，陈、汪所作时间相近。此二段一直为丁仁所藏，1949年丁仁去世后，转为高络园所得，次年高时丰续绘第三段，高络园将三图及题咏合装成长卷，今藏浙江省博物馆。三图有胡饗、吴昌硕、程兼善、盛庆藩、杨守敬、张祖翼、金尔珍、金蓉镜、高尔康、章澍、潘飞声、黄山寿、王国维、王禹襄、陈汉第、孙智敏等人的题咏和观跋，时间跨度始于1906年绘图之初，至1950年高时丰绘第三段复于后作跋，1951年刘光鼐亦有题咏。此长卷因历时长、所绘景物多、题咏者众，很有“地记”“图志”的特点。图中描绘了印社建筑之精华，如题襟馆、四照阁、小龙泓洞、华严塔、观乐楼等。历观陈豪、汪络年与高时丰三图，如从历史中走来，一路时空穿越。百年西泠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图志，随着创作主体、编撰体例、科技手

段的变化，图志也随着历史在变迁。此长卷可谓西泠图志之肇端。此外，还有吴昌硕、陆俨少、潘韵、王伯敏、姚耕云等人所作的《西泠印社图》，但都更偏重于“绘”，而少了一些“史”的特质。

1913年，叶为铭编辑《西泠印社同人录》。前有张景星序文，序文曰：

“老友叶舟惧同人之浸就湮没，无所表见也。爰手辑同人姓氏及里居年齿，各系以传，起道光，迄光绪，皆取其人以学问著而享盛名于同社者，或以金石，或以书画，或以鉴别，或以收藏，非同志不列席，非大雅不漫登。殆所以存传人而征传迹，为传信后人计也。此盖叶舟成是录之微旨欤！”^[1] 以人相系，列述其传，是“纪传体”的编撰方法。由此，《西泠印社同人录》可以史志视之，类同于后来的《志稿》“志人”卷。

1915年，“创社四君子”之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庵共同编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奉”“志余”八卷，汪承启作序。可惜此书未及印行便告散佚。新中国成立前，该书一度现身杭州青年路昭生书店，后由杭州藏书家陶承杏先生购得，其得后亲笔照原样清写一本备份，并于1965年请朱醉竹先生朱笔勘校、作序。“文革”中，原本与清写本均被查抄；“文革”结束后，清写本复得，原稿本佚。此书史料与文献价值很高。

1915年《西泠印社志》亡佚后，同年叶为铭又编成《西泠印社小志》，当时流传不广。2011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沈慧兴的注释本。

1933年，叶为铭编《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一册，排印本，约7万字。此书虽不以“志”“史”为名，但实同“志”“史”，为后来编撰《西泠印社志稿》打下基础，实际上后者正是以前者为规模补充扩展而成。其内容详及印社测绘面积、宅基地执照、西泠印社启、社约、印社记、社藏石刻、印谱、印社同人录、景观记等，可谓印社成立三十年来之文献总览。

[1] 叶为铭编纂，沈慧兴注释：《西泠印社小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6页。

1948年，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张鲁庵出石章与手制印泥，秦康祥撰集印人小传，高式熊刻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四册告成。此《印传》刻名成印，治款为传，共计220余方印。1995年4月上海朵云轩出版时，以所存石157枚，重补7枚，共计164枚印。中国史籍向有“纪传体”，王福庵在此书序中盛赞：“诚以人重也，斯亦班氏艺文志之支流也。”^[2]此书开印谱印人传之先河。

1954年，《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初拓本问世，共46印，印文刻印社胜迹之名，边款记其始末，书前有王福庵作序。此谱始刻于1940年，1963年又增刊四钮，共50印，于印社六十周年庆典时全部捐赠印社。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福庵曾让高式熊用西泠印社斋馆楼阁名称刻成印谱，他又亲自撰款，定名为《西泠胜迹印谱》。此两谱虽为印谱，然从印文与边款合看，不唯可赏印品篆，实有“志地”之功。

1957年，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定的《西泠印社志稿》完成并印行，共分为六卷：“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志物”“志余”。前有孙智敏所作之序，后有王福庵和秦康祥二跋。《志稿》撰成之初据传曾刻油印本五十部。1982年，时任印社事业组的章君平曾请杭州钟久安先生仿原版复制150部。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华诞之际，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正先生的注释本。至此，这部珍贵的西泠史料传世始广。

1960年，由秦康祥补写的《西泠印社志稿附编》油印本问世，别成上下两卷。

1963年，西泠印社印行叶为铭所编《西泠印社小志》面世。

1983年，《西泠印社社员印集》面世，此集为建社八十周年纪念刊，将印社历史上100位同人的作品汇集成册，并附有作者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入社时间等，可看成印谱式、简略的“西泠印社印人传”。

1983年6、7、8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分三期刊出林冷的《西泠印社史话》。

1988年，由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厅、杭州市文化局、日本《读卖新闻》社和西泠印社共同推出的“西泠印社展”赴日展出，同时结集了一本“西泠印社展”的展览册，此册是印社史料的又一次大整理，与此前相比，此册大量汇集图片文献，此后印社社史图片文献的整理渐渐受到重视。

1989年1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刊出了丁茂鲁绘的印社景观砖刻《西泠印社胜迹图》。此图以砖刻的形式制作于印社大门内右壁，从史料角度看，它与陈豪、汪络年、高时丰所绘《西泠印社图》属于同一系列。

1993年10月，西泠印社编辑出版了《西泠印社九十年》，内收多篇印社研究专文和社史研究的珍贵资料，是三十周年纪念刊之后第二次以“周年纪念刊”的方式汇集印社资料。附录部分的林乾良、黄镇中所辑的《大事记》是西泠印社九十年的大事年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陆续延展整理；吕国璋所辑《编辑出版图书概要》，整理了1904—1990年印社和社员编辑出版有关篆刻方面图书情况，以年份顺列，这两份资料在纵向梳理印社社史方面很有价值。

1995年，法国电台记者为西泠印社拍摄专题片。

1998年1月，《西泠艺报》的《印社史料》栏目刊出朱妙根文《西泠印社文献概要》，同年2月、4月又刊出同题文章的“续一”与“续二”，是对西泠印社社史文献的简要总结。

2018年，《西泠艺丛》第9、10期，刊出林乾良、黄镇中、张钰霖整理的《西泠印社115年大事记》，两期分为1904—1949年、1950—2018年两个时间段。

2003年10月，《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出版。《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由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先生主编，浙江

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与博士后团队撰稿。该书在体例上有很大的创新，其体例与结构之复杂、严谨，条理之清晰、主次之分明令人称叹，史料之全面、翔实、综合也前所未有的，对百年西泠印社来说，是一本丰厚的、沉甸甸的礼献。本文以上所列叙的历年社史修撰的史料也主要参考此书。《西泠印社百年图史》的前置部分为序、综论和专论，综论部分刘江《西泠印社百年回眸》，专论部分陈振濂《西泠印社“社长现象”研究》、林乾良《西泠印社重大学术活动概要》、吕国璋《关于西泠印社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发展》诸篇专文都有时间与空间上的涵盖度。《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主体部分是百年史图述，将印社社史分为1904—1949年、1950—1979年、1980—2003年共三个阶段，图文结合。此书是社史整理中第一次如此大量地、密集地、全面地使用图片文献。图片文献第一次受到如此高的重视，体现了印社社史修撰中文献类型的明显转型。

2005年10月，《“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专题部分收入史长虹《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1904—2003）》一文，纵向梳理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史。

2006年9月，王佩智《西泠印社1963》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此书在西泠印社社史文献中具有特殊性——作为第一部“年份史”走入印社印史研究；西泠印社社史还有待细化和丰满，历史和未来呼唤更多的“年份史”和“阶段史”。

2006年9月，西泠印社编辑出版《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丛编》（共分三册，分别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汇录》上下卷和《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此丛书将早期社史的研究成果拓宽并加深，为以后新的社志撰写提供了颇具学术性的资料。

2015年7月，王佩智《西泠印社收藏史》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作为西泠印社的一部重要的“专题史”，该书有史有论、纵横结合，从印社收藏以

及藏品的“种类”“起始”“历程”“文化效用”等方面立体而全面勾勒出“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收藏史。

2018年，《西泠艺丛》刊出郭超英《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述略》一文，梳理了印社从建社之初至2017年文化交流简史。

2020年11月，由吕建楚出品，华宣飞任总监制，陈振濂、龚志南、胡戎、陈立波任总策划的六集系列纪录片《西泠印社》开播，六集标题分别为《君子》《大师》《师父》《衣冠》《兄弟》《刀法》。此片标志着西泠印社社史撰述进入影像时代，六集纪录片始终贯穿着“精神价值”和“文化使命”的主脉，表现出社史撰述中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介入与共振。

二、史志的文献类型、史体、史笔、史学观与史学精神

以上所介绍的社史文献，基本上都具有时间跨度长、内容包容全的特点，虽并非完全以“史”“志”命名，其实具有社史或某一阶段社史、某一方面专题社史的性质。“类型”在于分析史志文献核心史料内容与形式类型的异同，如文字、图表、影像、图谱等的区别与特点；诗有诗体，文有文体，史著有史体，“史体”重在分析史著在体裁、体例方面的特点，古人所说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即此。“史笔”在于分析不同史著在叙述、描写、议论等行文方面具体的手法，由此可见作者的历史观。史学观和史学精神则着重从“史学”“史学史”的角度分析，着眼于宏观与形而上的层面。

（一）记与志

印社的史志文献也是随着印社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又表现在多方面。印社初创期，史志文献也表现出简短、概括和“志实”的特点。从史体上看，是“记”和“志稿”二体。“记”原是古代散文体裁，盛行于唐宋，篇幅精简，短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易于满足方便、

[2]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具体、灵活的记录诉求。印社历史上的八篇《西泠印社记》是社史文献中“记”的代表，每篇分看为记，合看则有史的性质。第一篇河井仙郎的《西泠印社记》还带有记录游历和访学的性质，此后鲁坚、胡宗成、张景星、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则重在宣示立社，揭橥宗旨。至1958年徐映璞、1983年林乾良两记则在“志地”方面较为详细。1988年沙孟海《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记》则是重在梳理西泠发展简史。

早期印社史志除表现出以简短精练的“记”体表述外，还表现出强烈明确的“志实”特点。这方面的代表是1915年编撰的《西泠印社志》和《西泠印社小志》，而1933年的《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和1957年的《西泠印社志稿》，虽名称不同，从内容和性质上都属于“志稿”系列。说其为“志”，由于“志实”，也就是记录最主要最基本的客观事项、地名、人物、文件等；说是“稿”，是因其不是体例和行文很完善的“史”，还表现出一种临时的记录，留待以后修缮圆满的特点。

《西泠印社小志》与《西泠印社志稿》从“志实”的角度看，几乎都是客观史料的类编，似乎谈不上什么笔法与史学观点，但是作者著史的意图、褒贬态度皆隐于其间，这种含蓄蕴藉的“史笔”，颇见著述者的君子之风。比如《西泠印社小志》于序后，首列“志事”，而“志事”中全部内容都是西泠印社给府、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和主管的呈文与批复。而《西泠印社志稿》卷三之“志事”却与此几乎完全不同。由此可见，辑录《西泠印社小志》时期，让官方承认印社地产、房产的合法性是发展印社的前提，于是首卷先将此事揭明。《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将印人与各方赞助人同列并附小传，可见在印社发展过程中赞助人是印社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印社社史上在钱物方面的赞助、捐献还需要专题推进和深化。

（二）“纪传体”与印人传、印谱印人传

在中国史籍的史体中，“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历史最久，后来之史体也多从此化变而出。司马迁《史记》将“纪传体”推至历史的巅峰，纪传体后来受历代史家所重。纪传体之为体，源于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英雄史观”，后来随着史学的发展和记载对象的下移，《东汉观记》首次单列“妇女传”，《后汉书》的人物类传再次扩展，出现了“列女”“文苑”“党锢”“宦者”“逸民”等，以后各类主体身份的类传更多。从这一史学传统观照，印人传所出实晚。明人周亮工始著《印人传》，后清人汪启淑作《续印人传》，叶为铭作《再续印人传》和《广印人传》。西泠印人传始于叶为铭1913年的《西泠印社同人录》，后来1948年高式熊作印谱型印人传《西泠印社同人印传》，1983年西泠印社八十年周年庆所出《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是作品集兼印人传略的文献。从《西泠印社同人录》张景星序“殆所以存传人而征伟迹，为传信后人计也”一句，可见叶为铭辑撰此录之目的；如果我们再结合叶为铭著有《再续印人传》《广印人传》的事实，可见先生有着自觉而强烈的“修史”意识。1948年王福庵为高式熊《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作序时，则以班固《汉书·艺文志》比状此部印谱的史学功能，他说：“昔班氏艺文志，于部目之下，皆加注其人履历以备考索，简核有体，记事之良法也。……诚为以重也，斯亦班氏艺文志之支流也。”^[3]

尽管西泠印社文献中印人传之类已成完整系列，但以中国历史上史传类的史体和史法反观，印人传的体例、史法还有失于平面化、单线型、过于简略和史观缺席之感。

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究汇录》下卷之“人物研究”列出26位早期社员，每位社员下附有相关研究论文，此类文献为以后修撰现代形态的“研究性”印人传奠定了良好

的学术基础。

（三）编年体、通史与年表、概述和史料长编

在西泠印社志史修撰与文献整理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以时序展开、全程覆盖、叙述简略的文献，如1983年6、7、8月在《西泠艺报》连载的林冷的《西泠印社史话》，1993年10月林乾良、黄镇中所编写的《西泠印社百年大事记》（见《西泠印社九十年》之附录），1998年1、2、4月《西泠艺报》连载的朱妙根《西泠印社文献概要》，刘江的《西泠印社百年回眸》（见《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之综论），林乾良《西泠印社重大学术活动概要》（见《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之专论），史长虹《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1904—2003）》（见《“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等。此类文献秉承古代“编年史”和“年表”的史学传统，忠于史实、有事必录，不但是一种具有独立的体裁的社史文献，还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或者提供了学术综述方面的梳理。

2003年作为百年社庆献礼编辑出版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可谓综合取法“编年体”“年表”“纲目体”诸史体，而又有新的创获。它不同于“编年体”，虽然史料按年代顺序编排，但是史事排列之外，还有一个“导论”和四个“分论”。以论述统史料，“论”与史事编年相结合，使此书具有了“研究性”，不会落于简单的资料汇编。它也不完全同于年表，年表资料分层基本是单维的，所有的史料以年相系，也就是某年某月下列叙相关的事。此书将史料分级处理，第一级是社史资料，黑体加粗，且分主次，主要条目下征引的资料多，次要条目下则少。第二级是社史资料的系史、文献征引和附录。社史资料之后还增加了相关背景资料。这种体例与当年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先作丛目，次作长编很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社史资料”条目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丛目”，《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系史、文献征引和附录则相当于《资治通鉴》的“长编”，这也就是这部书以“长编”命名的原因，主要在于“史体”而不是

它涵盖时间的长度。另外，这部文献的编例也继承和创化了朱熹主编的《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共约80万字，通读并非易事，但是社史资料与系史、文献征引、附录分栏另列，且将社史资料黑体加粗处理，这样社史资料就成为“纲”，其余三者成“目”，纲举目张，条理很清晰。另外，一篇“导论”和四个“分论”也是本书的另一种“纲”，以纲索史，简约明豁。这部文献对于以后社史资料和通史的撰写起到开风气、立范式的作用，也做了很好前期史料、史实、史体、史识的积累和导引。

（四）地记、图志、舆地

在古代史籍中地记、图志、舆地图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记是以文字记录郡县、山川、河渠等地理内容的史籍；图志，或单用文字或图文结合；舆地一般都是图文结合的。《西泠印社志稿》卷一“志地”，显然与“地记”及“图志”“舆地”中的文字部分的传统和记叙方式是一致的。韩登安所刻《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和高式熊所刻《西泠胜迹印谱》，把印与款相合看，也有“志地”功能，当时王福庵先生让两位学生刻此类印谱，也一定并不完全是出于篆刻艺术之初衷。随着印社的发展，占地扩大，新地并入，及时志记，以为史证，因此史志中的志地也有“护社”之用心。

陈豪、汪络年以及高时丰所作的《西泠印社图》长卷，与其说他们作此是以山水画寄情遣兴，倒不如说他们更看重其“图志”的功用。后来由丁茂鲁所绘并以砖刻形式制于印社正门内右壁的《西泠印社胜迹图》是属于同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图绘所用视角是俯瞰式全视角，与山水画三远法并不相同，三远法重在表现“远”的层次性和意境感。而这类图绘因其功用是偏重说明性的，目的在于展示印社的格局与胜景的位置关系，很像现在说的园林建筑的“沙盘”，只是借用了山水画的一些表现手法，多了些许文采风流和古韵幽致罢了。同时，长卷的时序性和视角上的俯瞰式全视角，加之图绘与题咏相结合，致使它的史体与史笔同时具有古典和现代

[3]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双重特性，这种叙史方式后来也被引入影像史并得到提升。从社史文献的角度作研究，这一系列“西泠印社图”一定会阐发出更多的史学意义。

（五）断代史、特定年份史与专题史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断代史”是一种重要的史体，如果将百年的西泠印社史作为通史看，那么某一阶段的史志或者某个年份的史志就相当于“断代史”。关于西泠印社社史阶段性的叙述，《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分为四个阶段，《西泠印社百年图史》则分为三个阶段。而王佩智的《西泠印社 1963》则可以算是“年份史”，这部年份史之所以选择 1963 年，在于 1963 年的六十周年社庆活动标志着经过一系列历史动荡和劫难后，印社的各项活动全面恢复与重生，所以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专题史”。黄仁宇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之所以选择“万历十五年”，在于此年很多看似平常的史事，是此前历史之果，此后历史之因，是重要的历史“节点”。王佩智的《西泠印社收藏史》则是重要的“专题史”。历史问题的专题研究是一种高级的史体，它体现了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和将思辨、批评和新的史学方法、观念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性。

自沙孟海先生执掌印社社长以来，在印学研究上倡导学术性，并以多种颇具现代学术性的重要成果以身示范，相应地也使印社的学术研究包括社史研究实现了“现代性转换”。主要表现在随笔式、回忆录式、史料排列式、概述式表述之外，渐渐涌现不少“问题意识”明确、思辨性强、专题性突出的社史研究成果，尤其是百年社庆以来这种转变更为明显，比如陈振濂《西泠印社“社长现象”研究》、邱云《近代士绅变异对西泠印社形成的影响考略》、（日）菅野智明《早期的西泠印社和近现代美术社团》，等等。这些成果集中在西泠印社的逢十社庆论文集和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中涌现出来，2006 年结集出版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

集》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在以往的社史研究和史料积累中，关于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筹款赞助与受捐、产业发展、“西泠印社图”系列、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史、西泠印社与印谱史和印谱学、西泠印社与近代社会巨变、西泠印社中的诗词联句文学等，在史料整理方面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但是相应的专题性研究还有待跟进。

（六）图史与影像史学

如上文所述，古人史籍即有图志、舆地图，还有图谱之属；古人治学与读书法也有“左图右史”之说。现代史学与古典史学区别之一就是图版的重视和影像史料的引入。但是只将图片和影像作为史料，加以简单地汇集，还是不能体现出现代史学的品质。《西泠印社展》《西泠印社九十年》与《西泠印社百年图史》是西泠印社最重要的三部“图史”，尤其第三部图史，颇有集大成之格局与体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尝试并构建起了“图史”的一种史法、史识、史体和叙论模式。^[4]图史的史体与史法如何构建，这是一个现代史学回避不了且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它关系到史书修撰的“现代性”。

如今，大众的阅读习惯已然从“读图时代”到了“短视频时代”，不要说图史，即使影像也早已走进现代史学的大门，且日益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如何构建“影像史”也是现代史学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已于 1988 年开创了影像史学，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影像史学在国内迅速发展。以影像语言叙述历史，因其形象性、直观性和共情感、代入感大大提高和拓展了历史学的社会传播功能。据《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所载，1995 年法国电台记者为西泠印社拍摄过专题片，可惜笔者并未看到此片。2020 年 11 月，由吕建楚出品，华宣飞任总监制，陈振濂、龚志南、胡戎、陈立波任总策划的六集系列纪录片《西泠印社》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西泠印社影像史”。其实，当我们将此与此前传统的社史社志

相比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并不主要在于“第一部”，而在于影像作为史料进入现代史学后，相应地引起史体、史法以及跨学科交融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六集影像从史学体例上看，改进了传统的“编年史”“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体例，六部片子的标题不是时间性的又兼顾史事展开的，它是专题性的，专题性其实指向研究性和思想性。《君子》《大师》《师父》《衣冠》《兄弟》《刀法》六部分中间贯穿的又是文化艺术理想和民族精神。从史料看，它综合运用了图片、历史影像、虚拟影像、口述史料等素材；从史法和叙事范式看，它灵活运用顺序、倒序、插序，时空转换、时空共置、时空交错、时空幻化等手法，让人产生别样的读史、“感史”体验。随着各种技术的进步和跨学科交流、研究的发展，影像史和影像史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定会有新的“西泠印社影像史”面世。

以上从史体、史法分类的角度，将西泠印社的重要史学文献分成六类并做了分析，如果再从史笔（行文中具体的叙述方法）、史法（研究方法）、史观方面看，在年代时序上也有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但是大部分史著的史笔、史法还是以实录、考据、校勘、引证、梳理为主，史观上除了道统观和谱系观之外，其他史观则基本是缺席的——当然，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尤其是百年社庆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质的转变。

三、西泠印社社史修撰的影响与启示

百年西泠印社久历艰难，如今老而弥新，这是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不但体现在它的自身生命力，还体现在它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来自多方面，比如“创社四君子”的公而忘私和君子之风，历任社长的学厚德劭和引领有法，赞助

人、捐赠人、守护人的慷慨奉献、矢志如磐，历代同人和研究者的艺术和学术积累，等等。但其中西泠印社中人有自觉、明确和强烈的“修史”意识，并一如既往地结撰各种印社史志文献，这一因素是举足轻重的。因百年之社，其史昭昭，故西泠祖脉，历劫不坠，斯文独盛！其余响流韵所至，沾溉所及，从风而化者、声气相应者，亦可察可寻。若要细述西泠印社社史修撰之影响与启示，拙意以为，大约有以下几端：

（一）自觉的修史意识与道统、文脉之赓续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国可亡，史不可灭”的信念，因为中华文明的特质一直启迪中国人，只要史不灭，国即不会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发源早且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绵延不断。文脉要赓续，文明要传承，修史传世的作用不言自明。在中国士大夫心中道统、文脉是家国之魂，具体就印学而论，中华文化中的道统与文脉就显现为印学的“宗风”。西泠印社历史上撰志修史的意识是自觉主动的，也是强烈的，在百年传承中先贤与后继者一直保持着这一优良传统。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虽以印结社，但撰志修史以传诸后世者，并不限于“雕虫篆刻”，也不拘于浙派印学，甚至不限于中国印学，而是“艺以载道”，印学所载者道统、文脉也。故而《西泠印社小志》况周颐序引《礼记》曰：“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君子有取焉。非徒流连泉石，一觞一咏，啸傲烟霞，畅叙幽情而已。”^[5]可见，儒者以术营道，非止于技耳。

日本人河井仙郎在《西泠印社记》中说：“诸君为余言：印学自赵悲庵后，薪火将绝矣！近人能此者，惟湖州吴苦铁一人而已。”^[6]创立印社和延举社长，并不是出于“稻粱谋”之类功利目的，而是出于对印学宗风将绝的担心，四君子创社其实是主动担当续灯传薪的历史使命。张景星在《西泠印社记》中说：“唐宋以降，古意凌夷，逮明文寿承

[4] 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 2003 年版，第 364—366 页。

[5] 叶为铭编纂，沈慧兴注释：《西泠印社小志》序，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6]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校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 页。

力肩返古，遂为一代印宗。而周氏栎园又从而传之，印学赖以不坠。厥后吾浙八家，昌明浙派，海内宗仰，于是印人蔚起，辉映后先，迄今言印学者类能道之，然不谋所以保存，势必日就湮没，印社之设，乌可缓哉？”^[7]注意这里提到的文寿承和浙派八家都是以治印的方式续宗传脉，中间提到的周亮工（号栎园）却主要通过修撰《印人传》传承印学。可见在西泠印社人心中修史撰志是传承文脉极为得力的方式。时至今日，当我们沿着历史的纵轴线对一部部印社史志作巡礼拜读时，留在我们心中“最深”的印象一定不是印社同人治印、咏诗、作画、习书的风雅，而是传承和坚守中华文脉的风骨和精神。

（二）使印学进入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并与其同频共振

试想，如果没有这一部部的社史社志和研究论著，即使印社社址如今仍完好如初，印人的作品集也得以流传至今，留给后人的印象恐怕仅仅是历史上有一群印人在此活动过，他们雅好金石，印技绝伦。如果真如此，这样的结果应该并不符合历代西泠人的深心宏愿。历代西泠印社人都有着深厚的修养，清隽弘毅的风骨和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虽然当初《社约》中确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但是从创社之初始，西泠印社就一直保持着文化观念上的高度、开放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态度。从印学到篆刻学，再到“金石学重振”乃至近年提出的“大印学”，西泠印社在观念上贯通古今，在地域上联结中外。入社者身份多种多样，印社活动涉及收藏、出版、研讨、展览等多方面，印社所从事的文化艺术领域涵盖印学、金石、书法、诗词、国画、古文字、音乐、教育、古钱、园林、版本目录、文献学、史学、佛学、考古等诸多领域。西泠印社的“社长现象”启发我们：一社之长竟然并不一定要会治印，但一定要德高望重，要能起到学术引领、道德示范和统筹指挥的作用。这种社长推选机制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印社

社长和社员的重要学术研究与学术史进展、转变等也是同频共振的，比如沙孟海先生书学、印学研究往往与同时期的考古学、学术史相呼应。

有这些印社史志的编撰和传世，印学与其他文化的互动都是凿凿可按的。随着印社史志的史体、史法、史观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从“志实”走向思辨、批评、反思和重释，印社社史修撰和研究在方法论和史料上就有更多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的介入。因此，当我们阅读《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时，又如同在阅读“中国百年文化艺术综史”。这些印社史志会将真正的印学内涵和精神传递下去，史志是西泠印社印学文化与其他学术领域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镜鉴和桥梁。

（三）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社史”之必要性

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社史”，首先要深入走进古典史学资源的宝库，充分挖掘和利用古典史学在史体、史法、史学观等方面的营养，借为修撰西泠印社社史的参照与方法。百年西泠在撰志修史上已有丰厚的积累，但从古典史学的维度看，还有一些工作可做。

首先，可以从古典史学的史体方面受到诸多启发，并在文献结撰方面借鉴、移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古代史籍分为十五大类，十五大类下又有更多细类和史体。比如借鉴“纪事本末体”，可以选择西泠印社百年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按时序叙传；借鉴明末清初黄宗羲“学案体”和谱牒学对印社篆刻师承做出更为具体的梳理。借鉴古典史论、史评的体式和史识、史观，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一些史事做出评论；借鉴《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和其他史著之赞论、序、论、评、议、述，注释、书目提要等史法，凸显史著的史观与理论性。即使我们熟悉的《史记》，从体例构成上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互现”与“配合”，也就是由帝王

大事、历史大事记、社会文化史、贵族王侯家族史、各个阶层人物传记结撰史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构撰由历任社长、印社大事、印社与政治社会互动、印社名家、印社守社人与赞助人等板块构成的社史，等等。古典史学还可以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启发。

但是总体来说，古典史学重视叙述和实证的方法，而在分析、研究、阐释和批评、思辨上稍显薄弱。孔子首创“褒贬义例”，字里行间“寓褒贬，别善恶”。古典史学把鉴定善恶、劝惩教化作为核心史学功能，在史学观有简单化之嫌。借用历史学家斯托维奇在1976年出版的《法国的史学方法：年鉴年派》中对于西方史学存在的三种范式的研究方法，中国古典史学基本是“鉴戒式”范式和“叙述式”范式，正在经历“结构—功能”范式，从长时段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观察中总结历史规律，还要向思辨与阐释开拓。无论从时代的角度还是历史哲学的思路，西泠印社的社史修撰都可以从古典走向现代了。欧洲历史哲学有正、反、合之说，中国现代史学有信古、疑古、释古之论，从西泠印社社史来看，似乎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创制与“志实”、汇集与通编、研究与思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说：“历史只有在方案上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才能成为科学。”^[8]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也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任性随意的，要站在思想史的高度，广泛吸收当代的学科成果。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与自然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一点也不关心各种事件本身。他仅仅关心成为思想的外壳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仅仅就它们的表现思想而言才关心着的那些事件。归根到底，他仅只关心着思想。”^[9]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编年史是一种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他说：“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种熔炉，使确凿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

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10]其实，中国古典史学中已有现代史学思想的萌芽，如王阳明就曾说“六经皆史”，明代王世贞也认为“天地之间无非史而已”，只是当时在总体上还未走出古典史学的笼罩。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也出现不少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还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已出现比较史学、心理史学、文化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历史、影像史学等流派，并且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我们也应以此为“镜”、为“径”进行现代形态的社史编撰。

可喜的是，西泠印社的社史编撰与研究，已表现出显著的现代性。比如，对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身份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已表现出疑古与释古精神；2022年出版的陈振濂教授主编的《西泠印社与江南士大夫文化》，运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多种方法论，从学科交融的维度研究西泠印社社史，颇有文化史学的风范。钱穆先生就曾糅合儒家心性哲学和西方文化生命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认为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体，道德化的心性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历史文化是道德化心性的外现。《西泠印社与江南士大夫文化》从西泠印社百年社史中，抽取出了“道德化心性”这一西泠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另外，西泠印社有大量的诗词题咏，可以参照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和“诗史互证法”做研究。由此扩展以图证史、以印证史、以口述证史、以金石题刻证史和影像史都有很多可挖掘的课题。

大道荡荡，史笔如椽。历史在记载中传承，撰志修史本身又是一种历史——未来的西泠人将创造并书写出更精彩的“大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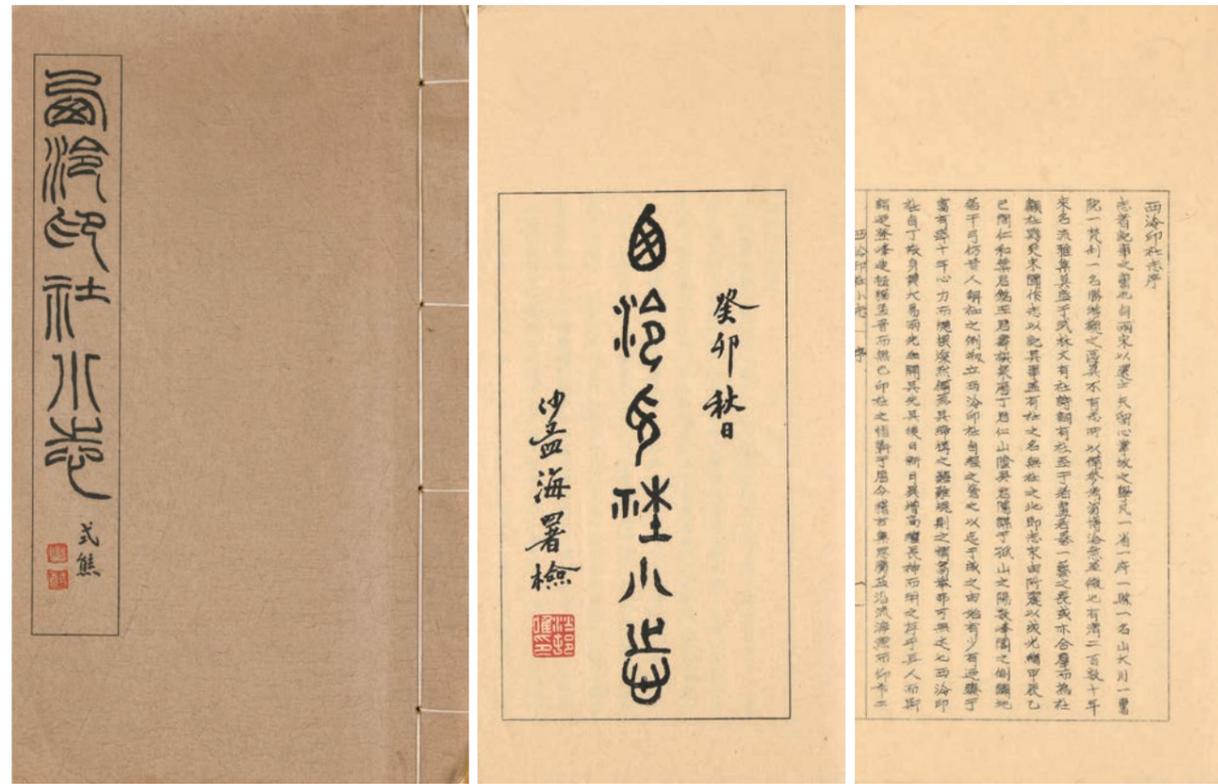
（贺文荣：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终南印社社员）

[7]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校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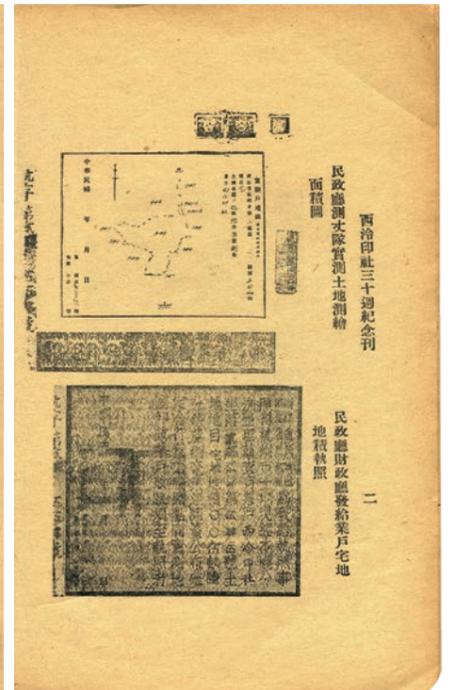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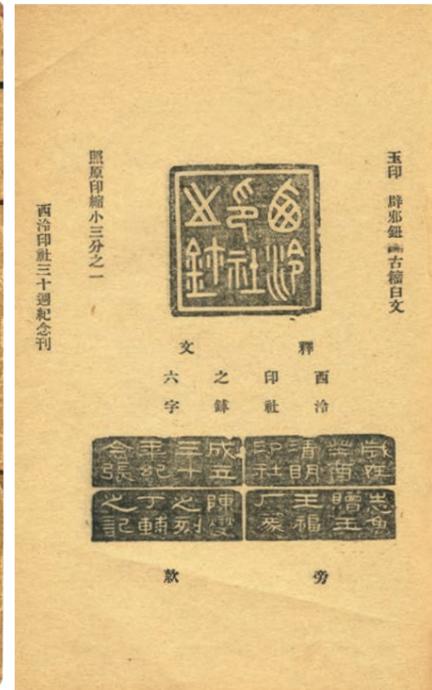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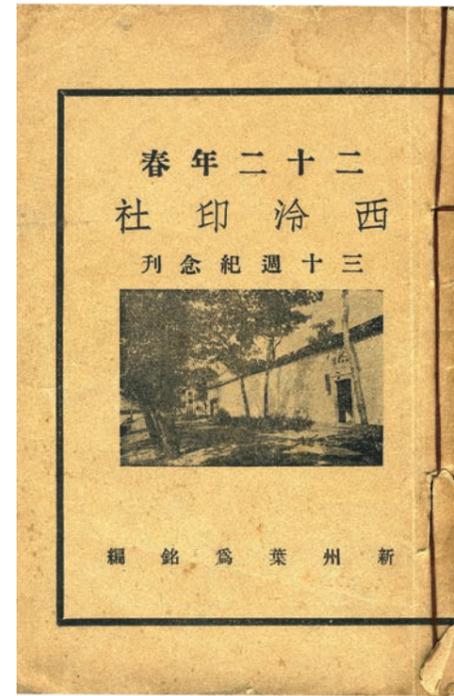
[8]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9] [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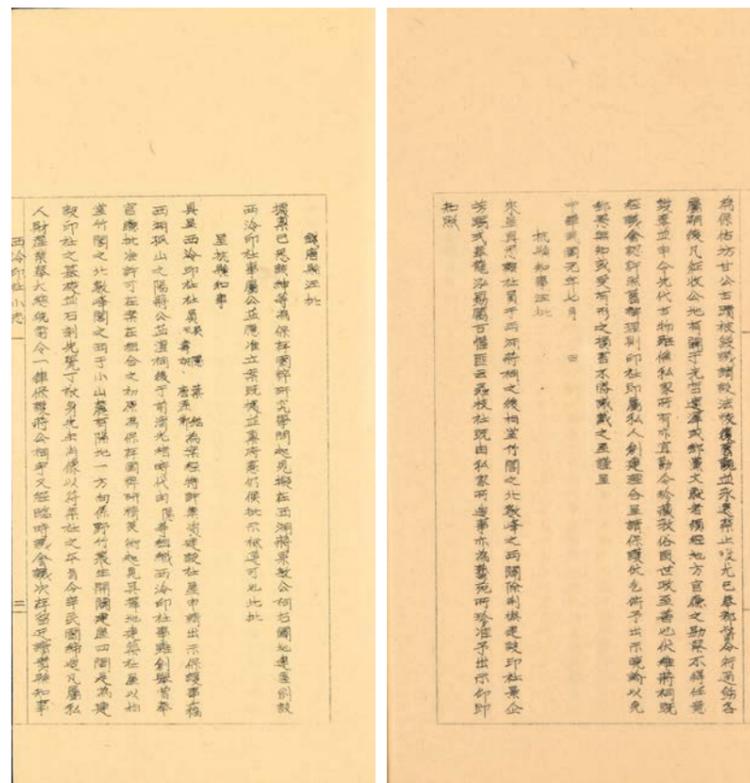
[10] [意]克罗齐著，傅仁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 《西泠印社志序》



◎ 《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紀念刊》



守传统承文脉 为往圣继绝学

——张宗祥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末探微

文 / 张 群、胡梅珍

【摘要】

张宗祥先生在古籍保护方面，最大贡献莫过于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之役。然实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归藏浙江图书馆于1912年栖身红楼开始，张宗祥先生就与其结缘，半个世纪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存藏、补阙、西迁避祸、安全返浙、校对、文澜阁目编辑等前后一直殚尽心力。文章就张宗祥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末作一考述。

【关键词】 张宗祥 文澜阁《四库全书》 补阙 校对 保护

张宗祥（1882—1965），谱名思曾，因慕文天祥为人，改名宗祥，字闰声，号冷僧，别署铁如意馆主人。浙江海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先后执教于硖石开智学堂、桐乡桐溪学堂、嘉兴府中学堂和秀水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两级师范学堂和杭州府中学。辛亥革命后，历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教育课课长、教育部视学、京师图书馆主任（相当于馆长）、浙江教育厅厅长、瓯海道尹等。1928—1949年间在平汉铁路局、交通部、中国农民银行等处任职。新中国成立后，1950—1965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兼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文史馆副馆长。（图1）



◎ 图1 张宗祥先生84岁摄于杭州

张宗祥先生精书法，善绘画，工诗能文，精鉴赏与戏曲，通晓医术。治学勤奋严谨，擅长校勘古籍，经他精心校勘的古籍有三百多种。生平抄书成癖，

能边抄边校，一生抄书九千余卷。在古籍保护方面，其最大贡献莫过于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

补抄”之役。此外，张宗祥先生毕生在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其余诸事上，也是殚精竭虑，一力承担。

一、了结文澜阁《四库全书》“乙卯补抄”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份，分藏北方四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南方三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文澜阁《四库全书》（图2）为南三阁本独存，在现存的几份库书中，命运尤为多舛。太平天国战乱，阁圯书散，经八千卷楼主人丁氏兄弟拾残抢救并组织补抄至九成，复经钱恂组织“乙卯补抄”、张宗祥组织“癸亥补抄”、陈训慈组织“壬申补抄”几成完璧，至抗战期间辗转西迁护周全，创造了中国书籍保护史上的伟大奇迹。

文澜阁《四库全书》绢面经部葵绿，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蓝，集部黄褐色。据清嘉庆七年（1802）《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当时文澜阁中有《四库全书》35990册，《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总目》）和《考证》227册，共36217册。太平天国战役后，经丁氏兄弟拾捡搜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达8389册。清光绪八年到十四年（1882—1884），丁丙主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第一次补抄之役（图3），经费在丝绢中开支，“其残编恭配891种，补抄者2174种”^[1]，计补抄26000余册。正是先有了丁氏冒险抢救及组织补抄这一伟大壮举，才有民国时期接力式的“乙卯补抄”“癸亥补抄”之役等。1911年6月由浙江咨议局议决并经浙江抚院核准，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等图书并归浙江图书馆。1912年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其在任10个月（1912年2月—11月），清理点检文澜阁书（每册阁书上钤盖“图书馆长钱恂检度”白文印，每函加夹“民



◎ 图2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 图3 文澜阁《四库全书》清光绪补抄本

国元年”书签条），编《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5卷，并整理出经丁氏补抄后仍缺之书及缺卷，在书目后附待访书和待访卷。钱恂离浙赴京后，就向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呈请批准借文澜阁本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此次补抄开始于1915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之役，补抄本又称“钱抄”（图4）。

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湖州人。曾贷书相助丁丙光绪补抄之役（王同《文澜阁补书记》）。出任留日学生监督，出使荷兰、意大利等。1914年任参议院参政。

[1] 孙树礼、孙峻，顾志兴标点：《文澜阁志》，《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图4 文澜阁《四库全书》乙卯补抄本（钱氏组织补抄）



图5 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本

钱恂组织第二次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之役是在1915—1922年间，其正在参议院任参政，而张宗祥先是教育部视学，后执掌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乙卯补抄”《离骚图》《西清砚谱》时因需要摹绘，于是请浙江高等学堂著名国画教授包公超（包公超，字蝶仙，浙江湖州人）到北京摹绘。为绘好这两部图画图谱，钱恂特邀包公超住他家。因每天到京师图书馆交通不便，于是借了文津阁本到教育部，每天包公超到教育部摹绘。摹绘《离骚图》《西清砚谱》耗时很久，浙江省议

会对这笔款项久久不见报销（3年之久），就提出责问案，钱恂收到质问公函后，很是生气，认为浙省议会不信任他，就不去理会。后来每次省议会开会，必有质问书，钱恂每次都去不去理会，绘好的《离骚图》《西清砚谱》等也就不往浙江邮寄。这件事一直搁到1922年秋天。1922年9月，张宗祥回浙江任教育厅厅长，在他回浙前，钱恂备酒在家中为张宗祥饯行，同席的单不庵（钱恂内弟）、钱玄同（钱恂弟）、钱稻孙（钱恂子）就委托张宗祥先生将“乙卯补抄”作个了结，钱稻孙将已有的记账纸交与张宗祥。张宗祥回浙后，就向浙江省议会提交一份报告，并于1923年3月将钱恂组织补抄补购的书一并交于浙江图书馆（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章箴先生亲自检点，并作《文澜阁目补》一卷），为“乙卯补抄”之役画上句号。此次补抄自1915年（乙卯）开始至1923年结束，共抄书27种201卷，其中抄成书10种，补抄书卷16种，误抄书1种1卷（《仪礼释例》，存目书），另购回原抄本192种（见下说明）；共耗银6209元，其中浙江省政府拨给公款4000元（原浙江图书馆抄书费）^[2]，不足部分由钱恂募集捐款。

关于乙卯补抄补购数量统计说明：《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文澜阁目补》著录乙卯补抄补购216种，其中补待访书13种（有购买和补抄），补待访卷20种（有购买和补抄），另重购旧抄（原抄）182种。现经与库书核对，乙卯补抄实抄27种，其中：抄成书10种，补抄书卷16种，误抄存目书1种；据文津阁本校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1种；购得原抄192种。因4种书（《大易择言》《国朝宫史》《铁崖古乐府补》《抑庵文后集》）既有补抄卷又有补购卷，故按书目品种统计乙卯补抄补购仍216种。因阁书皆写本，故在癸亥补抄时又重抄《潜邱劄记》，将眷西堂刻本换出。诸多文章中将补待访书13种和补待访卷20种两者相加，认为乙卯补抄33种的说

法是不准确的，殊不知补待访书待访卷时不仅有补抄也有补购，“乙卯补抄之役”不仅是补抄，而大部分是补购，故特作更正并说明。

二、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

了结钱恂“乙卯补抄”之后，张宗祥又发起补抄此前未竟之文澜阁《四库全书》（图5），其全力所为胪列如下：首先委托当时的浙江图书馆馆长章箴核对钱恂所编的缺书目录，查一下有无缺漏；其次是因为有了钱恂乙卯补抄前车之鉴，怕再受闲气，再加之浙江省教育经费紧张，决定此次补抄，不向公家讨要经费，向浙江人募集资金；第三是到上海，与周庆云、张元济、沈铭昌等人商量，向浙江人募款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事，当即获得他们赞同和鼎力相助；第四是发起议事录，确定缺目补抄方法及总务、会计、稽核、评议等事项，声明补抄性质为民捐民办；第五是向所有发起人保证无论今后在何任上，都要将补抄之事管到底。（按：张宗祥1922年9月回浙江，任浙江教育厅厅长。1923年发起补抄之事。1924年去永嘉任瓯海道尹。1926年道署取消后定居上海，癸亥补抄于是年结束。）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贡献巨大。

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号湘舲，别号梦坡。浙江湖州南浔人。实业起家，雅好诗词，精通书画，特富藏书。

经过各方努力，当时向浙江军政、实业、藏书、文化界47人（44户）募集，共募得捐款“16200元”^[3]。

此次补抄始于1923年（癸亥年），补抄用纸版

表1：捐款名单表（据《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整理）

每户捐款额度	捐款名单 以户为单位	捐款 户数	捐款 人数	捐款 金额
捐洋4000元/户	卢子嘉 (即卢永祥, 当时任浙江督办)	1	1	4000
捐洋500元/户	张暄初 夏定侯 张咏霓 姚文敷 王绶珊 徐冠南 葛词蔚 程禹畴 刘坚皜 刘翰怡 庞虚斋 张适园 周梦坡 俞彦文 序文 沈蕴石 冕士 季宣	15	18	7500
捐洋300元/户	张菊生 张定甫 赵问轩 朱裕兴	4	4	1200
捐洋200元/户	徐植夫 邢成裕 田祁原 魏清涛 黄碇坎 田时霖 王晓籁 徐乾麟 叶揆初 蒋抑卮 胡藻清	11	11	2200
捐洋100元/户	钱铭伯 徐晓霞 徐毓臣 朱三立 张组野 姚慕莲 姚南记 钱新甫 王翰如 叶丹庭 冯仲卿 金溶仲 张子京	13	13	1300
合计		44	47	16200

表2：补抄诸员姓氏录^[4]

职务	姓名（字号）	籍贯
发起人兼总干事	张宗祥（闾声）	浙江海宁
发起人兼评议干事 (由发起人及担任 捐募之人担任)	沈铭昌（冕士）	浙江绍兴
	沈宝昌（蕴石）	浙江绍县
	沈尔昌（季宣）	浙江绍县
	姚昱（文敷）	浙江海宁
	王体仁（绶珊）	浙江杭县
	张元济（菊生）	浙江海盐
	徐棠（冠南）	浙江桐乡
刘承幹（翰怡）	浙江吴兴	
杭州稽核干事	吴宪奎（静山）	浙江杭县
北京稽核干事	吴震春（雷川）	浙江杭县
监理	堵福洗（申甫）	浙江绍县
总校	徐伟（仲荪）	浙江绍县
收发	叶楠	浙江黄岩
校对	俞咸箴	浙江德清

[2] 钱恂：《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章箴：《文澜阁目补》1，浙江公立图书馆1923年刻本。

[3] 周庆云辑、顾志兴标点：《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4] 周庆云辑、顾志兴标点：《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363页。

续表：

职务	姓名(字号)	籍贯

	周嘉烈	浙江绍兴

绘图	林文天	四川汇里

篆隶	范腾端	湖南湘阴

满文	吴俊秀	京旗

缮录	金毓恩	京兆宛平

	黄贡三	浙江诸暨

心下印“癸亥补抄”，故称其为“癸亥补抄”，补抄本又称张抄。张宗祥总其成，周庆云掌管经费，堵福洗任监理，所有参与补抄的总务、监理、校对、绘图、抄写共 285 人。表中干事均为名誉职，监理及以下办事人员给职。每 3 个月总务干事会同稽核干事，将已抄书卷数、字数备函报告，油印分送各评议干事。由评议干事查核其款项收支实存卷目。评议干事每 3 个月开 1 次会。会计干事每 3 个月报告 1 次。抄资每千字 2—3 角，有满文、篆、隶、图形的每千字 5—7 角，平均大约每千字 2 角 4 分。校资每页 1 分。纸张：用宣纸，每百张 9 角 7 分。装订：每本 5 分。监理薪水：初每月 30 元，后为每月 50 元。助理月薪 20 元。等等。^[5]

堵福洗（1884—1961）字申甫。浙江绍兴人。张宗祥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时的学生，曾任浙江两浙师范学堂、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校教员。1924 年 1 月至 1926 年 4 月在北京任抄补文澜阁《四库全书》缺漏典籍之监理。其间不问寒暑、不辞辛劳，躬自督抄。协助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其一生的最亮点。

为方便堵福洗在北京董理补抄之事，张宗祥委以堵福洗浙江教育厅秘书之职，并安排堵福洗的老师在教育部任职的杭州人吴震春主持北京重要事情，以助堵福洗解决与教育部及对外事务，又委托其曾任主任两年的京师图书馆老同事们帮助堵福洗。

对于在北京借文津阁本补抄事宜，张宗祥对堵福洗提出四点要求：一、抄写用纸在北京印制；二、抄写字体必须认真选择，先考试后录用原则。工资照一般情况酌定，不可过高和过低。遇着金石文字和其他费力的，抄费要酌加，不可刻板做事；三、校对必须经过两道，而且要在册后盖章负责；四、装订必须选择可靠的店铺。

癸亥补抄之役自 1923 年开始，1926 年 4 月告竣，计补抄缺书缺卷 217 种 4497 卷，重校丁抄 213 种 5660 卷，补抄丁抄中卷、页、字、行缺数 52 种 577 页。补抄分京杭两地进行，1923 年据浙江图书馆馆藏底本补抄阙简 11 种（缺书 3 种，缺卷 8 种，与浙江公立图书馆第九期年报《保存类目录》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12 种”书目有出入，说明见后）。据堵福洗报告，在京师图书馆利用文津阁本补抄，选录写手在京招募，于 1924 年 2 月 4 日正式开始在京抄补，1924 年 12 月，在京据文津阁补抄大部分完成，抄书 211 种 4308 卷并运回浙江，于 1925 年 1—4 月办装订。1925 年 10 月又向文津阁补抄 189 卷，合前共计补抄缺书缺卷 217 种 4497 卷。^[6]因有余款，对丁抄择要校订，当时由浙江省教育厅派科员沈光烈协办，请校理 10 人（校者有周嘉烈、全荣霖等）、写手 4 人，搜集别本、善本校对，所以校丁抄 213 种 5660 卷是在杭州进行。（按：据《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张宗祥先生原有将丁抄运至北京据文津阁本校勘的想法，当时张宗祥不在教育厅，而任瓯海道尹。后此愿未能实现，原因见后《重编文澜阁目》张宗祥序言。）癸亥补抄本版框鲜红，

版心上朱印“钦定四库全书”，版心下朱印“癸亥补抄”。据文津阁本补抄的，未缀抄写人姓名，铃校、复校之印。封面“钦定四库全书”由张宗祥先生题写印制。因有余钱，癸亥补抄中曾做了纪念品书《金石经眼录》（图 6）。开本略比一般癸亥补抄本大，癸亥补抄本开本：27.1×17.3 厘米，纪念品开本：33.8×20.9 厘米。纪念品书《金石经眼录》上铃盖有“浙江文澜阁钞补四库全书完成纪念品”朱文方印。据《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癸亥补抄实际支出：16669.226 元，原 47 人（44 户）捐款 16200 元，前后合银行利息收得 16660.97 元，不足 8.256 元由会计捐垫。

癸亥补抄后，1926 年清点，经史子集共 36278 册（不含《总目》）和《考证》^[7]。至此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全貌。张宗祥在《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前记中云“款之力，周君梦坡、沈君冕士昆季、张君菊生、徐君冠南等为多。钞写之力，堵生申甫最著，不问寒暑，日夕督写生二百余人，乃能成此。予虽总其成，实无力焉”。^[8]

1923 年据浙江图书馆馆藏（下简称浙馆藏）底本补抄阙简 11 种（均用癸亥补抄专用纸抄，即版心上朱印“钦定四库全书”，版心下朱印“癸亥补抄”）说明如下：

缺书补抄 3 种：《春秋辑传》十三卷，据浙馆藏明刊本补抄，无提要，末铃“黄”“贡三”等印（据《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黄贡三”为癸亥补抄“缮录”人员）。《东坡志林》五卷据浙馆藏《学津讨原》本补抄，《学津讨原》本源自四库本，故有提要，末铃“黄”“林光汉校”等印。《阴符经讲义》四卷据浙馆藏商务印书馆影印《正统道藏》本补抄，前有提要，末铃“黄”“林光汉校”等印。

缺卷补抄 7 种：《清圣祖批通鉴纲目外纪》一卷据浙馆藏康熙刻本补抄，卷末未署抄者姓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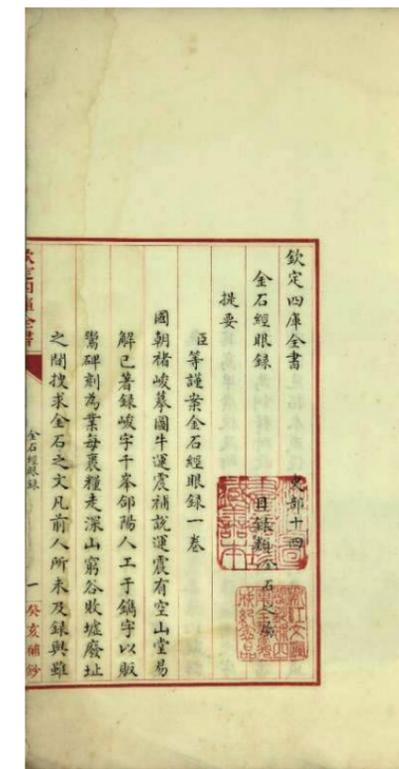


图 6 “癸亥补抄”纪念品书

未铃校者印。《黄氏日钞》卷九、十九、三十二、三十七、七十一缺页，卷二十七据浙馆藏元本、乾隆本补抄，末铃“周嘉烈”（据《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周嘉烈”为癸亥补抄“校对”人员）印；卷六十八据文津阁本补抄，卷末题“何阔如照文津阁本谨钞”，铃“李耀南校”“李堃校”。《石山医案附录》一卷据浙馆藏《汪氏医学丛书》补抄，末铃“林光汉校”。《石渠宝笈》卷一至二十六，二十九至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七至四十四据浙馆藏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印本补抄，前有提要和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时间，但未未署抄者姓名，也未铃校者印。《昌谷外集》一卷据浙馆藏凌蒙初刻本补抄，末铃“黄”“贡三”等印。《草阁文集》一卷据浙馆藏丁氏刻《武林往哲遗著》

[5] 周庆云辑、顾志兴标点：《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9 页、第 371—372 页。

[6] 周庆云辑、顾志兴标点：《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0 页。

[7] 张崧：《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文澜阁学报》193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8] 周庆云辑、顾志兴标点：《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西湖文献集成》20，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4 页。



◎ 图7 1941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藏贵阳地母洞曝晒装箱表



◎ 图8 194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藏地母洞照片

本补抄，末钤“黄”“贡三”等印。《宋诗钞》卷二十据浙馆藏清康熙十年洲钱吴氏鉴古堂刻本补抄，末钤“周嘉烈”印。

重抄1种：《潜邱札记》六卷，乙卯补抄时，未抄而购了眷西堂刻本并据文津阁本校正，癸亥补抄时，为整体统一，依现成的据文津阁本校正的眷西堂刻本重抄，并加上了提要，末钤“黄”“贡三”“林光汉校”。

《于湖词》卷三末题“郭秀林照文津阁本谨钞”，钤“堵福洗印”“林光汉校”，则是据文津阁本补抄。浙江公立图书馆第九期年报（1923年）保存类目录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12种书目著录是条：《于湖词》卷三据钱塘汪刊《宋六十名家词》本抄。钱

恂《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五之七——待访之卷末著录：《于湖词》3卷，缺卷三，丁氏待访言目不载。据章箴《文澜阁目补》，乙卯补抄补购中无此种。而《补抄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著录“《于湖词》卷三重钞”。则是否癸亥补抄时，先据浙馆藏钱塘汪刊《宋六十名家词》本补抄，后在京补抄时又据文津阁本重抄。但浙馆藏抽换出的文澜阁四库补抄零本中未见有据钱塘汪刊《宋六十名家词》本抄的《于湖词》卷三。

三、抗日战争时期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战乱，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阁书140箱，地经浙、闽、赣、湘、黔五省，行程数千里，辗转迁藏至贵阳地母洞（图7—8）。文澜阁《四库全书》藏贵阳地母洞期间（1939年4月至1944年11月），原每年秋天晒书1次，自1943年开始，改为每年春季、秋季各晒书1次。每次晒书情况，图书馆工作人员均向张宗祥报告。

1944年11月，黔南告急，12月阁书迁藏四川青木关。1945年2月19日在重庆成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徐青甫、张宗祥、余绍宋、竺可桢、贺师俊、顾树森、蒋复璁、陈训慈等8人为委员。1945年的正月十四日，张宗祥与蒋复璁到达青木关阅视文澜阁书保管情况。

阁书藏地母洞时，曾有人想让阁书留贵阳。抗战胜利后，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去留问题，是留南京还是回杭州。蒋复璁来征求张宗祥意见。张先生这样说：“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处理。不过我（癸亥）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建议政府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9]此后，

没多久就议迁回浙江等事项了。

1946年4月3日张宗祥致余绍宋信中言“文澜已决定还浙，惟阁湖上之屋已不堪藏。不知此书到浙后如何安插？”^[10]可见先生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关心和忧心。

表3：文澜阁《四库全书》避祸西南时间表

1937	8月5日	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阁书迁藏富阳渔山。
	11月	阁书经桐庐迁藏建德西乡绪塘。
	12月	阁书迁藏建德西北乡松源坞（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松阳坞”，误）
1938	1月	阁书迁藏龙泉。
	3月27日	阁书自龙泉启运内迁。
	4月30日	阁书运抵贵州贵阳的贵州省立图书馆。（按：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书安抵贵阳，藏书西门外约一里之遥张家祠堂。” ^[11] 而实际是先藏贵州省立图书馆，后迁张家祠堂）
	9月28日	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阁书及贵州省立图书馆数万册古籍迁藏贵阳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前期张家祠堂修缮由贵州省立图书馆负责）。
	4月8日	阁书全部完成迁藏贵阳地母洞。
1939	4月8日	阁书全部完成迁藏贵阳地母洞。
1944	12月6日—23日	阁书完成迁藏重庆青木关。
1945	2月19日	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1946	5月15日	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阁书由重庆青木关起运回浙。
	7月5日	阁书回到浙江省立图书馆。

四、加强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校及利用

清光绪年间，丁丙组织补抄四库时或据坊间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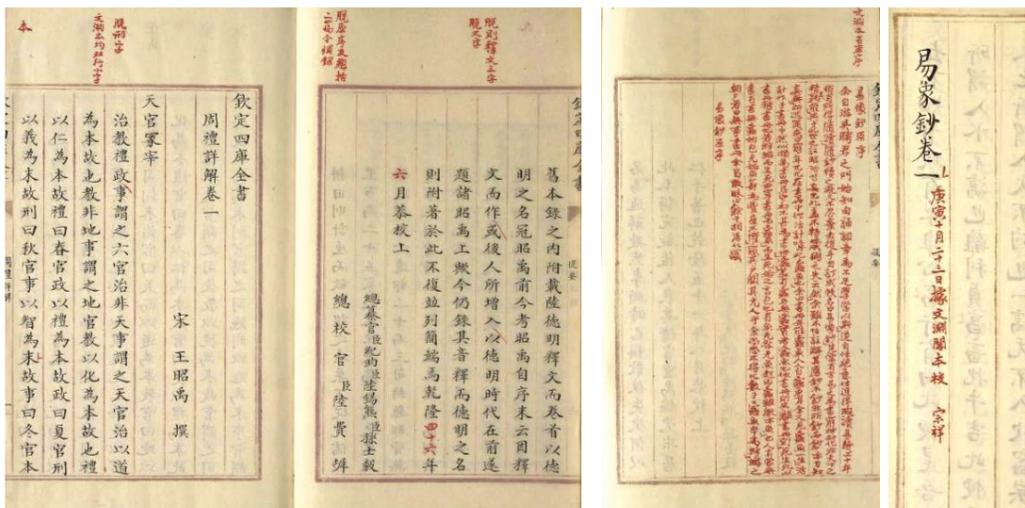
本，或据八千卷楼藏书，或据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孙氏寿松堂等其他藏书楼藏书，卷数内容有些不与阁书相符。癸亥补抄后期，对丁抄择要校订的213种5660卷，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派沈光烈协办，在杭州搜集别本、善本校对（见前述）。在癸亥补抄完竣后，张宗祥曾想再募集资金，陆续运丁抄各书赴北京据文津阁本校对，但后未能实现。1950年张宗祥先生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又重拾校笔，利用浙江图书馆藏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本，以了未竟之愿。从1950年10月开始，张宗祥先生据《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校订部分丁抄。（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231种1960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影印。）

关于民国时期四库影印也颇有曲折，张宗祥先生也曾参与其中。1918年徐世昌任大总统时，想以文津阁本为底本印行《四库全书》，此时张宗祥先生正执掌京师图书馆，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已运至京师图书馆度藏。因为四库卷帙浩繁，张宗祥先生当时提议检印其中的珍本、孤本，可省人力物力，又容易成事。此想法也得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赞同。后因诸多因素，影印出版计划偃旗息鼓。没过多久，商务印书馆拟商借文渊阁本稍加缩小影印。就在书经当时政府批准准备运上海影印了，不知何原因后又中止。1925年，政府下令改将文津阁本点交商务印书馆影印，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合同。正准备运书时又因北伐战事而搁置。文溯阁本曾在1915年运至北京故宫保和殿，1925年运回沈阳，虽有校印之议，而计划未定，沈阳起变后，1932年被伪满奉天图书馆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文渊阁《四库全书》即随其他故宫古物南迁，于是教育部再有选印四库珍本及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之议。教育部

[9] 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0页。

[10] 张宗祥：《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致余绍宋信》，稿本，现藏浙江图书馆。

[11] 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4页。



◎ 图9 张宗祥校丁抄书影

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规定将文渊阁四库未刊珍本缩成小十六开本，限用江南毛边纸印。订约后两月教育部函聘专家十五人，编订《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书 231 种，在上海影印出版分装 1960 册。此次影印基本上按照张宗祥在 1918 年提出的思路。

张宗祥先生大约于 1950 年（庚寅）10 月至 1952 年（壬辰）间校丁抄（图 9）。凡其所校之丁抄，在每卷末均题“某年某月某日据文渊阁本校宗祥”或“某年某月某日据文渊阁本校一过张宗祥”。若丁抄中无序跋的，文渊阁本有的，均据文渊阁本朱笔补抄于卷前空白处，或用印有“浙江省立图书馆”蓝格纸补抄夹于书中。校为朱笔，附纸为墨笔。丁抄提要按文渊阁本校，丁抄提要末的恭校上时间原是空着的，经张校后，时间均朱笔补上。

有些在书尾题跋，如丁抄《诗疑辨证》，因丁抄缺漏甚多，张宗祥朱笔补抄部分于卷尾或页眉空白处或附纸，每卷所缺篇目朱笔录于卷末。卷六末

张宗祥跋曰：

丁氏补钞此书第一卷缺二十一篇，第二卷缺二十篇，第三卷缺五十五篇，第四卷缺七十八篇，第五卷缺四十一篇，第六卷缺四十二篇，共缺二百五十七篇，不知当时所据何本乃至如此。此书流传本不多，宜再补钞。^[12]

张宗祥先生一生潜心研究并为之始终不懈、乐此不疲的是抄校古籍，著名的有《国榷》《越绝书》《洛阳伽蓝记》《校注论衡》等。执掌浙江图书馆期间，不仅亲校文澜阁《四库全书》，还利用文澜阁《四库全书》抄校其他书。如 1955 年 4 月用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文献校明抄本《绛帖平》。1964 年 4 月至 1965 年 7 月，增订《明文海》（先生一生中抄校事业中所抄的最后一部书，也是最大一部书），以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为底本过录增订，参考比较四库本、五桂楼本及许多作者文集单行本等。最终比四库本多 163 个作者 2211 篇内容，比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多 74 名作者、1145 篇文章。^[13]

[12] 据浙江图书馆藏丁抄《诗疑辨证》卷末张宗祥朱笔题跋标点。

[13] 徐由由：《张宗祥与增订本〈明文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 年第 4 期，第 99 页。

五、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度藏呼吁

（一）1912 年文澜阁书栖身红楼之插曲

1912 年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到馆后天天亲自检点文澜阁《四库全书》。文澜阁靠着孤山山脚，十分潮湿，不适合作为藏书之用。恰好当时浙江图书馆新馆白楼（钱恂到馆之初，白楼还未竣工）西面有一幢红洋房（又称红楼，1906 年建造，原系清政府为招待德太子来华时居住之用，后来就供大官僚宴会作乐的场合，图 10），与白楼仅隔着一道墙，钱恂就将墙挖开，将原藏文澜阁的书和橱都迁到红楼。此时有人对于钱恂此举不满，就到教育司告状。当时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主管社会教育的是朱逖先和沈兼士、钱玄同。钱玄同是钱恂教养大的小弟弟，朱逖先、沈兼士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和钱恂是老朋友，所以教育司的人都不敢去问钱恂。于是沈钧儒找到张宗祥，让张宗祥去问钱恂（《张宗祥自编年谱》记 1902 年张宗祥与钱恂引为忘年之交）。此时张宗祥在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工作，任教育课课长，主管中学。张宗祥接任务后，马上问了一句：“这一幢红洋房是供人聚饮、赌博的好，还是藏书的好？”沈钧儒说：“当然作为正用好得多。”^[14]得到教育司长的明确意见后，张宗祥就去了浙江图书馆，到馆后，说了来由后，钱恂就带张宗祥去红楼，看到的是各个书橱陈列得整整齐齐。张宗祥让钱恂写一张红楼藏书用途说明。张宗祥带了钱恂亲笔书信交给沈钧儒。沈钧儒就根据钱恂的信在政务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红楼用作藏书的方案。据《浙江图书馆志》，红楼正式归于浙江图书馆是 1916 年（图 11）。所以红楼用于浙江图书馆藏书，张宗祥先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二）1954 年定青白山居为文澜阁书栖身之所 1950 年，张宗祥先生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后，对

[14] 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66 页。

[15] 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71 页。



◎ 图 10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红楼外景



◎ 图 11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红楼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内景旧照

阁书更是珍护。1954 年，位于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红楼西侧孤山之颠的青白山居（图 12）拨归浙江图书馆（按：青白山居又称杨虎大楼、博爱堂，原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别墅，建于 1936 年）。同年 3 月阁书迁藏青白山居。张宗祥在《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中记：“（新中国成立后）由党和政府支持，又将青白山居房屋拨归图书馆，房屋在山上，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材料是钢骨水泥，真是一所最合格的书楼，现在就请它（按：指文澜阁《四库全书》）住在这里。”^[15]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2001 年间，除了中间 1970—1976 年因战备迁藏龙泉书库，1986—198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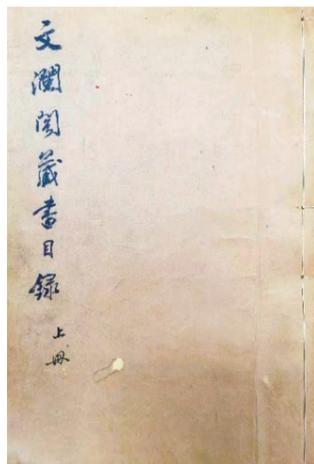
六、回收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 图 12 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青白山居外景



◎ 图 13 青白山居一楼存贮文澜阁《四库全书》旧照



◎ 图 14 《文澜阁藏书目录》封面

收集购买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是浙江图书馆历任馆长努力而为之事。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记“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得以日益发展，十年中又收到了三四十册的四库原抄。”^[16]其中《癸辛杂识》蓝绢面原抄本四册的收购，证实了南三阁本内页为一式三份办理的事实。因为文澜阁旧藏《癸辛杂识》存原抄前集、续集、别集 3 册，而这部 1950 年以后在张宗祥任职期间购回的《癸辛杂识》，蓝绢面，前有“古稀天子之宝”，后有“乾隆御览之宝”，前集、续集、别集内容与文澜阁旧藏本同，则购回的非文澜阁本，是文宗阁本或文汇阁本。而且前集、续集、别集的字与文澜阁旧藏本同，两部卷前提要末均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册末护叶均题“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编修臣吴敬舆”“校对监生臣戴葢”。

关于文澜阁书目，清嘉庆时编有《文澜阁书目清册》抄本 5 册，光绪丁氏补抄之后，张荫椿编《文澜阁四库全书目录》稿本 4 册，1912 年钱恂编《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五卷，1923 年章箴编《文澜阁目补》一卷，系乙卯补抄补购之书目，1948 年毛春翔重编《文澜阁书目》六卷，1957 年定稿，未刊行。张宗祥为毛春翔 1957 年《文澜阁藏书目录》（又名《重编文澜阁目》，图 14）定稿题签并作序。序云：

丁松生先生丙补抄四库时均据坊间刻本或者出于八千卷楼者，故卷数内容不尽与阁书相符。其出于八千卷楼者，或较阁书所采本为胜，然究与阁书不同。癸亥补抄既竣，予拟再集捐款，陆续运丁抄各书赴京据文津阁本校对。函商教厅者数四，率以书已入藏不能运出见拒，此愿迄未获偿。

钱念劬先生恂系据文津阁本补钞，钞虽为书不多，而绘画极精，故费亦钜，钞时由教部提书至部，而包君蝶仙则每日按时到部抚临。

因青白山居大修迁藏大学路馆舍外，其余时间《四库全书》都存放在青白山居（图 13）。

[16] 张宗祥：《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实》，《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余抄此书，使堵中甫弟福诰持书与北京图书馆相商，馆中同事均予旧伴，且亦极以此举为善，无不乐于相助。惟京馆力薄，乃拨款置白木桌凳若干，供写生之用，每日多至七八十人，少亦不下五十人。事后桌凳即以赠馆。竭两足年之力，始克竣事。其时北京多灾官，中甫考选楷法至严，虽粉连端楷，每千字仅工资二角，篆文隶书乃倍之。丁先生抄书之款出于厘捐，钱先生抄书之款出于省府，余款则为私人募集，不费公家一文，且非浙人不向之募。观卢子嘉督办捐助四千，彼时卢固自以为甬籍也。

文澜藏书百橱无架无书匣。予思与北方诸阁相同，曾囑中甫必须画装架图全册回浙。书来时亦曾见此册极厚。此次来馆问此册，则同人无一知之，不知何时失去。毛春翔兄此目极详细，愿与斯阁长存天地间。

阁书有目无书者两种。一曰《讲诗经解义》，此书成书在后，钞竣在嘉庆时，并未发阁，故各阁均空匣无书，书在故宫博物院图书室中，计十余部。一《陆放翁老学庵续笔记》，藏书之匣面刻《老学庵笔记续笔记》，而匣之内容则陈《笔记》之外，已不能再容一册书，故各阁亦均无此书也。一九五七年九月海宁张宗祥记，时年七十有六。^[17]

七、附录：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的张宗祥诗三首

（一）1933 年周庆云谢世，先生作挽诗缅怀：

文澜残帙愿重钞，
集款春申力倍劳。
一卷补遗书自在，
几回展阅几魂销。^[18]

按：周庆云，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发

起人兼会计干事，为癸亥补抄集款竭尽全力。1933 年张宗祥作挽诗未留稿，后补录《挽周湘舫》七诗，这是其中一首，并自编入《归杭草》。

（二）张宗祥在桂林时，由郑晓沧处得知文澜阁《四库全书》已内迁，先生感慨万千，对此写下七律《晓沧弟言文澜书迁贵阳》：

七阁文澜一阁存，中原文献忍重沦。
咸同历劫余灰迹，癸亥标年记墨痕。
笔札百人载寒暑，鲁鱼十辈校黄昏。
牛车万卷今西去，梦绕车珠夜夜魂。^[19]

按：郑晓沧（1892—1979），浙江海宁人。是张宗祥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大学。后张宗祥把此诗编入《游桂草》。

（三）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贵阳后，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字，先生当即赋诗《陈叔谅兄来》一首，概括了这一趟“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笈在行囊。
护书心血偿全愿，历劫縹緲发异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20]

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归藏浙江图书馆于 1912 年栖身红楼开始，张宗祥先生就与其结缘，半个多世纪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存藏、补缺、西迁避祸、安全返浙、校对、文澜阁目编辑等前后一直竭尽心力。个中缘由，正如张宗祥先生夫子自道所言：“人为群众服务而来，不是为个人权利享受而来。学问、政治须时时去其陈腐，发其精义，方能有益于世、有益于己。”^[21]

（张 群：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研究馆员
胡梅珍：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

[17] 据浙江图书馆藏毛春翔 1957 年《文澜阁藏书目录》内封张宗祥墨笔题跋标点。

[18] 张宗祥著、浙江省文史研究院编：《张宗祥文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9 页。

[19] 张宗祥著、浙江省文史研究院编：《张宗祥文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3 页。

[20] 张宗祥《陈叔谅兄来》后自编收入《游桂草》。《张宗祥文集》（三）点校本与原稿有出入。现据浙江图书馆藏张宗祥《游桂草》稿本录此诗。

[21] 徐洁：《外公留下的财富》，《张宗祥纪念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6 页。

“高氏赵印”简述

文 / 张书慧

【摘要】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 71 方自上海高其渊、高其进家族购入的赵之琛刻印，曾见于《丁丑劫余印存》等印谱著录，被高时敷称为“高氏赵印”，这批印章的时代跨越赵之琛二十七岁至六十九岁，印文以赵之琛擅长的浙派风格为主，也包含一些极具特色的汉凿印、汉玉印风格。这批印章在赵之琛的篆刻作品中具有独特地位，其百年流传的过程既保留了高氏的家族历史，又呈现了赵之琛的艺术生平，是研究赵之琛篆刻、生平及杭州高氏历史的重要物证。

【关键词】：赵之琛 杭州高氏 高氏赵印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一字献甫，号宝月山人、南屏隐君等，斋号补罗迦室。浙江钱塘（杭州）人。赵氏一生未入仕，鬻艺为生，工书画，尤精篆刻，篆刻师从陈豫钟，风格峭丽隽秀，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浙派篆刻的代表性人物，为“西泠八家”之一。赵之琛的艺术生涯以篆刻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他一生刻印逾万钮，作品受到时人后学的尊崇，被奉为学习浙派的门径，有《补罗迦室集钞》《补罗迦室印谱》等刊行。

辽宁省博物馆藏赵之琛篆刻作品 80 方，其中 71 方（见附表）为 1989 年自上海高其渊、高其进处购藏。曾见于《丁丑劫余印存》等印谱著录，被高时

敷^[1]（1886—1976）称为“高氏赵印”，这批印章的印主均为高氏族人。边款纪年在赵之琛二十七岁至六十九岁之间，即始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迄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横跨赵氏的艺术创作生涯，是研究考证赵之琛篆刻和交游的重要实物资料。

一、“高氏赵印”

有“高半城”之称的杭州高氏，自清乾隆年间高士楨始迁杭州定居双陈街，以锡箔业起家，后代子孙读书、经商、做官，并积极投身慈善业，是杭州地区极具影响的绅商家族。赵之琛的父亲赵辑宁^[2]

[1] 高时敷，浙江杭州人，是高时丰、高时显（1878—1952，号野侯）之弟，字绎求、弋虬，号络园，以号行，室名乐只室、二十三举斋、定思斋、长生草堂等。

[2] 赵辑宁，字素门，一字典承，家有古欢书屋和星凤阁藏书，是清代钱塘地区有名的藏书家，家藏词集钞本甚多，与陈豫钟等人友好。



◎ 图1 《次闲篆刻高氏印存》

◎ 图2 《丁丑劫余印存》

（1746—1827 后）与高氏有订交之谊，赵之琛与高学洪^[3]（生卒年不详）、高学治^[4]（1814—1894）等人友善。在与高氏的交往中，赵之琛为其家族创作了一千余钮印章，是其篆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这千余钮印章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日军侵华的战火，大部分都已损毁散佚，幸运的是，高氏后人高时敷继承家学，工书画，精篆刻，富收藏，对这批印章格外用心，耗费半生精力、巨大财力，四处搜访，最终收集到 100 余方赵之琛为高氏所作印章，称其为“高氏赵印”。高时敷是民国时期极有影响力的出版人，先后编选了多种印谱著录高氏赵印，并在序言中叙述了高氏赵印的大致流传经过，是我们认识高氏赵印最好的资料，主要有：《次闲篆刻高氏印存》（1911 年钤印本，仅存高保康^[5]序言）、《次闲篆刻高氏印存》（1938 年钤印《二十三

举斋印摭》二册本，录高时敷所藏赵之琛为高氏刻印 100 方，无序跋，图 1）、《丁丑劫余印存》（1939 年与丁仁、葛昌楹、俞人萃合辑钤印四函十二册本，录浙西四家藏赵之琛为高氏刻印 101 方，高时显作序，图 2）、《高氏赵印征存》（1944 钤印《乐只室印谱》四集十一册本，按照印主顺序录高时敷所藏高氏赵印 109 方，卷首有高保康旧序及高时敷题识，图 3）。

此外朱鸿达^[6]（1886—1970）曾搜集赵之琛刻印数百方，注意到其中“有为钱塘高氏镌刻者，系其平生杰作。”^[7]于 1935 年拓印《补罗迦室印辨》（图 4）四册本 32 部，著录 140 方赵之琛篆刻精品，其中高氏赵印 87 方，可补高时敷印谱之缺。

1979 年，浙江美术学院西湖艺苑借高时敷生前所藏部分赵印钤印成《乐只室藏赵次闲印集》，著录

[3] 高学洪，又名颂禾，字稔仲、卫泉，号茗卿，又号稿山、粟庵，斋号竹西行馆、房山山房，高学治兄，曾任福建福清县令、两淮盐运使，著有《暴麦亭集》。

[4] 高学治，字叔笈，号宰平、葺龛，斋号石墨楼、块苏斋，官台州府教授，曾于诂经精舍授课，为章太炎师。

[5] 高保康，字龚甫，仁和（今杭州）人，高学治长子，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副贡生，候选训导，工篆书。晚清学家潘衍桐门生，曾于诂经精舍任职，与俞樾、谭献等皆有交。

[6] 朱鸿达，河南新安（今洛阳）人。又名志瀛，号志庐，斋名为宾虹堂。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中国新法学会上海分会会员。擅长陶、瓷、玉器鉴定，酷嗜金石，收藏极富，精于审定。有《志庐藏印集》《宾虹堂印谱》《补罗迦室印辨》等存世。

[7] 朱鸿达：《补罗迦室印辨》序，1935 年钤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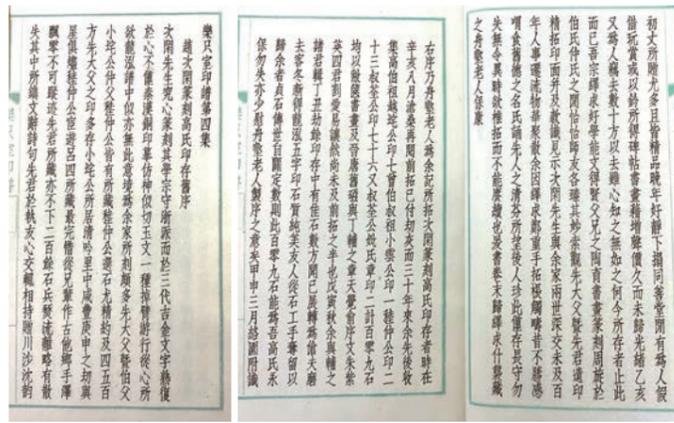


图3 《高氏赵印征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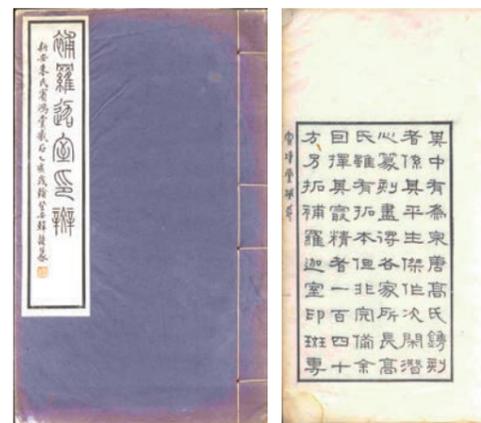


图4 《补罗迦室印辨》

高氏赵印 55 方（含 1 方两面印“高治印·叔荃”），其中“长宜子孙”“名贤真迹众唐高氏幸获绋秘”“太霍洞天”等 3 方此前未见著录，应是高时敷 1944 年后所收，亦可作为参考。

从这些印谱的著录和序言、题识，可以总结出高氏赵印的一些特点：

高氏赵印的总量为“千百纽”（见于高野侯《乐只室印谱》序，图 5），见于著录的印迹为 192 方；见著录的印迹分属 7 位高氏族人；印文的内容主要是印主的名、字、号，也包含一些与高氏生平有关的诗文印；印文风格以浙派风格为主，亦有一些备受高氏推崇的汉凿印、汉玉印风格。

二、七位印主

《乐只室印谱》本《高氏赵印征存》中高保康的序和高时敷的题识大致记录了这些高氏赵印分属不同的印主，结合著录的顺序，可以看出这 7 位印主分别是：高时敷的高伯祖越垞公，曾伯叔祖小云公、棗仲公、叔荃公，叔荃公妣氏章，及高保康的先大父高凤擢、伯父小垞公。

（一）越垞公

越垞公为高凤台（生卒年不详），高学淇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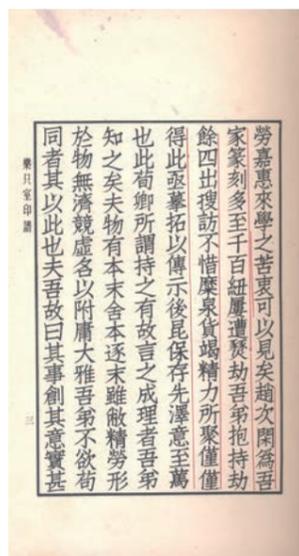


图5 《乐只室印谱》序



图6 高越垞



图7 越垞



图8 扁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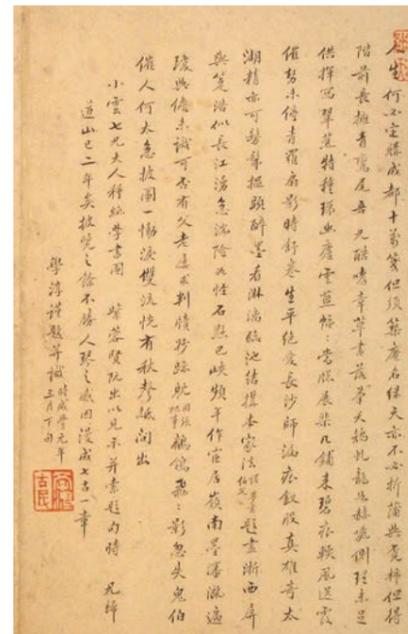


图10 高学淳书札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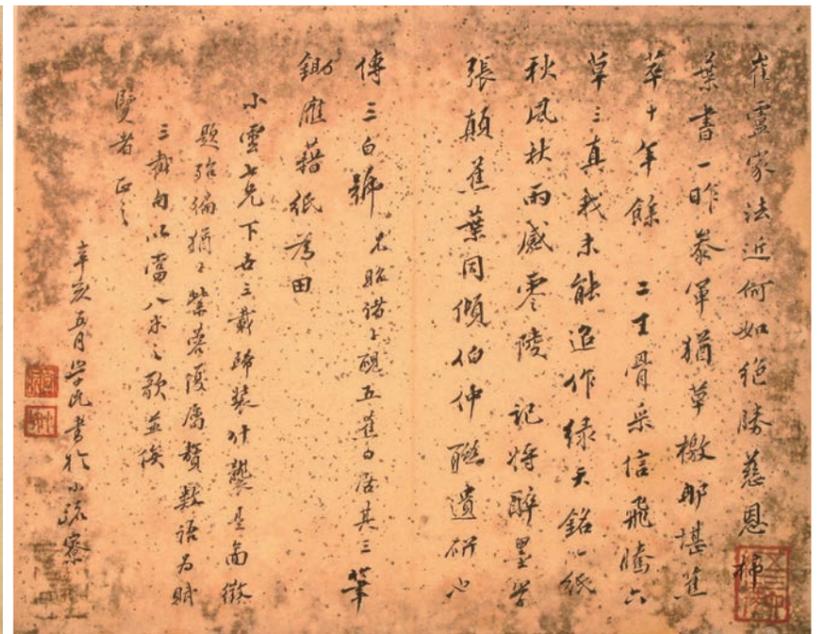


图11 高学沅书札册页



图9 高鸿之印



图12 高学淇印



图13 棗仲又字栗庵



图14 高叔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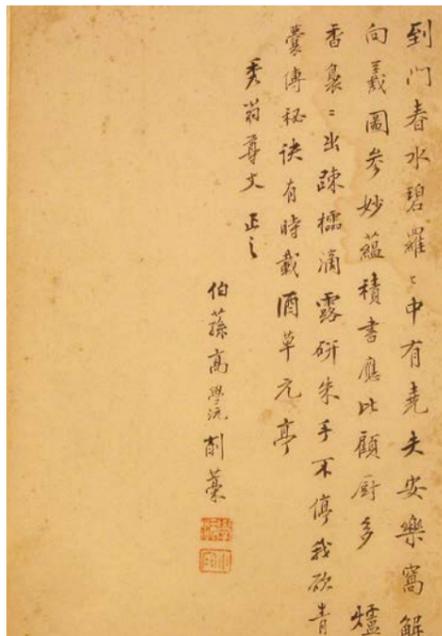
图15 高学沅

清浙江仁和人，山阴籍，字越槎，一字月垞，清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间卒，著有《书画舫试体诗》《古今体诗偶钞》。可见印迹 8 方，辽宁博物馆藏其中 3 方。（图 6—8）

（二）小云公

小云公为《高氏赵印征存》第 8 印“高鸿之印”（图 9）的印主，这一称谓亦见于辽宁博物馆自高氏购买的高学淳^[8]（生卒年不详）书札册页（图 10）和高学沅（高学治等人堂兄弟，生平不详）书札册页（图 11）的文字中。高学淳书札是其为小云公所绘种纸学书图而作七古诗，书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下旬，是时小云公已逝世二年，高学淳称之为“小云七兄大人”，高学沅书札也是为小云公绘种纸学书图而作七古诗，书于同年五月，也称小云公为“七兄”。两篇诗文皆为歌咏小云公学书事，并作缅怀，可知小云公是高学淳、高学沅等人的兄弟，行七，字辈应为“学”，其名应为“高学鸿”，生年不详，卒于 1848 年或

[8] 高锡恩，原名学淳，字古民，仁和人。高学治兄长，贡生，议叙。有《友石斋诗集》。



◎ 图 18 高学沅行书七律诗册页

1849年，善书，草书学张旭，曾于岭南为官。仅见“高鸿之印”1方印迹。

(三) 程仲公

程仲公即高学淇，可见印迹 27 方，辽宁博物馆藏其中 11 方。（图 12—13）

(四) 叔荃公

叔荃公即高学治，可见印迹 137 方，辽宁博物馆藏其中 50 方。（图 14—15）

(五) 叔荃公妣氏章

叔荃公妣氏章为《高氏赵印征存》第 108—109 印（图 16—17）的印主，是高学治的夫人章氏，生平不详。



◎ 图 16 壬申



◎ 图 17 章采

(六) 高凤墀

高保康的先大父是高学治的父亲高凤墀（生卒年不详），《杭郡诗三辑》记：“高凤墀，字芝检，凤台弟。仁和贡生，四品封职。没有印迹留存。”

(七) 小垞公

高保康的伯父小垞公见于上文所提高学沅信札册的铃印，以及另一件同样自高氏购买的高学沅行书七律诗册页（图 18）的铃印，这两件书法的落款分别为“学沅”和“伯荪高学沅”，各铃一对“学沅·小垞”朱白文连珠印（同文不同印、未见著录）。可知小垞公是高学沅，字伯荪、小垞，是高学治等人的堂兄弟。清姚燮（1805—1864）有诗《高学沅学淳昆季招同曹德馨罗以智吴敬范万后丞泛湖》一首，可知高学沅与姚燮等人为友，其他生平不详。

三、印文内容

高氏赵印的印文内容大多是印主的名、字、号，如“高越垞”“越垞”“高学淇印”“菴仲又字栗庵”“高



◎ 图 21 名贤真迹众唐高氏幸获绋祕



◎ 图 22 钱塘高氏石墨楼审定真拓



◎ 图 23 房山山房



◎ 图 24 块苏斋主



◎ 图 25 高氏金石



◎ 图 26 菴庵翰墨



◎ 图 27 怜予偏作荔支民



◎ 图 28 嗜好与俗殊酸咸

学治”“高叔荃”等，此外还有一些与印主生平有关的印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高氏的生平和与赵之琛的交往。

高学淇曾经“试吏福建……改官两淮”^[9]，可由引文“闽中我旧过”（图 19）“竹西行馆”（图 20）串联起来，“闽中我旧过”的边款“此高达夫句也。菴仲曾游闽中，指句属刻，为仿汉印。癸卯（1843）冬十一月望，次闲并记。”可知高学淇在福建为官应在 1843 年 11 月之前。“竹西行馆”的边款“高兄菴仲之官邗江，次闲作此赠别，己酉（1849）又四月。”可知高学淇转官两淮的时间在 1849 年 4 月。

在《谭献日记》《善本书室藏书记》《藏园批注敏求记校证》《韶宋楼藏书记》等清末文献中多有提及高学治富藏善本、拓本，尤其是劳权的校勘跋语中多次提到自高学治处借用善本校正，其中还有与赵之琛父亲赵辑宁共同校勘的记录，体现在印文上就是“名

贤真迹众唐高氏幸获绋祕”（图 21）“钱塘高氏石墨楼审定真拓”（图 22）等。

“名贤真迹众唐高氏幸获绋祕”刻于 1807 年，与刻于 1849 年的“竹西行馆”分别是最早和最晚的高氏赵印，同时也是赵之琛篆刻的早期和晚期中明确年款的作品，可以看出赵之琛与高氏交往纵贯其一生，这些印章既是赵之琛的篆刻作品，也是高氏和赵氏交往的见证。

四、高氏赵印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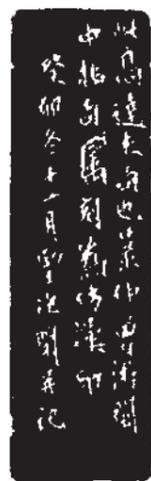
高氏赵印大多是赵之琛最擅长的浙派风格篆刻，如“房山山房”（图 23）“块苏斋主”（图 24）等朱文印章，细边细文，篆字笔划方折转角，如屈铁盘丝；也有以汉官私印为基础发展出的浙派白文的典型印式，如“高氏金石”（图 25）“菴庵



◎ 图 19 闽中我旧过



◎ 图 20 竹西行馆



[9] 潘衍桐编纂：《两浙輶轩续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79 页。



◎ 图 29 性善斋



◎ 图 30 高葺庵



◎ 图 31 学治



◎ 图 32 叔荃手拓

翰墨”（图 26）等白文印，结字洗练，自然秀美。

在传承浙派固有风格之外，赵之琛创造出在西泠八家中风格独见的汉凿印、汉玉印风格篆刻作品，取得高度的艺术成就。他的这种风格篆刻最受高氏推崇，高保康在序文中称赞为“掉臂游行、从心所欲，龙泓谱中似亦无此意境”，最富个人特色。“怜予偏作荔支民”（图 27）“嗜好与俗殊酸咸”（图 28）等白文印章，取法汉凿印，舒朗拙朴，古穆高妙，用刀从心所欲，堪称炉火纯青之作，“全印风格在洒脱稚拙中见精神，使方折平直的线条充盈着立体感和动感。”^[10]取法汉玉印的“性善斋”（图 29）“高葺庵”（图 30）等，与凿铜印简率风格相似，只是“用刀藏锋，笔致更加含蓄。”^[11]

得益于对“三代吉金文字熟复于心”（高保康序），赵之琛创作出了同时代浙派印人中少见的战国古玺风格篆刻，如“扁壶”“学治”（图 31）“叔荃手拓”（图 32）等，是其在战国古玺这种生动不拘的艺术样式的有益探索，并影响到徐三庚、王福庵等后世浙派印人的此类创作。

五、结语

本文基于辽宁博物馆馆藏，对“高氏赵印”的基本内涵、主要印主和篆刻风格做了简单的介绍，“高

氏赵印”在赵之琛的篆刻作品中具有独特地位，其百年流传的过程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缩影，既保留了高氏的家族历史，又呈现了赵之琛的艺术生平，是研究赵之琛篆刻、生平及杭州高氏历史的重要物证。除文中确认的“高氏赵印”外，辽宁博物馆藏高氏书迹铃印如高学沅书法的“学沅”“小垞”等也有可能是赵之琛所刻，期待今后能发现更多材料来丰富“高氏赵印”的内涵，丰富赵之琛篆刻及赵之琛与高氏交往的研究。

附表：辽宁省博物馆藏“高氏赵印”

印主	印文	边款	年代
高凤台	越垞	次闲，庚子七月。	1840
	高越垞	次闲仿汉。	
	扁壶	次闲篆。	
高学鸿	高鸿之印	己卯嘉平月次闲制。	1819
高学淇	高学淇印	戊子（现存印章此二字不存，根据《清代浙派印风》著录印迹补全）春三月，次闲作。	1828
	茗卿八分	壬子九秋曼生作。（原）次闲篆，己丑八月朔。	1829
	嘉禾馆	次闲制，丙申长至。	1836
	勃澥	次闲篆，癸卯十一月。	1843
	山阴高颂禾粟庵之印	道光丙午六月。次闲。	1846
	菴仲又字粟庵	癸卯五月，次闲。	1843
	崔守斋	癸卯四月，次闲。	1843
	亲见吕仙闻吹玉笛	癸卯五月次闲作。	1843
	竹西行馆	高兄菴仲之官邗江，次闲作此赠别，己酉又四月。	1849

续表：

印主	印文	边款	年代
高学淇	性善斋	次闲仿汉玉印	
	房山山房	次闲为仲藁刻。	
	怜予偏作荔支民	仿汉刻铜法，次闲。	
	太雀洞天	次闲仿汉。	
高学治	名贤真迹众唐高氏幸获绋祕	仿丁敬身法，次闲。丁卯二月花朝。	1807
	高学治印	戊子三月望，次闲作。	1828
	葺庵居士	次闲仿汉，己亥六月。	1839
	高叔荃	次闲篆刻，己亥六月。	1839
	怡道堂	次闲篆于补罗迦室，己亥。	1839
	葺庵居士	己亥夏四月，次闲作。	1839
	臣高学治	叔荃五兄名印，庚子夏次闲。	1840
	古杭高学治宰平葺庵印	仿汉刻铜法，次闲，庚子六月。	1840
	学治之印	道光庚子三月，次闲。	1840
	高学治叔荃信印长寿	父执黄小松郎藏汉印，有孔少子印后赘长寿二字，拟之，庚子二月次闲并记。	1840
	叔荃	次闲作于退龛，庚子春三月二日。	1840
	嗜好与俗殊酸咸	次闲仿汉刻铜法，壬寅八月。	1842
	叔荃·高治印	汉人作两面印多白文，兹为叔荃五兄拟之，癸卯十月次闲并记。	1843
	高学治印	癸卯三月，次闲。	1843
	叔荃父印	乙巳二月，次闲。	1845
	叔荃书翰	次闲作于退庵，乙巳春三月。	1845
	叔荃手拓	乙巳嘉平，次闲作。	1845
	叔荃填词	仿汉刻玉法，次闲乙巳十月。	1845
	我周旋室	乙巳三月，次闲。	1845
	古杭高治叔荃父印信	道光丙午之春，次闲篆刻。	1846
	古杭高学治叔荃印	次闲作于退庵，丙午二月。	1846
	钱塘高氏石墨楼审定真拓	次闲急就，丙午三月朔后二日。	1846
	高叔荃审定金石文字	道光二十六年，次闲作。	1846
	高学治	仿汉朱文，次闲。	
	高学治（象牙）	次闲仿秦人印。	
	高学治印	次闲仿汉。	
	高学治印	次闲为宰平仿汉。	
高学治印	次闲为叔荃仿汉。		
高学治印章	仿汉玉印，次闲。		
学治	次闲制。		
学治印信	仿汉玉印，次闲。		
高治私印	次闲仿汉。		
钱塘高学治印	次闲为叔荃仿汉印		
钱塘学治	次闲仿汉朱文。		
治	仿商敦文，次闲。		

印主	印文	边款	年代
高学治	高氏葺庵	次闲拟汉。	
	高葺庵	仿汉刻章，次闲。	
	葺庵翰墨	次闲为葺庵仿汉。	
	葺庵居士（水晶）	无	
	葺庵审定	次闲仿丁居士。	
	钱塘高学治叔荃葺庵印	次闲仿汉朱文。	
	臣学治·叔荃连珠印	次闲为叔荃五兄仿秦朱汉白。	
	高叔荃	次闲制。	
	高五学治叔荃	次闲为叔荃五兄作。	
	高治亦荃父信印长寿	叔荃属，次闲仿汉人刻铜法。	
	叔荃父印	次闲得意之作。	
	叔荃金石	次闲仿汉。	
	高氏金石	仿汉铸印，次闲。	
	块苏斋主	次闲篆。	
	山阴蔽庐	次闲制。	
	吉祥肖形印	次闲仿元人铜印。	
高学治	壬申	次闲刻。	
母亲	章采	次闲作。	
章氏	长宜子孙	仿秦人印。	

（张书慧：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员）

[10] 余正：《浙派篆刻赏析》，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5 页。

[11] 同 [10]，第 96 页。

《语石》早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

文 / 王江涛

【摘要】

《语石》是第一部系统的石刻类著作，其初稿完成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叶昌炽担任甘肃学政的前夕。叶氏从甘肃卸篆回乡的第二年开始集中校补。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正式刊行，但在正式刊印之前就受到清末金石界的关注，刊印以后即通过赠送、销售等方式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通，并且通过书肆传入日本，得到了日本学者的认可与推崇。《语石》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民初的金石的收藏与研究、金石著述的编撰体例，对日本的金石研究和书法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叶昌炽 《语石》 金石学 社会流传

按《缘督庐日记》，叶昌炽作《语石》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随着前辈学者对《缘督庐日记》及上海图书馆所藏《语石眷清稿本》的研究，《语石》的成书过程逐渐明朗，但是其早期的社会流传与影响极少提及。《语石》一书不仅专论石刻，也有别于以往的金石学著述，“论碑版之学，专开门径及求访、收藏、鉴别之事，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1]，但是，在《语石》成书过程中虽以所藏拓本为基础，同时广泛地参考了前人的金石学著录以及方志。其体例脱胎于清代学者的笔记手札，如桂馥《札朴》、俞樾的《九九消夏录》，只不过专论石刻。《语石》不仅涉及石刻的求访、收藏、

鉴定、制作、流通也涉及到了石刻本身的形制、文化内涵等，所以《语石》不仅是当今石刻研究的基石，也是对于自宋到清末的石刻研究的总结，对于研究清末金石学以及当今的金石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着眼于《语石》刊印前后在社会的流传以及影响，借此来进一步认识清末民初的金石学。

一、《语石》的刊印及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流传

叶昌炽早期的学术主要集中在校勘学与目录学，在结识了潘祖荫之后才逐渐将学术重心转移到了金石学上，所以《藏书纪事书》成书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远远早于《语石》《邠州石室录》等金石学著作。《语石》

虽然是叶昌炽第一部在金石学领域的著作，但是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在广东幕于汪鸣銮时就替吴大澂补纂《关中金石录》，虽然此书因叶昌炽的返乡最后不了了之，但这期间中吴大澂的富藏不仅开拓了叶氏的眼界，纂书的过程也常得到吴大澂的指导，这些都为叶氏后来编纂《语石》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所作《关陇金石志凡例》三十例，基本确立了叶氏此后金石著录的原则与方法，《语石》初稿完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初，前后耗时不到一年多，都是得益于此。

《语石》初稿完成后不久，叶昌炽就被任命为甘肃学政，在仕陇期间，叶氏通过各种途径访拓陇上石刻，又以所得进赠补，同时对初稿原卷层次作了调整以及全部眷录，即上海图书馆藏的《语石眷清稿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科举制度的废除，各省学政裁撤，叶昌炽回乡后以老乞退不再出仕，专心著书。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内集中校补《语石》，尤其是校勘花费时间与精力最多，叶氏在门人仲潘祖年（字仲午）、秦锡圭（字介侯）以及同乡张叔鹏（字孝廉）等人的协助下，通首至尾逐页反复校勘，在校勘的同时又为刊板写样，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写样告竣。写样又陆续交到徐稚圃处刊刻样板。江南印书业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内乱之后便江河日下，不仅刻工水平远不如以前，即使有较好的刻工也被官方书局所招揽。而徐稚圃刊刻水平不但比不了前人，甚至还远在其父徐元圃之下。所以导致第一次所刊红样效果不佳：

新刊《语石》红样八十七叶，自卷一至卷四未全分行布字匀净有余，瘦硬不足，以文喻之，如圆熟考卷，无可欣赏处，亦无可指摘处，此事虽小道，亦关气运，欲求如顾涧蘋校刊古籍时江宁刘氏昆仲，岂可得哉。^[2]

在叶氏之后，校勘红样时又陆续发现了板框溢字、板框高低参差、字形大小不一、笔画肥细不匀、拼版与断线等问题，这引起了叶氏的极度不满，多次面诘徐稚圃，但是由于“取近人精刻本比较参差不齐，亦如此又未能苛责之失”^[3]，叶昌炽也没有过多要求，也没有更换刻工。在叶氏的要求下，徐稚圃又多次对刻板多次调整与重刻，至宣统元年四月《语石》板正式刊刻完成，计划由连史纸与赛连纸两种付印，共印百部，由张叔鹏题签。

其实，早在叶昌炽刊印《语石》之前，西方的珂罗版印刷、石印、铅印技术早就进入了中国的印刷业，并且在金石学界被接受并应用，金石届也有石印拓本流传，吴大澂就曾赠送石印《毛公鼎》拓本给叶昌炽，并且如吴大澂等学者已经开始采用这类技术刊印著述；但作为藏书家的叶昌炽，对此持有保守态度，对于现代印刷技术显然不是很接受，从孙宗弼（字伯南）在宣统三年（1911）八月赠送叶氏《元恭集》就可以窥探一二：

午后，摊卷欲写而伯南至矣，携赠《元恭集》二册寤寐求之非一日，惜是铭笔写机器印，不啻公私簿籍，岂堪插架。^[4]

孙宗弼与叶氏是同乡，曾在叶氏任甘肃学政期间就幕。虽然叶氏对《元恭集》“寤寐求之”，但是就是因为孙宗弼携赠的是“机器印”，所以对其态度是“岂堪插架”。所以即使当时刻工水平低，但是叶氏还是坚持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语石》在清末民初除了在宣统元年（1909）初印一百部之外，之后又分别印刷五次，如表1。

由于之前的印工王景泉父子去世，担任印刷的王景泉第八子年幼，“其艺当远出父兄下”^[5]，之后印刷质量又远不如第一次，“用墨连帚皆不如法，远逊前印”^[6]。前三次所印皆用张叔鹏题签，清宣

[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1页。

[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0—5901页

[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

[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0页。

[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04页。

表 1: 《语石》在 1909 年后的五次印刷时间及数量

时间	数量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	一百部
宣统三年（1911）七月	五十部
民国元年（1912）三月	一百一十部
民国 3 年（1914）闰五月	一百部
民国 5 年（1916）正月	一百一十部

统三年（1911）十二月陶浚宣（字心云）为叶氏寄贻所题《语石》其后三次印刷皆采用陶浚宣题签，而后五次的印刷又与《语石》的广泛的社会流传有直接的联系。

早在《语石》正式刊印之前，其稿本在清末金石圈内就开始了流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叶氏返乡后不久，汪鸣銮就向叶氏索要《语石》稿，后又是孙宗弼以“学堂中文有金石之学屡次虚衷下问拙著《语石稿》可备刍菘之采”^[7]为由，《语石》稿本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又流转到了孙宗弼手中，从日记来看，直到第二年初《语石》稿本才回到叶氏手中，叶氏回乡后对《语石》的集中校对也始此。而孙宗弼拿到《语石》稿本之后不但将其用于“学堂”也对其中错误做了校正，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得伯南书，校正《语石》讹夺，录一示纸，颇资攻错之助”^[8]。所以，《语石》的刊行不仅是叶氏一人之功，从早期的拓本的收藏到《语石》的修纂、校正都受益于清末金石圈。从缪荃孙在宣统二年（1910）六月初给叶氏的信札中所说“先从章式之吏部借抄”^[9]，“章式之”即章钰（字式之）。按《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是在清宣统元年（1909）二月四日向章钰借得《语石》稿，之后又分别将“第三卷与熙之，第八、九、十予倪仲甫、郭轩圃”^[10]，又

在闰二月送去郭轩圃《语石》稿两卷，所以除了汪鸣銮与孙宗弼之外，在《语石》稿还曾到过缪荃孙、熙之、倪仲甫、郭轩圃等人手中。而缪荃孙所说的“借抄”实际上是对《语石》做的校勘，从二月至四月缪荃孙对《语石》稿十卷做了校对，并将所校《语石》订成四本。但在此期间叶氏等人刚刚将《语石》校对完成，正在刻版、付印，再加之叶氏也不知章钰所得《语石》稿从何而来，所以缪荃孙所校稿应该非叶氏所有稿本。

在清代金石圈内，著述与拓本一样，常作羔燕在士子、文人之间互相流通，《语石》正式刊印之后，最先接触到的也是叶氏周围的友人。自第一次《语石》印刷之后，叶氏就陆续赠出，其中包括像缪荃孙、吴郁生（字蔚若）、朱疆村（字古惟）、叶德辉、陶浚宣等挚友，黄山寿（字旭初），沈曾桐（字子封）、吴荫培（号颖芝）、刘岳云（字佛青）、沈同芳（字友卿）、杨钟义（字字勤）等叶氏清末同僚或科举同年，江苏存古学堂教习^[11]樊恭煦、江衡（字霄纬）、邹福保（字仲履）、曹元弼（字叔彦）、唐文治（字蔚芝）等人，以及潘祖年、汪星台（字仲午）、秦锡圭等门人弟子，这些人其身份多是晚清金石学家、藏书家或书法家。叶氏主动赠书的同时，也提升了《语石》的社会知名度，一些人开始向叶氏求赠，如顾燮光、陶幼嘉、王学澂、王襄君、蒯礼卿、黍馨索、高兹朋、黄逢元、李宗颢等人都曾向叶氏直接求赠，另外还有如张唯庭、吴昌硕、孙师郑、庞君华、胡绥之、刘承干等人也曾托叶氏亲友或弟子向叶氏索赠。在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语石》开始利市之前，《语石》的社会流传主要通过赠贻。其中吴昌硕在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托“小刘师”向叶氏索《语石》一

部，从叶氏在日记中称其为“吴昌硕大令”来看，吴昌硕在此时已始以字行。此之前吴昌硕与叶氏就已经相识，在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叶氏赴京，途径杭州停留时遇汪幼竹招饮两人相识，当时叶氏对吴昌硕的评价是“工篆隶铁笔，今之丁龙泓也”^[12]。但据叶氏在那之后的日记及吴昌硕托“小刘师”向叶昌焯索赠《语石》来看，在那之后两人并没有多少来往。直到民国 6 年（1917）二月初两人才再次见面，时年叶氏六十九岁，吴昌硕七十四岁，在叶氏去世的前几个月来两人常有书信往来。

虽然在叶氏赠书吴昌硕后六年两人才见面，但这次赠书却将《语石》的社会流传与西泠印社相联系，清宣统三年（1912）三月西泠印社从叶氏处以十五元购定《语石》十部。五月初西泠印社又以所藏书换叶氏所著，“以《藏书》《语石》各半为贖”^[13]。此次换书西泠印社以所藏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一部十六本、《武林往哲遗著前编》六十四本、《武林往哲遗著后编》三十二本、陆心源所著《十万卷楼丛书》三集、百十二本，朱记荣辑《亭林遗书》一部二十四本共换取叶氏所著《藏书纪事诗》三部、《语石》十七部。换书后不久叶氏又收到西泠印社所寄四十元购买《语石》三十部，从这次至以后西泠印社所寄叶昌焯多署名“吴石潜”即吴隐（字石潜），两人也开始了此后的交游，后来叶氏想将所藏八千通拓本售卖时也托吴隐^[14]藏物色买家。而此后西泠印社向叶氏的购书活动主要由吴隐负责，如表 2。

从民国 4 年（1915）八月十七日吴隐所购《语石》复信为“得西泠印社一字，《语石》五部已收到”^[15]以及民国 5 年（1916）十一月初一吴隐所购五部“付捷运公司转递沪庄送西泠印社”^[16]吴石潜的购书实质上是为西泠印社代购，只是署名不同。除了《语石》

表 2: 民国元年（1912）五月以后西泠印社（吴隐）向叶昌焯的所购《语石》

时间		购书活动
民国元年（1912）	九月初七	到西泠印社函，钞票十五元，购《语石》十部，即付之，
	九月十六	西泠印社前有书价未付，今日由舟人送来一函，德华银行钞票五元，索补《语石》一部
民国 2 年（1913）八月廿二		西泠印社来以钞十五元易竹纸《语石》十部去
民国 3 年（1914）八月初六		得西泠印社函，龙饼八元，付《语石》五部
民国 4 年（1915）	八月十七	吴石潜信寄售书价共十元，又索寄《语石》五部
	九月初五	得吴石潜书，属再寄《语石》五部
	十月初五	吴石潜又来一信片，需《语石》十部请速寄
民国 5 年（1916）	正月十三	吴石潜以信片来索《语石》六部
	正月十六	又得吴石潜一片请益《语石》四部
	十一月初一	昨晚得吴石潜邮片索《语石》五部
民国 6 年（1917）二月初七		又吴石潜一函，征《语石》十部

之外，西泠印社从叶氏处还购有《藏书纪事诗》，但是在数量和次数上都远不及《语石》。在同一时期，西泠印社除了吴昌硕与吴隐之外还有一位柯姓社员分别在民国 2 年（1913）二月与三月两次向叶氏购《语石》共十部。自清宣统三年（1911）开始到叶氏去世，西泠印社或购或换共从叶氏手中得《语石》达 140 部，超过了《语石》刊行总数的四分之一，极大地促进了《语石》在清末民初金石圈的传播。

西泠印社从叶氏初得的《语石》虽然在数量上远胜个人，但是更大范围的社会流传却是通过借助市场所完成的，《语石》面向社会不断出售，也才有了数次续印。《语石》开始利市后，主要由汪星台、曹元弼、徐稚圃等人代销。到清宣统二年（1910）《语石》开始畅销，在《缘都庐日记》有多处售出的记录，叶氏不断邮寄《语

[6]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504 页。

[7]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39—5540 页。

[8]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20 页。

[9]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43 页。

[10]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 3》，凤凰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 页。

[11] 江苏存古学堂由张之洞创办于 1904 年末至 1905 年初，叶昌焯曾在 1908 年三月至 1911 年一月担任江苏存古学堂史学总教。

[12]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14 页。

[13]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47 页。

[14] 王立民在《叶昌焯年表》误将吴隐当作吴昌硕。

[15]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00 页。

[16] 叶昌焯：《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876 页。

石》给汪星台等人，叶氏在正月日记中感叹“冷淡生涯，亦有热度，非意所及”^[17]，显然，这也是叶氏始料未及的。到六月，第一次所印一百部在赠送和销售下已经殆尽，但订单依旧不断，汪星台多次催印。

由于《语石》十分畅销，到民国以后逐渐有书店上门求购，如苏州的嘉余坊口书肆、青阁书肆、旋隐正心书社（观前书肆）、龙街坊书肆、正心书社，上海的振声由集益公司、正新局先后都向叶氏购买《语石》，它也借助这些书店扩大了传播范围。不但在金石届内流传，就连普通的民众也对它有了一定的接触，民国3年（1914）叶氏在上海吊唁好友归途中就曾遇到其仆人“为其乡人求《语石》”^[18]。

在向叶氏购买《语石》的店铺中，苏州的青阁书肆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语石》借此传入了日本。民国元年（1912）三月初三，青阁书肆从叶氏手中所购《语石》十部即为“东瀛估舶所托也”^[19]，后又于三月初六购去二十部。《语石》传入日本后不久，便被翻译为日语在《书宛》^[20]上连载，之后樋口铜牛又在日本《书势》（日语曰《書勢》）杂志上译载。到日本昭和四年（1926），藤野楚水将全书翻译，为了便于理解将“语石”译为“支那金石书谈”（再版称《中国石刻书道史》），由中村不折、樋口铜牛、神田喜一郎作序，大东书院发行。译本除了遵照《语石》原文之外，还对书中出现的人物、石刻单独做注，并配有石刻图本。

二、《语石》早期在国内外的影响

从《语石》接受的群体来看，虽然包括有金石学者、藏书家、书法家，但是在国内，主要是在民国初年的金

石届产生了影响。民国初年金石界的收藏与研究是对晚清的延续，乾嘉以后金石之学逐渐兴盛以来，访碑逐渐成为文人士子之间的一种风尚，而访碑之径又多据前人所著录，自孙星衍、邢澍所著《寰宇访碑录》成书虽影响很大，被罗振玉称为“金石目录诸书之冠”^[21]，一度作为访碑、著录、收藏的参照，甚至叶氏每获一新刻，皆要查阅孙赵是否著录。但是《寰宇访碑录》碑目多转录他书，并非全是依据拓本著录，所依拓本也多为他人所赠，对于有些碑目所存地点不清或有误，如叶氏在仕陇期间所访诸碑多是如此。所以自成书以后罗振玉、刘声木、杨宝镛、李宗瀚等人自清末至民国所作刊误、校正不断。而《语石》所录碑目以拓本为依据，又以前人著录参考，相对于王芑孙的《碑版广例》又更加注重石刻的搜访与收藏。卷二详列各省石刻所存，或在古刹，或在山林，地点详备，所以柯昌泗认为“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例之善”^[22]。

自宋以来金石收藏著录以秦汉为重，愈早愈奇，愈奇愈贵，到清初以后书法与石刻拓本完全挂钩，由文人士大夫主导的拓本市场（石刻）又以汉唐时期名碑旧拓、名人题跋拓本最受追捧。清末在康有为的倡导下，北碑又备受瞩目，尤其是在民国初年“购碑者竞向六朝，多执《广艺舟双楫》碑目以求”^[23]。而自《语石》在社会的流传之后，这一现象又发生了改变。叶氏在《语石》卷二“宋元碑难得”提出了“得唐碑易，得宋碑难，元碑抑又难矣”^[24]的观点，导致了“自此论出，而宋元碑浸为世重。碑贾专事拓鬻，溢溢市肆，居奇尤甚，价出汉唐碑上”^[25]。其不但对宋元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同时也将购碑、拓碑者以《广艺舟双楫》所举碑目为依据转为以《语石》所录而求。

除此之外，《语石》对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影响还体现在对金石的著录上。《语石》在体例上完全反映了叶氏写作时的初衷，后人评价也多是“精博详瞻，体例完善，实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26]。随着《语石》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其体例也为当时金石届所接受，并且影响了当时的金石学著录，其中以顾燮光的《梦碧簪石语》为代表。叶氏与顾燮光在民国4年（1915）二月通过书信相识，到叶氏去世前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期间顾燮光常为叶氏寄贻所访石刻，如《香泉寺经幢》《刘熊碑》《唐乘广禅师碑》《甄叔和尚塔铭》等数十种石刻，叶氏曾赞许“访碑健将，助我不浅”^[27]。《梦碧簪石语》全书共六卷，约成书于民国4年前后，前三卷除了分类著录石刻外在内容上前列碑目后附考据与前人无异，但是从四至六卷分区域、金石家、金石书三类著录，其中卷四“区域类”则明显受到叶氏各省石刻著录的影响，最后两卷更是在叶氏《语石》卷十“著录一则”分化并且拓展到了金石学家及金石著述，脱离了石刻本身与周边延伸到了更为具体的宏观上对石刻的研究与收藏。虽不如陈邦福所评“《语石》之外又树一帜”^[28]，也不能全然认为《梦碧簪石语》是对《语石》的效仿之作。

相对于《梦碧簪石语》在体例上的参考方若所撰、刊行于民国12年（1923）的《续校碑随笔》上下两卷则是对《语石》部分的直接摘录，只是在细微初略作取舍与调整，如将《语石》卷四“墓志十八则”摘除其中三则、将卷六“刻字五则”舍弃第三则，将四则自从《兴福寺残碑》后拆分成两则，其余皆是《语石》原文。

清末到民国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并在金石学上的应用使得过去仅仅依靠拓本作为媒介的石刻

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许多石刻拓本也由“私器”转为“公器”，各种形式的石刻在访碑热下被发现，载体的丰富程度远胜前代。而现代印刷技术作为媒介下“形状文字有如目见，研究之便，远逾昔日，著作趋向渐重专集”^[29]，而《语石》中对石刻的分类严谨详细、体系完整、覆盖全面，尤其是对经幢形制、内容的研究影响深远，被民国大多金石学家著述、方志编撰时所采用。

上文说到《语石》的体例来自清代学者的学术笔记，虽然叶氏的《语石》不是第一部专门类的学术笔记，但是对于清末学术专业化确实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叶清德的《书林清话》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书籍版本学著作，缪荃孙在序中直言“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30]专讲古籍的刊印、收藏。无论是从体例还是基本脉络则完全是受到《语石》的影响。

《语石》刊印后不但在国内立刻产生了影响，传入日本之后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早在全译本问世之前就被日本学者所接受，并且立马认识到了《语石》的独特性与价值，樋口铜牛在全译本的序中说：

《语石》在他国中拥有着众多无限的读者，其内容的价值无需置疑，早已为业界所知。其在他国中的价值，亦应当是我国中的价值。对于《语石》全文的翻译，不是提出质疑，而是对其未被翻译的部分感到遗憾。^[31]

显然，樋口铜牛的这段话不但印证了《语石》早期在国内的接受与影响，而且说明其在日本虽因受到语言文字的阻隔而并未广泛流传，但其价值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中村不折认为其“书中所述，名论卓说，顺应潮流，而不近他人之障，所记之迹极为正确”，

[17] 叶昌炽：《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5页。

[18] 叶昌炽：《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6页。

[19] 叶昌炽：《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5页。

[20] 日本《书宛》杂志创刊于1911年，后改名为《书書宛》。

[21] 罗振玉：《寰宇访碑录刊缪》，《石刻史料新编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0085页。

[22]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页。

[23]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2页。

[24]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2页。

[25]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陈公柔、张明善点校：《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2页。

[26] 方若、顾燮光：《正续校碑随笔·梦碧簪石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585页。

[27] 叶昌炽：《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60页。

[28] 方若、顾燮光：《正续校碑随笔·梦碧簪石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346页。

[29] 佚名：《金石学》，《新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7页。

[30] 叶德辉撰、刘发等校点：《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1] 叶昌炽著、（日）藤原楚水译：《支那金石书谈》，日本大东书院1929年刊行。

甚至作为古文献学家的神田喜一郎站在历史的角度认为《语石》对于金石学的意义要远超过前代人的著述：

“金石学始兴于天水，衰于元明，盛于清朝。当时诸家所撰之书，不仅汗牛充栋。近来有仁和叶铭、高唐田士懿、汧阳黄立猷、闽候林钧各金石书目之编。著录所无虑数百种。然或以目录为主，或以义例专，未见有曾提斯学之要而钩玄者，其有，实叶鞠裳昌炽昉《语石》”^[32]。

不同的是，相对于国内学者所关注的《语石》在金石学上的价值，日本学者则更加重视《语石》对于书法学习特殊贡献，译者藤原楚水就是其中代表，他主张学书应该博取，若是“徒然学一家之书，博其神趣，虽例解书，略传笔法，但耳目盗陋，终无高韵逸趣，不免俗工之毁谤也”^[33]。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金石碑碣，择之不易，“若夫僻邑难得正师之人，从次书说，得其大意，约略通之，以不误其昧所，即学书之道，得处多矣，则事半功倍”^[34]，他将《语石》作为获取书法学习的路径指引，以读书、摩挲石刻来学习书法。不但如此，藤原楚水对《语石》贡献的认知也认知更加全面、更具有前瞻性：

“以本书所述作为主臬，用以鉴别审查书籍的确切标准，尔余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制度、宗教等的研究者若能一读此书，也许会获得预期之外的感受，对他们的研究也将有所裨益”^[35]。

按藤原楚水所说，他不但肯定了《语石》在金石学、书法学中的特殊贡献，更是将视野扩展到了与金石学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更延伸到了民俗、制度、宗教等社会学范畴，这无疑是对《语石》价值的再认识与升华。同时，《语石》对藤原楚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

三、小结

马衡先生将金石的范畴扩大到了“往故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者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今日者”^[36]。将甲骨、竹木、砖瓦等有遗文者都纳入了金石学的研究范畴，虽然扩大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也因为这些物质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削弱了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单纯以“金石”界定的金石学在清末至民国逐渐出现衰退的景象，无论是在收藏还是研究上都远不及咸同时期。而《语石》刊行后求者甚多、超出叶氏预想的重要原因是叶氏也看到了清末金石学在清代社会内部变化与“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金石学的衰落，在《语石》的校对阶段，叶氏就曾无奈表示“鄙人此书尚难免覆瓿”^[37]。而《语石》的刊印与社会流传对这一时期的金石的收藏与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梁启超评价《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38]。自此金石学研究不再是专讲书法或者专著考据，将金石所体现的文字内容与书法艺术相结合，从社会文化方向理解书法艺术。

金石学自清初兴起以来，一般都作为考据学的附庸，以文字内容为考经证史提供依据。但是《语石》使石刻成为专门之学问，不仅限于研究石刻的文字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更涉及石刻的形制与流变、制作与流通，面对当时金石学“不管是研究范围还是著述体例等方面都趋于固化”的现状，《语石》无疑是为其注入了新的血液，将清末金石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江涛：广西艺术学院书法与篆刻研究方向研究生）

李流芳《湖山帖》考

文 / 魏玉豪

【摘要】

《湖山帖》是明代文人李流芳所写的一通信札，为新近发现的材料，于“中国嘉德2020年春季拍卖会”在北京面世，拍卖方将其命名为《湖山帖》，现藏于杭州芸廷美术馆。信中并未提及收信人是谁，也未注明书写时间，但通过对文本内容的释读，结合其著作《檀园集》及与李流芳游踪相关的文献，最终确定《湖山帖》是一封写给友人沈守正（字无回）的回信，属慰问信，书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时李流芳三十七岁，客居杭州。考证此信札的主要意义首先在于完善李流芳年谱及交游研究，其次有助于李流芳其他存世作品的断代与鉴定。

【关键词】 李流芳 沈守正 书信考证 《湖山帖》 《檀园集》

一、李流芳与《湖山帖》概述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侨居嘉定（今上海嘉定）。诗人、书画家，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1]。有诸多书画作品传世，文集有《檀园集》。

《湖山帖》（图1），纸本墨迹，为李流芳的一通信札，是其典型的小字风貌，有其代表书风。全文共三百字，录于下：

都门一别，匆匆又已岁余，家居为贫所累，终日攒眉无好怀。差自放于山水友朋之间，自去秋今

春常在西湖，对湖山佳处，友朋真处，未尝不念吾兄。吾兄爽气深情，弟所一见心死。虽逆旅聚头，匆匆不尽所深怀，而臭味入心，自不能忘。钱纯中兄至，得手书，知兄亦不遐遗我也。纯中兄一面之为古君子，恨此时弟方有武林之役，逗留湖上三月，殊未得与此兄从容耳。兄家小阮至此，与弟甫倾盖便相得，因弟一言便皈心道门，往参云栖，受半优婆塞戒而归，往时粗豪遂减去什三，真奇人也。弟与兄俱年踰（逾）少壮，尘网碌碌，无时可歇足，念之真令人欲生厌离，此一著子，亦不可不稍加意。兄高明绝伦，回照即是，知决不以弟言为慧，故敢叨叨耳。太质还，客居萧然，无可却寄，并勿遽不尽所欲吐，临书怅然，弟流芳再顿首。

[32] 叶昌炽著、（日）藤原楚水译：《支那金石书谈》，日本大东书院1929年刊行。

[33] 叶昌炽著、（日）藤原楚水译：《支那金石书谈》，日本大东书院1929年刊行。

[34] 叶昌炽著、（日）藤原楚水译：《支那金石书谈》，日本大东书院1929年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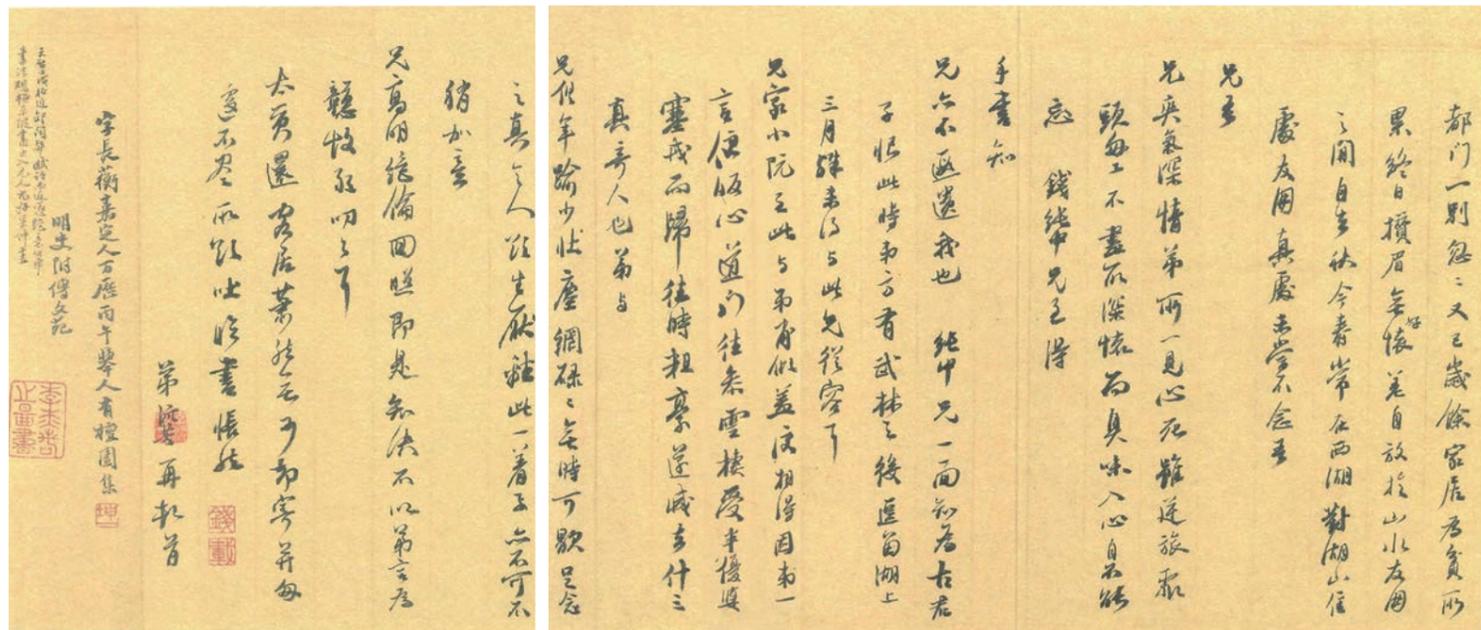
[35] 叶昌炽著、（日）藤原楚水译：《支那金石书谈》，日本大东书院1929年刊行。

[36]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37] 叶昌炽：《缘都庐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0页。

[38]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页。

[1] 孙唯特：《李流芳研究综述》，《书画世界》2022年第3期，第5页。



◎ 图1 《湖山帖》 李流芳

另，李流芳钤“李流芳印”1方；有鉴藏印“李杰若之图书”、“钱载”2方；钱载于文后题“字长蘅，嘉定人，万历丙午举人，有《檀园集》，明史附传《文苑》。天启壬戌，抵近郊，闻警，赋诗而反，遂绝意公车，书法规抚东坡，画出入元人，尤好吴仲圭。”并钤印“坤一”1方。全文共计印4方、356字。

二、《湖山帖》释读

《湖山帖》内容并不生涩，但有部分语句需说明：

[2]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兵从宣平城门入，民间所谓都门也。”颜师古注：“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韩愈《丰陵行》诗：“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柳永《雨霖铃》词：“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白居易《长恨歌》：“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
 [3]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0页。
 [4]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2页。
 [5] 语出《易》泰卦：“包荒，用冯河，不遐遗。”王弼注：“用心弘大，无所疏弃。”孔颖达疏：“遐，远也；遗，弃也。用心弘大，无所疏远弃遗于物也。”
 [6] 陆机《辩亡论下》：“故鲁肃一面而身托，士燮蒙脸而致命。”吴兢《贞观政要·公平》：“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李贽《与耿叔台书》：“今咫尺而不一见，非情也，约以是月同发，一面容颜乃别。”洪昇《长生殿·尸解》：“只是再寻不到皇上眼前，重逢一面。”

第一，“都门”^[2]，即京都城门，亦可借指京都、京城。李流芳在世期间的京都即今北京市。
 第二，“弟所一见心死”，当解作死心塌地，倾心相交。
 第三，“逆旅”^[3]，指旅舍，即古时的旅馆。
 第四，“而臭味入心，自不能忘”，此处的“臭”音同“秀”，“臭味”解作“同类”，取志趣相投之意^[4]。
 第五，“遐遗”^[5]，即疏远遗弃之意。
 第六，“一面”^[6]，指一次会面，即相见之意，但此处需强调是第一次见面。

第七，“武林”^[7]，指今杭州市。

第八，“从容”^[8]，指盘桓逗留之意，在此处指相交相识。

第九，“小阮”^[9]，指侄子。

第十，“甫倾盖便相得”^[10]，意为二人才相见便情投意合。

第十一，“云栖”，指杭州云栖寺。

第十二，“半优婆塞戒”^[11]，佛教用语，优婆塞指已依照佛的戒律受持三皈依和五戒的在家男居士。

第十三，“什三”^[12]，即“十三”，意为十分之三。

第十五，“慧”^[13]，意为傻、愣。

第十六，“太质”，具体所指不详。从信札来看，李流芳写到“太质”二字时另起一行使置于行首，可知此当为人名，又联系到后文的“无可却寄，并勿遽不尽所欲吐”，可知“太质”或为李流芳送信之人。

首先，由“钱纯中兄至，得手书”可知《湖山帖》是一封回信。

其次，信中并没有商议某事或提出诉求，只是表达对收信人的思念之情与劝诫之意，并叙说生活琐事，且因为信中言说“兄家小阮”所以可知李流芳与收信人并非本家，所以此信札并不是家书，而应该定位为写给挚友的慰问信。

三、《湖山帖》的书写时间

关于书写时间信中并未直接提及，但由信的内容可知以下四点：

[7]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0页。
 [8]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
 [9] 张忠纲：《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46页。
 [10]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5页。
 [11]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6页。
 [12]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2页。
 [13]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0页。
 [14] 李流芳：《檀园集》，四库全书本。
 [15] 石婢娟：《李流芳年表》，黄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16] 陶继明、王光乾：《嘉定李流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一，据“都门一别”可知李流芳与收信人曾在北京见面。

第二，据“匆匆又已岁余”可知此时李流芳与收信人分别已一年有余。

第三，据“逗留湖上三月”可知此时李流芳已经客居杭州三个月。

第四，据“自去秋今春常在西湖”可知去年秋及当年春，李流芳均在西湖。

所以，若在李流芳一生中同时符合以上四点的时间即为《湖山帖》的书写时间。以上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李流芳既然与收信人在京会面，说明他当时必定身在北京，而李流芳长居嘉定，主要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什么会不远千里奔赴北京？对此，查《檀园集》^[14]及相关文献可知是因为李流芳要赴京赶考参加会试。

《檀园集》是李流芳最重要的存世著作，为李流芳的友人谢三宾在李流芳去世后于崇祯年间辑成，共十三卷，收录内容繁多，是了解李流芳的首要史料，其中有大量内容涉及李流芳的交游与游历。通览《檀园集》《李流芳年表》^[15]与《李流芳年谱》^[16]并结合其友人（钱谦益、缪昌期、程嘉燧等）的记载可知李流芳历次北上赴京全部是为了赶考，且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南京中举人以前与明天启二年（1622）绝意仕途以后均再无任何关于北上或赴京的记录，故可确知李流芳此次入京必定也是因为要参加会试。

此外，可以确定的是李流芳每次会试结束均南归，从未长居北京，所以其“都门一别”的时间必

定是会试举行的当年。李流芳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南京乡试中举之后才有可能赴京，所以其能够参加会试的时间应自1606年始。实际上，李流芳虽六次赴京赶考，但仅四次入京参加会试，分别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万历三十八年（1610）、万历四十一年（1613）、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因为《湖山帖》写于会试一年以后，故所有可能的书写时间只有万历三十六年（1608）、万历三十九年（1611）、万历四十二年（1614）、万历四十五年（1617）

四个时间段，综合分析如下表1所示。

表1：李流芳赴京赶考的时间

赴京赶考次数	赴京赶考时间	会试时间	可能的书写时间
第一次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32岁（于南京乡试中举）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 33岁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 34岁
第二次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 35岁	万历三十八年戊庚（1610） 36岁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 37岁
第三次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38岁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 39岁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3） 39岁
第四次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41岁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 42岁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 43岁

续表：

赴京赶考次数	赴京赶考时间	会试时间	可能的书写时间
第五次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44岁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 45岁（因病弃考，未至京）	
第六次	天启元年辛酉（1621） 47岁	天启二年癸亥（1622） 48岁（至京郊弃考，后绝意仕途）	

首先，关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1606年李流芳与钱谦益一同在南京乡试中举^[17]，于1607年赴京赶考，此时也是李流芳生平第一次入京，但二人均落第南归^[18]，1607年至1608年间李流芳游历处有北京、滕县（今山东滕州）、滁州龙潭山、嘉定九峰三泖、苏州望亭、苏州石湖、苏州灵岩山、鹿城（今属江苏省昆山市）^[19]，并无有关游历杭州的记载，极有可能1608年以前李流芳从未到过杭州，故该年应排除。

其次，关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1609年第二次赴京赶考^[20]，1610年落第南归，途经北京、江苏宜兴，至迟于本年夏到杭州西湖^[21]，之后是否离杭不详，但本年秋又到西湖与朱璐（字白民）同游白堤、苏堤^[22]，本年十月亦在西湖^[23]。次年

（1611）四月、五月均在西湖^[24]，所以本年春李流芳尚在西湖，符合其所言“自去秋今春，常在西湖”。1611年春距其离京南归恰一年有余，1610年至1611年在杭至少包含“壬戌秋”“壬戌十月”“辛亥四月”“辛亥五月”四个时间段，故此次杭州之行“逗留湖上”的时间应不止三个月。

再者，关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1612年第三次赴京赶考^[25]，1613年落第南归^[26]，八月虽至杭州游历清晖阁、西湖^[27]，但十月即离杭至苏州乌镇^[28]，1614年主要活动于苏州，本年四月亦在苏州^[29]，后返回安徽故里扫墓^[30]，从新安返回西湖时已是腊月^[31]，并非“今春”。故该年应排除。

最后，关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1615年第四次赴京赶考^[32]，1616年南归^[33]，夏季在苏州常熟、冬春之交（十二月末）在嘉定檀园^[34]，秋季是否在杭不详。1617年四月在苏州阊门^[35]、六月在杭州西湖^[36]，八月曾先后游历苏州虎丘、苏州铁山、苏州横塘、九月至杭州，同月又至嘉兴清溪、嘉兴西塘^[37]。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一月、

二月、三月是否在杭不详，但考虑到去年十二月末在嘉定，本年四月在苏州，加上辗转两地的时间，所以这三个月期间不可能全部在杭，可知其自1616年秋至1617年春在杭州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段，故该年应排除。

综上，《湖山帖》应写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春，时李流芳三十七岁，客居杭州。

四、《湖山帖》的收信人

首先，《湖山帖》既写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那么收信人必定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北京与李流芳有交集，而关于此年李流芳在京交际情况据《李流芳年表》^[38]载，有姓名可查者共七人：袁中道、钱谦益、韩敬、徐田仲、贺中冷、王志坚、沈守正。对于收信人的考证应首先考虑此七人。

再者，总结《湖山帖》内容可知收信人至少有以下特点：

收信人与李流芳感情至深且志趣相投。从李流

[25] 《檀园集》卷十一《胜果寺月岩图》：“壬子腊月十三日书于金阊舟中，时孟阳以送余北上……”

[26] 《檀园集》卷二《南归戏为长句自解》：“人年四十老将至，譬如已死亦即休。”

[27] 《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图册·两峰罢雾图》跋语：“癸丑八月，清晖阁题。”《檀园集》卷七《沈雨若诗 草序》：“去年中秋待月于西湖，因流连两山间，至红叶落而还……甲寅九日。”

[28] 《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图册跋语·云栖晓雾图》：“癸丑十月，孟阳及子将兄弟与余同舟至吴门，夜泊乌镇，酒后题字。”又《檀园集》卷十一《永兴兰若》：“癸丑十月，乌镇舟中题。”

[29] 《檀园集》卷十一《题灯上人竹卷》：“往岁己西北上舟过莲泾访双林上人于积善庵，出所画竹卷属余题字，以后每经吴门数欲过中而不果，盖不见上人者六年矣……今日如复理梦中也……甲寅清和月。”又：“甲寅四月浴佛日，雨初霁，风日清和，同江子士衡、舍弟无垢泛舟桐泾，自云隐庵步至积善精舍，与上人坐窗下啜茶，试墨信笔题此。”

[30] 《檀园集》卷十一《题画册》：“甲寅九月，扫墓新安，过吴门，别季弟无垢于寓舍。”

[31] 《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册跋语·江干积雪图》：“甲寅腊月，自新安还，孟阳觞余湖上。”

[32] 《檀园集》卷十一《题画册》：“乙卯北上，乃复携之而行。京师埃尘蔽天，笔冻欲死，画意益不得发。”

[33] 《檀园集》卷十一《题画册》：“丙辰落魄而南。”

[34] 李流芳《山水扇页》款为：“丙辰夏日，过云初口拂水山房作。”《檀园集》卷十一《题溪山秋意卷》：“去岁残腊，屏居檀园……”“残腊”即残冬，农历十二月末，临近春天。朱熹有诗《残腊》：“残腊生春序，愁霖逼岁昏……”

[35] 《古缘萃录》卷六《溪山秋意图》卷程嘉燧跋曰：“丁巳四月，余居停阊门，长衡将之武林，因复同舟入山。”

[36] 《檀园集》卷十一《题溪山秋意图》：“丁巳六月十一日题于西湖小筑。”

[37] 《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题词·虎丘》：“今年八月，孟阳过吴门……偕游虎丘，秽物不可近，掩耳而去。”《檀园集》卷二：“余买一小丘于铁山下……今日始引孟阳至其地……时丁巳八月十八日也。”《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图册题词·横塘》：“丁巳中秋后三日，画于孟阳阊门寓舍。”《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册题词·横塘》：“九月复与孟阳至武林，夜雨，泊舟朱家角，补题。”《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册题词·虎丘》：“丁巳九月六日，清溪道中题。”《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册题词·灵岩》：“余往来西山，数过灵岩山下……丁巳九月七日西塘舟中题。”

[38] 石婍娟：《李流芳年表》，黄霖：《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17] 《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十《选举志·举人六》：“万历三十四丙午科……李流芳，嘉定人。”

[18] 钱谦益《初学集》卷一：“丁未春与李三长衡下第，并马过滕县，貰酒看花。”

[19] 钱谦益《初学集》卷一：“丁未春与李三长衡下第，并马过滕县，貰酒看花。”程嘉燧《松圆浪淘集》卷九《中霄》：“四月，同长衡、闲孟游柳上九峰还。”钱谦益《初学集》卷六十九《华山雪浪大师塔铭》：“丁未，偕李长衡扣师望亭。”《檀园集》卷四《滁州道中见梅感赋》：“旅宿滁州，同子将、无际步履至龙潭山，忆丙午偕羽明、孟阳来游已一纪矣。”《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图册题词一石湖》：“戊申九日，余与孟髯同游，值风雨，游人寥落，山水如洗。”《檀园集》卷十一《江南卧游图册题词·灵岩》：“余往来西山，数过灵岩山下，戊申秋日，始得与起东及其二子梁瞻、雍瞻一登。”《檀园集》卷七《徐思旷制义序》：“去年在鹿城，过思旷（徐方广）寓舍，谈良久，颇洽，知思旷非常人也……己酉花朝前二日书于西磧之六浮阁。”

[20] 《檀园集》卷十一《题灯上人竹卷》：“往岁己西北上，舟守莲泾，访双林上人于积善庵，出所画竹卷属余题字。”

[21] 《檀园集》卷十一《题郑胤骥诗册》：“往岁庚戌，在都下，闲孟寄予，病起诸什，余与淑士负暄檐下际开卷读之，时叫绝。”《辛丑销夏记》卷五《明李长衡善卷洞图》：“庚戌四月，过宜兴，应潘克家、蒋韶宾邀，游善卷洞。”程嘉燧《松圆浪淘集》总目《荆云十二》：“庚戌夏，子柔、长衡以书速余湖上。”程嘉燧《松圆浪淘集》总目《荆云十二》：“庚戌夏，子柔、长衡以书速余湖上，十月，遂楚游。”

[22] 《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图册题语·江干积雪图》：“庚戌秋，与白民（朱鹭）看月两堤（指白堤与苏堤）。”

[24] 《檀园集》卷十一《三潭采菀图》：“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菀菜方盛……”《檀园集》卷十一《西湖卧游图册 跋语·法相寺山亭图》：“去年在法相……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楼灯下题。”

芳对收信人“未尝不念吾兄”“弟所一见心死”、“自不能忘”可见一斑，且收信人对李流芳也“不遐遗我也”可知二人情谊甚笃。通过前文提到的“臭味”二字，又可知二人志趣相投。总之，李流芳与收信人绝非一般朋友关系，而是有相同志趣的深交挚友。

收信人是李流芳结识的新友。信中言：“弟所一见心死。虽逆旅聚头，匆匆不尽所深怀，而臭味入心，自不能忘”。书写此信时李流芳已三十七岁，“一见心死”意为一见面便觉可以倾心相交，二人若是老友，则不应在相识多年之后仅仅在一封慰问信中说“一见心死”，此语更像是写给一位新近结识的友人。又言“知兄亦不遐遗我也”，“遐遗”意为抛弃、遗弃，若二人是旧友，方分别一年便在信中言“遐遗”颇不得当，故知收信人应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入京期间结识的新友。

收信人年龄与李流芳相仿。信中言：“弟与兄俱年逾少壮”，少壮之年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不指具体多少岁，但此时流芳三十七岁，故其言“年逾少壮”之依据应是三十岁，而“俱”字说明二人年龄应相差不大。

所以在以上七人中，若有能符合此三点者则为收信人。首先，钱谦益、王志坚为李流芳挚友无疑，但均与李流芳定交甚早，并非新交，可排除^[39]。其次，《檀园集》几乎涉及了李流芳全部的交友圈，记述与友人的交游之文颇多，但其中不见任何关于韩敬、贺中冷的记载，故知二人与李流芳或非情谊甚笃。再者，从《檀园集》来看，李流芳与袁中道之间的交往并不多，仅《冬日同袁小修、王幼度诸君集钟伯敬邸舍即事》^[40]一诗与袁中道有关，从诗文内

容并不能体现出二人情谊如何，姑且存疑。然后，关于李流芳与徐田仲的交际，《檀园集》有记载如下：

今年在湖上为李郡伯陈司李画二册，适同年徐使君田仲见而爱之，心欲之而不言，余窥其意，归而作钱塘十图以遗之。^[41]

从“心欲之而不言”“余窥其意”可知二人并非情谊甚笃，二人之间的关系与“未尝不念吾兄”“一见心死”“自不能忘”之感实有差距。故以上六人或不可能是收信者，或可能性较小。

沈守正（1572—1623），字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举于乡，谒选得黄岩教谕，迁国子监博士，擢都察院司务。高才博学，诗文隽爽，喜为苏白体，科举屡下第，曾自发上书参议郡事，所提诸议多被采择，时有官缺，乡人以为沈守正学博俸浅，故尽相推举，但守正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国家爱惜名器而重用他，力辞不就，仅得司务，卒于任上。^[42]著有《四书丛说》《浚河仿倭议》《雪堂集》《诗经说通》，他作已遭毁散，其中《诗经说通》仍为当代学术研究对象。《雪堂集》二十卷^[43]，部分佚失，今剩十卷，所录诗文涉及与李流芳的交游。

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沈二人在“燕中”^[44]相识之后，虽长期相隔两地，但时有交游。沈守正《雪堂集》^[45]录有《寿李长蘅母太夫人》《寄怀李长蘅兼索其近笔》《观长蘅作画》《和长蘅画柳扇诗》《梦长蘅》等诗文，多为抒情达意之语，表现出二人交游之多、情谊之深。李流芳《檀园集》有载：

灵鷲看红叶，期沈无回不至。^[46]

今年无回在灵鷲，余在小筑，无回书来屡约余看红叶……无回复以事归矣，为之怅然。是日至岫嵎树亦在焉……深恨不得少留践无回之约，遂题之，以订后期。^[47]

并有诗《西湖寄沈无回于黄岩》^[48]亦可见二人情谊甚笃。但最能体现二人情谊、志趣、交游、都下分别者，为李流芳撰《祭沈无回文》^[49]，全文如下：

呜呼无回，诂至是耶，兄文章可以名世，学术可以经世，风节可以持世，胸怀气量可以容盖一世，颀然玉立，轩然霞举，望而知为福德寿考之相。乃一第不酬其才，一官未究其用，而奄忽至是耶！

吾两人之交自庚戌倾盖燕中，中间吴越相望，聚散不常，良晤之期，廿年有几，而今遂成隔世耶！犹忆受之之言曰“近识沈无回，酒杯流行，意态俯仰，绝似长蘅。比索无回于邸中，相视而笑，求其相似者而不得也，而今遂使我为中郎虎贵，不逾痛耶！吾两人相聚每以忽忽不尽意，为叹公车之赋，屡约同之。壬子，兄以内艰罢。乙卯，弟以附舟，先以病归。夙昔之约，未及一践，而今遂无合并之日矣！可不痛耶！

丙辰被放，同羁留寓舍，东西相去十余里，隔日必一相闻，三日必一相见，弟先出都门，就兄言别，篝灯置酒，执手沈澜，别之难如此，而今竟成永诀耶！

兄官黄岩三年，己未之冬，兄以假归，而弟适至西湖，始得一握手，是夜月明，同饮于涌金舟中，酒阑慷慨，察兄之意有甚不能释然者，窃怪其不达，夫世之所为巍科膺仕者，其人已略见之矣，而区区欲与哈等为伍乎？

嗟乎无回，吾知兄盖欲有所用于世而非苟然者也，兄性狷洁，居恒不妄名一钱，而胸怀廓落，

或不恤倾筐倒度以缓急人，今至以贫，仕为禄养，非兄意也。然则兄之不释然于中者非一日矣，而竟以此天其天年耶！

弟迂疎懒拙，于兄不能为役，而兄中心好之，又酬应不能悉其能事以事兄，兄晚而游戏此道，每秘惜不肯示人，偶一见之，气韵妍妙，遂入唐宋诸人之室，辄爽然自失，欲为辍笔，而今已矣，不及见兄之所止矣。

呜呼！兄即不得大用于世而小草一出，他日宦成，优游林下，弟亦将买山卜邻，相携终老，子图我书，子歌我和，以酬宿昔之诺，岂不乐乎！而兄竟舍我而逝，弟将谁与为质耶！

呜呼无回！以兄之明达，其于死生之际超然不惑，无待言矣。生而为世闻，没而祝于乡，先生之列亦可以愧夫泯泯以生、泯泯以死者矣！况两贤翩翩竞爽，将继续兄之业，而代兄色养之所不逮，兄其可以瞑耶！虽然，亦可悲也已，言叙生平以佐一觞，填胸塞膺不知所次，无回无回！其知之耶？尚飨。

从中可知以下几点：

第一，此文感人肺腑，可知二人感情至亲至深，互为知己。

第二，由文中“子图我书，子歌我和”，可知二人之志趣同在书画诗文。又由“兄晚而游戏此道，每秘惜不肯示人，偶一见之，气韵妍妙，遂入唐宋诸人之室……”知沈守正于绘画亦有造诣，绘画是二人的共同志趣。

第三，文中“丙辰被放，同羁留寓舍”，说明二人到京后都没有居住于亲友家中而是寓居旅舍，这与《湖山帖》言“逆旅聚头”相吻合。

第四，文中“（丙辰）弟先出都门，就兄言别”，说明会试结束后李流芳先离京，沈守正再离京，与

[39] 《檀园集》卷十一《紫阳洞》：“余己亥岁与淑士（王志坚）同游，后数至湖上。”钱谦益《初学集》：“（李流芳）……更十余年，与予偕举南京。”

[40] 《檀园集》卷一，第23页。

[41] 《檀园集》卷十二，《题画为徐田仲》。

[42] 李榕：《杭州府志》第一百四十四卷，民国11年（1922）铅印本。

[43]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第二十六卷载：“沈守正《雪堂集》二十卷（字无回）。”

[44] 《檀园集》卷十《祭沈无回文》：“吾两人之交，自庚戌倾盖燕中，中间吴越相望，聚散不常。”

[45] 沈守正：《雪堂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46] 李流芳：《题画再送王平仲》，《檀园集》卷一，四库全书本，第20页。

[47] 李流芳：《岫嵎云涧》，《檀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第201页。

[48] 李流芳：《西湖寄沈无回于黄岩》，《檀园集》卷三，第66页。

[49] 李流芳：《祭沈无回文》，《檀园集》卷十，四库全书本，第186页。

《湖山帖》言“都门一别”吻合，故万历庚戌年（1610）二人在京分别时的情景可能也是如此。

第五，文中“察兄之意有甚不能释然者，窃怪其不达，夫世之所为巍科臚仕者，其人已略见之矣，而区区欲与吟等为伍乎？”可知沈无回有意于仕途，但长年不第，故无可奈何，颇为失意，《湖山帖》言“弟与兄俱年逾少壮，尘网碌碌，无时可歇足，念之真令人欲生厌离，此一著子，亦不可不稍加意……故敢叨叨耳”其规劝之意当知是对此事而言。

第六，文中“弟迂疎懒拙……以兄之明达，其于死生之际超然不惑”与《湖山帖》言“兄高明绝伦，回照即是，知决不以弟言为赘”相同，均以笨拙自谦，以明达相称。

第七，文中“吾两人相聚每以忽忽不尽意”与《湖山帖》言“逆旅聚头，匆匆不尽所深怀”相符。

此外，沈守正生于隆庆六年（1572），李流芳生于万历三年（1575），二人年龄相仿，仅差三岁，与收信人特点吻合。综上可推断《湖山帖》收信人为沈守正。

五、结语

考证此信札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补阙李流芳年谱及李流芳交游研究，并有助于其存世作品的断代与鉴定。首先，在现行的年谱中均未提及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流芳客居杭州与沈守正互通书信这一事件。其次，据信中内容可知钱纯中（钱文光，字纯中，钱谦益族子）与李流芳也有交集，这一点在现有年谱中也不曾被提及，关于李流芳交友圈的考证也未将钱纯中涵盖在内。再者，沈守正作为与李流芳关系密切的友人，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强调甚至完全忽略，如李晨《李流芳生平交游考略》^[50]中未提及李流芳与沈守正的交往，李柯《李

流芳西湖交游考》^[51]用较少篇幅介绍了二人的交游，但未强调二人关系的特殊性，相关信息可据此予以补充。最后，近年来李流芳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见不鲜，鉴定与断代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此信札无疑可以作为其三十七岁左右时代的书法风格之参照标准。

（魏玉豪：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硕士研究生）

[50] 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1期，第38页。

[51] 《中国文学研究（辑刊）》第十八辑，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11年版。

社藏撷珍



◎ 吴昌硕自用田黄印



酸寒尉印

吴昌硕篆刻力求“破古法”而“出己意”，即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达到一种变通与突破。此方印胎息于秦汉将军印，线条劲挺、气息高古，凸显了古朴清刚而酣畅矫健之印质形态。全印生动地演绎了“奔放处见法度，精微处见气魄”。

（王琪森文）

一月安东令

“一月安东令”是昌硕先生最珍贵的十二方田黄自用印之一。此印“一月”二字合文，取法残瓦券。印加十字栏，“东令”借边左立，右边文字上提，“月”字别致地半斜而出，铤险全局，允为点睛之妙笔也。“瓦甃之间有道在”，此印足可证之。

（童衍方文）



岳老

此印巧妙地把“小篆略参大篆的笔意”运用到印中，使印文雄健豪放，厚重灵动。此印边款曰：“拟古封泥遗意”。实际上岳老把封泥那有宽、有窄，有整、有残，有虚、有实的边线处理方法灵活应用并与印文有机地融和，使整方印神韵苍古、气势磅礴。

(童辰翊文)



古桃州

此印为岳翁诸印之别派，属空灵一类。有邓吴之遗韵，但又不同，其开合其跌宕则自出新意。“古”字下方收缩，“桃”字左右放空，“州”字上下疏空，把重心密集于中部，使之疏而不空，因呼应而固其气，密集处不闷塞而因外空而得其神。实为岳翁审美标帜之自述。

(张郁明文)



吴俊卿

“吴”字笔画少而独占一边，此大手笔，“俊卿”二字含汉碑额意趣，盘屈徊环，方中寓圆，笔笔生情，这是古玉印中很难见到的。曾听乐三师说过：“白文印也是有边的”。个中三昧细审此印或能参悟一二。

(张耕源文)



俊卿

此岳老常用之印，安详庄重中有错落之美。侧款云：“汉碑篆额，古茂之气如此。”因知此印源自汉碑额。晚清印人尚印外求印、印从书出，岳老兼善，故能玩得印外文字之形，又能得印外文字之气。而欲得印外文字之气者，又必如先生精通篆隶之笔法也。

(黄悫文)



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

彭泽令陶渊明弃官归田，岳老佩其志，效其行，仅三十日即弃官，因有“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句于侧款。印共九字，行分三列，然用刀较平时刻他印整饬，笔意亦似刻露，“令”字末笔尤显，大小错落左右平衡，则多见匠心之痕。盖因石为田黄落刀便已受制约，又如何不计工拙随心所欲焉？岳老恐亦未能免也。

(黄悫文)



安吉

印文“安吉”二字，取法秦印格局，中锋运刀得自《石鼓文》神韵，注入战国布币钱文笔意，圆融流畅，灵气英发，显示吴氏自家神貌。无年款，似为中年代表作。

(杨鲁安文)



仓翁

此印为田黄佳石，非正方形，虽只刻“仓翁”二字，但用刀完全表达出其书法的厚重沉着、大气磅礴。作者以老到的印文残破、残边手法，使我们看到全印传达出的任意斑剥、古朴意趣。方寸间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阳刚恢宏之美。边款刻“冶铁刊”三字，疑非岳翁款。

(吴颐人文)



长愁养病

此印朱文“长愁养病”四字，与“美意延年”、“樾荫草庐”、“稼田眼福”诸印章法相同。融浙皖两派之长，刀中见笔、印内寓画，线条恣肆郁勃，呈长袖善舞之姿。乃晚年佳作。

(杨鲁安文)



印人近作



◎ 渊渊乎大 张涵一 华东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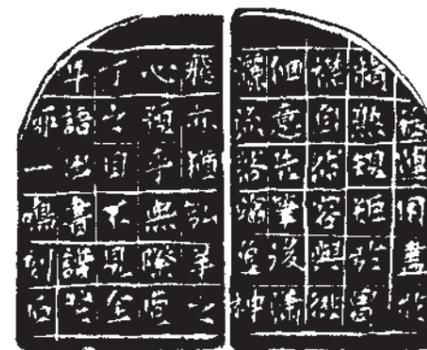
◎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李加红 华东师范大学



◎ 惟梅先得一年春 陈鸣寒 华东师范大学



◎ 不畏浮云遮望眼 田桂荣 华东师范大学



◎ 翰逸神飞 虞一鸣 华东师范大学



◎ 渐臻佳境 罗丝乐 华东师范大学



老至居人下

岳庐印多壮伟醇厚，而此作则是以细峻得醇厚，较前者尤难。要在镌刻时以刀为笔，且见笔见刀。使线条见功力、见内力、见张力。读此印足以玩味到唐人“屋漏痕”般积点成线的极致。此外，在章法上的“疏处走得马，密处不容针”的构思，更是获得了“知白守黑”的奇妙艺术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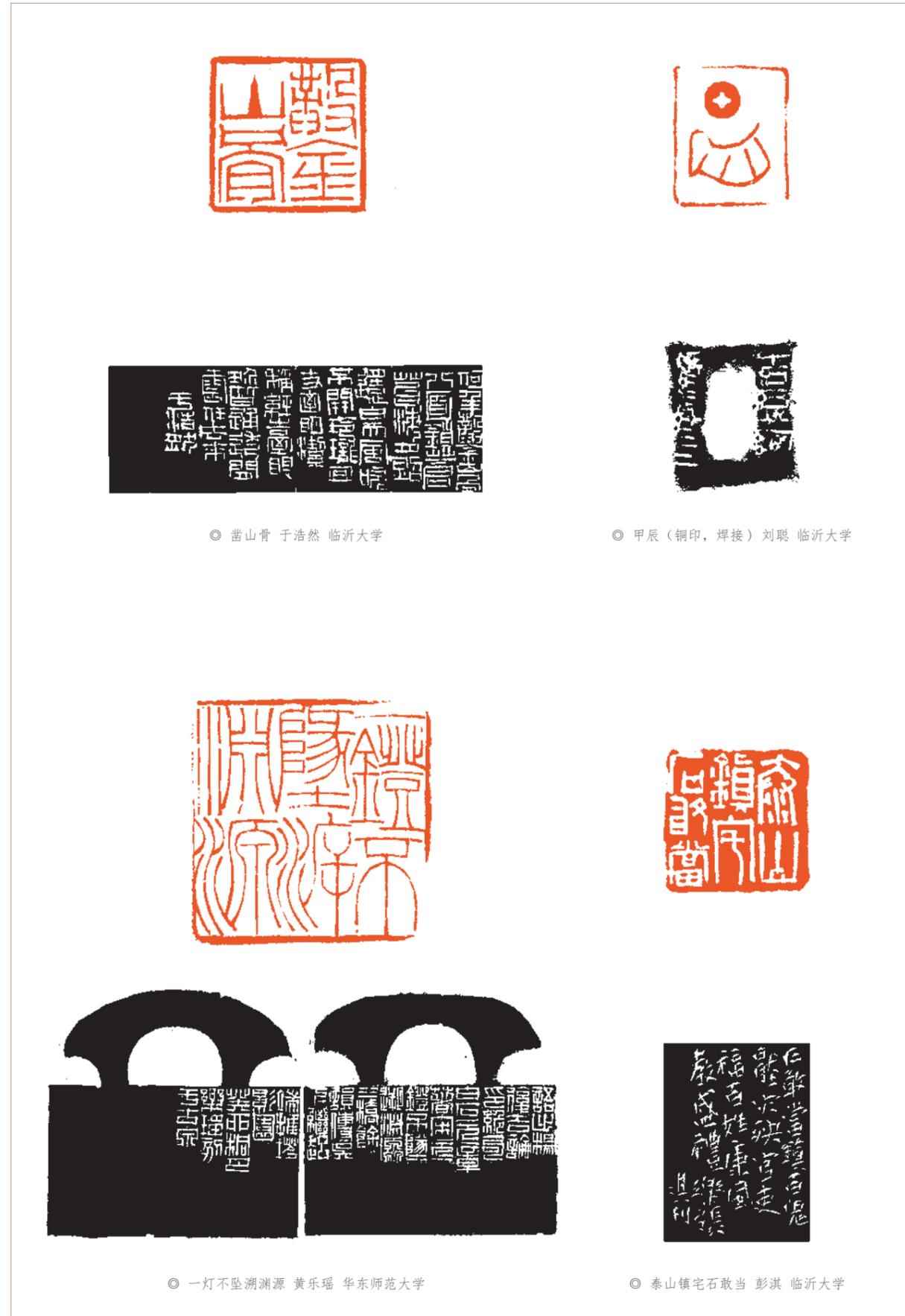
（韩天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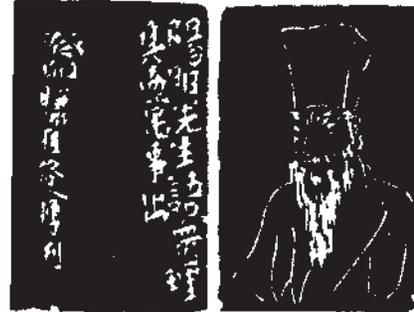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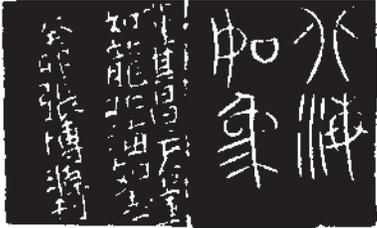
苦铁

此印用力亦以劲爽为主。而岳翁朱文印胎息自汉封泥，因苍浑古厚，故此引“苦”字中“口”的下部与“铁”字右半左下笔极力加粗并和下边粘连，而左边亦加粗与其他加粗处作呼应，苍浑与爽利在此印中相互辉映，增强了整体艺术效果。

（熊伯齐文）

鉴赏文字选自《吴昌硕篆刻砚铭精粹》





◎ 北海如象 张博源 临沂大学

◎ 众理具万事出 逢博 临沂大学



◎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姜继薪 临沂大学

◎ 鲜衣怒马少年时 王子潇 临沂大学